

# 二十世纪的敦煌学

郝春文**摇**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前摇摇言

本书所收文章,大部分曾经发表过,此次结集时,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或调整。从内容来说,这些文章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三篇。《敦煌》一文,是我为《敦煌学大辞典》撰写的被置于卷首的词条。该条简要介绍了敦煌自古至今的历史。《试论古代敦煌兴衰之因》,对古代敦煌兴起、兴盛和衰落的原因做了初步分析,可作为《敦煌》一文的补充。《古代敦煌文化的特点》,简要介绍了我对敦煌文化特性的认识。希望通过这三篇文章,可使读者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即可概括了解敦煌的历史概况、兴衰之因及其文化特征。

第二组四篇。这四篇有三篇是回顾与评述二十世纪敦煌学的,但各有侧重。《二十世纪的敦煌学》是我为研究生课程班讲授敦煌学的讲稿,此文除全面介绍了上一世纪敦煌学的发展概况,还对莫高窟、莫高窟藏经洞、藏经洞出土文献与文物的流散和敦煌的历史等做了简要的介绍。《二十世纪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是整合我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一九八〇~~年 1期)和《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中之“敦煌学”部分两文而成。前文是应《历史研究》之邀撰写的回顾二十世纪学术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主要回顾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情况；后文是应《二十世纪唐研究》主编之约，侧重介绍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史的情况。此次将两文合在一起，删除了重复的部分。《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研究述评（~~敦煌—吐鲁番~~）》，是我所写的专题性学术回顾文章。这三篇文章是本书的主体，所以，我把这部书命名为《二十世纪的敦煌学》。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介绍虽以二十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为主，但也包括了二十一世纪以后的重要成果。

这一组还收录了我在 ~~敦煌~~ 年撰写的《关于唐史研究者与敦煌文献研究者“分流”的问题》（发表在内部刊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敦煌~~ 年第 ~~员~~ 期）一文，此文期望唐史研究者增强利用敦煌文献的意识，同时企盼敦煌文献研究者为唐史研究者利用敦煌文献提供更好的条件。因当年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所以这篇文章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组是我所写的关于敦煌学论著的九篇书评。当然，我所评论过的书只是有关敦煌学的论著的一部分，但都是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故也应该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反映着敦煌学的发展足迹。所以，我也把它们收入本书。关于撰写书评，我一直认为比写论文难。好的书评，要求作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宽阔的学术视野，一篇出色的书评的学术价值不一定比学术论文低。我对自己的要求是，首先要实事求是，有贡献就肯定，有问题就提出商榷；其次，力图把所评之书纳入到该书所属领域的学术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最后，要争取写出一点超出所评论的书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看法。我的这些书评，都努力按这个要求去做了，但并没有完全达到我自己的要求。

当然，全面反映二十世纪的敦煌学研究，远非本书所能承担，与二十世纪敦煌学的丰富内容相比，本书的内容难免挂一漏万，我只希望能为读者了解敦煌和敦煌学提供一个简要的读本。

## 目 录

|                                         |   |
|-----------------------------------------|---|
| 前言 .....                                | 1 |
| 一、敦煌 .....                              | 1 |
| 二、试论古代敦煌兴衰之因 .....                      | 1 |
| 三、古代敦煌文化的特点 .....                       | 1 |
| 四、二十世纪的敦煌学 .....                        | 1 |
| 五、二十世纪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1 |
| 六、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研究述评 .....                    | 1 |
| 七、关于唐史研究者与敦煌文献研究者“分流”的问题 ...            | 1 |
| 八、填补中国书法史空白,开拓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 .....           | 1 |
| 九、《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读后 .....               | 1 |
| 十、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br>(杂选录)》 ..... | 1 |
| 十一、《敦煌学大辞典》述评 .....                     | 1 |



|                                           |     |
|-------------------------------------------|-----|
| 十二、评《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經濟》 .....                 | 吳 園 |
| 十三、评《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下) .....                 | 吳 園 |
| 十四、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br>研究续编》 ..... | 吳 園 |
| 十五、评《敦煌本〈甘棠集〉研究》 .....                    | 吳 苑 |
| 十六、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                    | 吳 源 |

## 一、敦瑶瑶煌

地名。自汉至清初亦作燉煌。新莽时一度改称敦德。位于甘肃省西部偏南,河西走廊西端。北纬 ~~三十九度~~ 东经 ~~九十六度~~ 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系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在向汉武帝介绍大月氏时提及。当为居住在当地的少数民族对本地区所取名字的音译,其本来涵义与译自何种语言之音莫考。

从考古发现来看,当中原夏代时,这一地区已有人类活动。据文献记载,约在商周时代,这里居住着羌人、乌孙人和月氏人。战国时,月氏强大,吞并了羌人。秦末,月氏又战败并逐走乌孙,独占了敦煌与整个河西走廊。汉初,匈奴打败月氏,并将其残部逐出河西。匈奴单于命其下属浑邪王驻牧敦煌一带。

元狩二年(前 ~~117~~),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大军击败河西匈奴,浑邪王率部降汉,河西走廊归入中原王朝版图。汉廷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隶属酒泉郡。元鼎六年(前 ~~111~~),汉廷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领敦煌、冥安等六县。为防御匈奴侵扰,汉廷在敦煌郡北部修筑了长城,与酒泉郡的长城相接。郡西部则建有玉门关和阳关,出关可通西域。两关之间也有长城和烽燧相连。敦煌成为中原通西域的门户和边防军事重镇。为充实敦煌郡,汉武帝几次从内地移民于

此。史载西汉末年敦煌郡已有户一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来到敦煌的移民和戍卒多为汉人,其数量已超过原留居的少数民族,成为主体民族。他们不仅为保卫、开发敦煌提供了人力,还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汉王朝组织移民和戍卒进行屯田,大力兴修水利工程,使敦煌从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生活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逐渐发展为繁荣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原有的畜牧业仍占重要地位。汉廷对敦煌的经营与开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敦煌与酒泉、张掖、武威连成一线,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起到了“断匈奴右臂”的作用;对内保卫着陇右地区的安全,对外有力地支持了汉王朝打击匈奴、经营西域的一系列军事活动。汉廷对匈奴、西域用兵,常以敦煌、酒泉为大军的集结地和出发地,这两地还负责提供、转运武器装备和粮草。新莽末年,中原大乱,窦融从内地来到河西,拥兵自保。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并加强边塞防御,使这一地区“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内地“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敦煌得以继续发展。

东汉建立,窦融率河西归服。此时,北匈奴控制了西域。敦煌郡既担负着防御匈奴进攻的重任,还要参与对西域的一些进攻性军事活动。永初元年(91),汉廷罢西域都护。元初七年(117),又置护西域副校尉,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治所设在敦煌。敦煌遂成为中原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敦煌太守实际上代行了护西域副校尉“西抚诸国,总护南北道”的职责。西域许多地方作为政治人质的王子就居留在敦煌。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从中原迁来的大族在敦煌逐渐立稳了脚跟。同时,中原文化也在这个地区扎下了根,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许多汉文典籍开始在这里传播。曾在长安师从名儒朱宠的张奂,晚年隐居乡里,传授儒学,有门徒一千多人,推动了儒学在敦煌的传播。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敦煌虽有近二十年没有太守,但在当地大族控制下,保持了相对平静。

魏文帝曹丕即位以后,派兵消灭了河西的割据势力,委派尹奉为敦煌太守,继续推行西汉以来的屯田戍守政策。仓慈任敦煌太守时,“抑挫权右,抚恤贫羸”,限制豪强兼并土地;反对歧视境内的少数民族,鼓励胡汉通婚;减免刑罚、徭役,鼓励百姓开荒垦田;保护来往商人,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商业城市。其后,任太守的皇甫隆教民制作和使用耒犁,并推广“衍溉”法,既节省水源和劳力,又使产量大增。经过曹魏时期几任太守的努力,敦煌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业城市和粮食基地。敦煌的这种繁荣景象一直保持到西晋。依据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文书信,西晋时居住在敦煌的以经商为业的粟特人即有百家之多,反映出当时敦煌商业的繁盛。这一时期,敦煌的中原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曹魏时,敦煌人周生烈以名儒身份参与了当时官府组织的注释经传工作。西晋时,敦煌出现了索靖、索统、索袭、宋纤、汜腾等一批名儒。他们或著书立说,或隐居讲学,各逞其能。二十世纪初,在敦煌附近的一处遗址中还发现了晋代早期天师道的符篆。表明至迟在晋代,道教已开始在敦煌流行。灵凉元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发掘了魏晋时期的翟宗盈墓,发现在墓门楼上有浮雕门阙和彩饰的壁画,其内容、形式、风格、技法与内地汉墓出土的壁画一脉相承,表明中原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已传到敦煌。与中原文化在敦煌扎根成长的同时,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敦煌。据《高僧传》记载,约公元圆凉年前后,外国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为徒。晋武帝时,竺法护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三十六国语言和文字,携大量胡本佛经东归。以后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教译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大师。法护的弟子竺法乘先随师至长安,后又返回敦煌,建立寺院,广收门徒,宣讲佛法,加深了佛教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五个

政权。十六国初期,中原大乱,唯有前凉占据的河西地区相对太平,故“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其中一些人来到了敦煌,这些流民既为进一步开发敦煌补充了劳动力,又带来了中原的技术和文化。敦煌是前凉的西部重镇,担负着制御西域和沟通中西交通的重任。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前凉统治者张骏把敦煌、晋昌、高昌等三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三营合并为沙州,任命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治所设在敦煌。敦煌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杨宣在任期间,组织兴修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有利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前秦建元十二年(382),前秦灭前凉,仍以敦煌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建元十八年,苻坚派吕光进军龟兹,建元二十一年徙江汉、中原百姓一万七千余户以充实敦煌。同年,前秦瓦解,吕光率军返回河西,建立了后凉。麟嘉七年(385),后凉内乱,“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其时敦煌的人口已达两万户以上。隆安四年(394),李暠在敦煌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史称西凉。西凉政权在敦煌健全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派军攻克玉门以西诸城,驻军玉门关和阳关,重新控制了西域。其时北凉、南凉在河西东部不断争战,敦煌在西凉统治下未发生大的战乱,五谷丰登,百姓乐业,成为国内名邦大郡。建初元年(400),李暠迁都酒泉,将前秦时迁来的和后凉内乱时逃来的民户全部挟往酒泉。永建二年(401),北凉灭西凉,进攻敦煌时以水灌城,城克后又“屠其城”。永和七年(447),北魏灭北凉。北凉沙州刺史沮渠无讳率残部在敦煌、酒泉一带继续抗击魏军。直至太平真君三年(452),因寡不敌众,又乏军粮,才率万余家放弃敦煌逃往西域。这些动乱都使敦煌蒙受重大损失,渐趋衰微。这一时期,中原板荡,祸乱迭生。敦煌虽亦受到影响,但在公元439年李暠迁都酒泉之前,却保持了近百年的相对太平。在此期间,不少士人携带典籍随流民逃到河西,其中一些人进入敦煌。而占据敦煌、河西的统治者都能注

意起用儒士,提倡儒学,为当地的和逃来的士人著书立说、设馆授徒提供便利。李暠还在敦煌设立官学,使敦煌产生了郭瑀、祈嘉、刘昞、索敞、阚骅、张湛、宋繇、阴兴等一批著名学者。一些在中原因战乱而失传的典籍、学说在这里得以保存、延续。后来,这些敦煌、河西学者的一些著作流传到了南朝,有些学者如索敞、江强等由北凉入北魏任官,对北魏乃至隋唐时期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学说之外,道教也继续在敦煌流传,在敦煌三危山下的十六国墓葬中出土的五谷罐上,发现了与道教有关的铭文。此期中原地区佛教发展迅速。西行求法、东来传教的僧人不断往来于敦煌,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据《杂录》记载,公元401年在敦煌城南一次受具足戒的僧人即有十二人。至北凉时,这里已是“道俗交得,多有塔寺”了。受内地禅业盛行的影响,敦煌地区出现了单道开、竺昙猷、释道法、昙摩蜜多等以修习禅定知名的高僧。修习禅定需要安静的环境,因而禅僧经常离开城市,选择人迹罕至之处开窟建寺。前秦建元二年(382),禅僧乐傅在距敦煌二十五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稍后,又“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在乐傅师窟侧,又建一窟。此后,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人逐渐增多。

北魏控制敦煌以后,在此设镇。仍把这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太平真君六年(456)和九年,万度归两次进军西域,西域诸国纷纷归附,丝路再度畅通。后来,游牧于北魏北境的柔然逐渐强大。到献文帝时,柔然控制了西域,敦煌又成为北魏抗击柔然的前沿阵地。敦煌镇将尉多侯、乐洛生都曾击退柔然对敦煌的骚扰。孝文帝时,进一步加强敦煌镇的守备,在此置都大将。同时,居住在阴山南北的游牧民族高车日益强盛,与柔然为敌。柔然在北魏和高车的夹击下逐渐衰落,敦煌的外部威胁得以解除。正光五年(525),敦煌镇改为瓜州。次年,北魏宗室元荣任瓜州刺史。北魏分裂后,敦煌属西魏。西魏仍以元荣为瓜州刺史。元荣死后,瓜州先后发生了邓彦和张保叛

乱,赖瓜州大族的力量,叛乱得以平息。西魏委派为民众所信服的申徽为瓜州刺史。由于此时突厥、吐谷浑分别在河西走廊以北和东南兴起,并控制了西域,申徽也只能做到保境安民而已。北周取代西魏后,仍在敦煌设瓜州,曾委任建平公于义为瓜州刺史。因北周的主要注意力在统一中原,无暇西顾,敦煌未能改变防守局面。北朝时期,敦煌的佛教继续发展。孝文帝时任敦煌镇都大将的穆亮和后来任瓜州刺史的元荣、于义等几位来自中原的敦煌地方长官,都尊奉佛教。元荣、于义不但大兴佛事,还亲自出资在莫高窟开窟造像。致使“合州黎庶,造作相仍”,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渐趋兴盛。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佛教徒传授教义、举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元荣时期开凿的洞窟中,融入了他从中原带来的文化艺术;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再次带来了中原的文化艺术。此时的敦煌石窟艺术已突破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隋初,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控制着西域的中部和北部,另一支游牧民族吐谷浑则占据着青海和西域南部。敦煌兵民和隋廷派来的军队一起,不断地抗击上述少数民族政权的骚扰,保卫着河西和陇右的安全。隋炀帝即位以后,国势日益强盛。于是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也被迫投降,使敦煌得到了安宁,丝绸之路再度被打通。据裴矩《西域图记》序记载,当时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伊吾、高昌、鄯善分别是这三条道路西行的起点,而这三条道路在进入河西时就“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随着使团和商队的出入,西域的佛典和音乐等经由敦煌传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经由敦煌传达入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隋最高统治者文帝和炀帝均笃信佛教,使用行政手段大兴佛事,促使敦煌佛教迅速发展。仁寿元年(591),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些由都城和其他地区送至敦煌“流通供养”的隋宗室成员写经,反映出这一地区的佛教在全国已占有重要地位。受内

地影响,大乘佛教思想也开始在敦煌流行。从隋代写经题记来看,此时出资写经者多为戍卒、商人和普通百姓,表明敦煌对佛教的信仰已深入到一般民众之中。与佛教的迅速发展相适应,莫高窟的修窟造像活动也十分兴盛。隋代敦煌石窟艺术进一步接受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为以后新的艺术繁荣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隋末中原乱起,群雄逐鹿。敦煌归属割据河西的李轨。武德二年(621),唐廷平定河西,仍在敦煌置瓜州。但中原战乱未已,外部则有乘隋末战乱重新崛起的突厥、吐谷浑的威胁。武德三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五年,瓜州土豪王幹斩贺拔行威归唐,唐廷改瓜州为西沙州,州治设在敦煌。另在原瓜州属下的常乐县置瓜州,设总管府,辖瓜、西沙、肃三州。武德六年,西沙州张护、李通谋反,杀害正在西沙州巡视的瓜州总管贺若怀廓,拥州别驾窦伏明为主,并派兵进逼瓜州,被瓜州长史赵孝伦击退。不久,窦伏明率众降唐,西沙州终于最后稳定下来,贞观七年(633),唐改西沙州为沙州。在此前后,唐廷北灭东突厥,西讨吐谷浑,解除了敦煌的外部威胁,并开始进军西域。灭高昌,攻焉耆,克龟兹,设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以巩固战果。最后,又在显庆二年(651)灭掉西域最大的敌对势力西突厥。于是西域诸国纷纷归附,贡使通商,往来不绝。在此过程中,敦煌不仅是军用物资的转运、供应基地,还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战役。此后,唐廷与西突厥余部和新兴起的吐蕃的争夺战多在西域进行,敦煌与河西成了中原王朝的“心腹”之地。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唐前期加强了敦煌的军事防卫力量。在玉门设立了玉门军,在沙州城内设豆卢军,并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镇(今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使其再度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在敦煌和河西的其他地方,还设有赤水军、建康军、墨离军、大斗军、白亭军和悬泉、常乐、张掖、交城等守捉。景云三年(712),唐廷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地区设立了河西道,设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治所设在凉州。



这是唐王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军事防卫力量的加强和安西四镇的设置为敦煌、河西经济、文化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唐廷在沙州设有健全的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推行均田制,并选择比较有作为的官吏到敦煌任地方官,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和经营。据《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唐前期敦煌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绿洲灌溉体系,使敦煌的耕地面积得到扩大,农业有进一步的发展,粮食生产自给有余。唐廷在每年粮食收获季节向百姓和籴粮食,存入粮仓,以供军需。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天宝时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有户六千三百九十五,口三万二千二百三十四,成为前凉、前秦以来敦煌户口最多的时期。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唐前期,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伋,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内地和西域、中亚的商人等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中原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继续经过敦煌源源西去。同时,西域、中亚等地的珍宝和特产以及宗教、文化等也继续经由敦煌传往内地。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这个自曹魏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更加繁华。在敦煌,既有内地来的汉商,也有西域、中亚各国的胡商。敦煌城东的沙州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以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组成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沙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处有“兴胡泊”,就是因胡商在经过故玉北关时常在这里停驻而得名。各地来的行商坐贾在敦煌从事着中原的丝绸与瓷器,西域的珍宝、特产,北方的驼马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物品的交易。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还给敦煌带来了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汉文化和佛教以外,当时在敦煌城东一里处有中亚粟特人信奉的祆教神祠。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景教和摩尼教的经典,反映了中亚、西亚宗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

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些从内地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到此地,使敦煌的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当时沙州城内建有州县两级学校,设有经学、医学、道学等不同科目,教授唐朝规定的儒道医等汉文化典籍。此外还有不少私人学校,亦以教授儒家典籍为主。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当时官私学校或学生使用的各种写本汉文化典籍。与李唐王朝奉老子为先祖、大力提倡道教相关,敦煌不仅在开元、天宝年间设立了道学,写本道经也大量涌现,道观增多,反映出道教曾盛极一时。佛教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和敦煌遗书写经题记来看,唐前期出资开窟、写经的人既有僧官、僧尼,也有当地达官贵人、文武官僚、工匠、社人、行客、侍从、奴婢和一般善男信女。尽管唐统治者在这一时期不时抬高道教地位,贬抑佛教,敦煌佛教在民间广泛信仰的基础上,在佞佛的世家大族的倡导下,一直缓慢而平稳地向前发展。见于记载的佛寺比前代增多,莫高窟的开凿活动也一直在持续。大量宫廷写经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不少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使这座唐代著名的佛教城市继续不断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返回路经敦煌僧人的增多,又使敦煌得以不断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营养。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在河北发动叛乱,唐廷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安西、北庭等西北各地精锐部队入援,西北边防骤然削弱。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乘机向唐发起大规模攻势,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随后,又由东向西进攻河西。广德二年(756),攻占凉州,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西奔甘州;永泰二年(766),又连克甘、肃州,继杨志烈为河西节度使的杨休明被迫移节沙州;大历十一年(766),攻陷瓜州,并在当年八、九月间包围了沙州城。直至贞元二年(786),敦煌城内矢尽粮绝,敦煌人才在得到吐蕃“毋徙佗境”的承诺后,与其结盟而降(吐蕃陷沙州

城时间,尚有贞元三年、建中二年等诸说)。自此,敦煌进入吐蕃管辖时期。吐蕃统治者废除了沙州的县乡里等各级行政机构。在沙州之下设“部落”,部落下设“将”,“将”为基层行政机构。“将”设“将头”,“部落”设“部落使”,沙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称“节儿”,隶属于瓜州节度使。在经济方面,推行计口授田制,改行新的赋税制度,即按地亩征收“地子”和按户征收“突税”。这两项负担大大超过了以前唐政府对百姓的征收数额。在交换领域,废除唐币,实行实物交换。还要求当地汉族改变原有习俗,实行“胡服辫发”。广泛推行吐蕃语,禁用唐年号,改用地支纪年。这些做法严重阻碍了沙州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敦煌失去了往日的殷富与繁华,不断激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反抗。吐蕃统治者除了依靠吐蕃军和吐蕃化很深的“通颊部落”对当地居民各种形式的反抗予以坚决镇压以外,还任用一些投靠他们的汉族世家大族成员为各级官吏,以缓和民族矛盾。并大力扶持佛教,借用宗教的力量来稳定局势。他们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些高级僧侣可以参与政事。他们不断向寺院布施财物、田产、水碓及依附人口等。在吐蕃统治者的倡导下,当地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使沙州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寺院由十三所增加到十七所,僧尼由三百一十人增加到近千人。沙州的僧官,起初沿用唐制,首领为僧统,后又改称教授。寺院的经济势力日益强大,拥有田地、果园、粮仓、碾碓、油坊、牲畜、车辆及依附人口——寺户。并通过放高利贷盘剥普通百姓。译经活动频繁进行。他们不断向唐廷求取佛经,进行翻译。写经和讲经亦较过去兴盛。每所寺院都有专事抄写经书的“经坊”,开展大规模的写经活动。各寺都定期开展讲经活动,向当地僧俗宣讲佛法。寺院学校也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加强了世俗学问的内容,吸引了不少世俗子弟到寺院求学,成为兼收僧俗弟子,并授佛学和儒家典籍的新型寺院学校。这对于延续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沙州佛教势力的膨胀推动

了莫高窟的兴建,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新的成就。总之,吐蕃时期沙州佛教势力深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敦煌的佛教文化对吐蕃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汉族僧人摩诃衍曾从敦煌到逻些(今拉萨)传授顿悟禅法。高僧昙旷也曾撰《大乘二十二问》,回答赞普有关顿、渐之争的疑难问题。在吐蕃管辖敦煌后期,唐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发生了被称为“会昌法难”的唐武宗毁佛事件,中原佛教受到沉重打击,敦煌躲过了这次法难,佛教继续保持着独尊的地位。这种情况对敦煌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会昌二年(852),吐蕃王国发生内乱,势力大衰,在河西的统治也开始动摇。大中二年(858)沙州大族张议潮乘机率领各族人民起义,逐走吐蕃统治者,占据沙州和瓜州,遣使归降唐廷。以后,张议潮又陆续攻占了肃、甘、伊等州。大中五年,唐廷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授张议潮节度使、河西陇右十一州观察使。当时正值西北地区发生民族大变动之际,在以沙州为中心的张氏汉人政权周围,活跃着吐蕃、回鹘、退浑、龙家、仲云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从东、南、西三面对归义军构成威胁。而唐廷此时内部危机严重,无力顾及河西,不能给归义军以实际的支持。在归义军已控制的地区,由于吐蕃半个多世纪的管辖,也遗留下一系列社会问题亟待解决。面对这种复杂而又严峻的形势,张议潮及继任者张淮深首先是通过派要员入朝和不断进贡物品尽力求得唐王朝的承认和信任。同时在辖区内全面恢复唐制,废部落制,重建县乡里;重新登记人口、土地,按照唐制编制新的户籍,制定新的赋税制度;恢复唐朝服装,推行汉化。很快就使敦煌“人物风华,一同内地”。这两项措施迎合了沙州等地汉人怀恋大唐故国的心理,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对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归义军政权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已汉化者编入乡里,与汉人杂居。吐蕃化较深者部分继承吐蕃制度,仍用部落的形式进行统治,尊重他们的习俗。同时吸收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参加政权。这些措施受到了少

数民族的欢迎。对于具有强大政治、经济、社会势力的佛教,他们首先废除了吐蕃时期的僧官制度,恢复唐制。并通过削减寺户限制其依附人口的发展,通过“分都司”削弱了都僧统的政治经济权力,以后又通过控制僧官的任免权使沙州僧官逐渐依附于世俗政权。寺院依附人口的减少导致寺院经济衰落,一些原由寺户上役时从事的工作逐渐被各种租户和雇工所代替,以沙弥为代表的下层僧徒承担的劳务开始增多。高利贷收入在寺院收入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大。上述几方面措施的实行使归义军政权取得了内部的稳定,为其在河西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张议潮曾率蕃汉军多次击退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并不失时机地东征西讨。咸通二年(861),张议潮攻克吐蕃控制的河西重镇凉州。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称归义军收复的地区“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众”,势力达于极盛。归义军的治所敦煌成为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咸通八年,张议潮被召入长安,行前命其侄张淮深主持归义军军政事务。张淮深继续抗击回鹘的骚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归义军辖区的安定。大顺元年(890)至乾宁三年(896),归义军内部接连发生政变。先是张淮深及其妻、子被杀,继而是索勋篡权,两年后嫁给李明振的张议潮第十四女又与诸子合力除掉了索勋,最后是李氏家族倾覆,张议潮之孙张承奉重任归义军节度使。归义军的内乱给活动在其周边和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甘州被回鹘攻占,占据肃州的龙家也不再听从归义军的号令,凉州因有甘、肃二州相隔,实际上亦脱离了归义军的控制。至九世纪末十世纪初时,归义军实际控制的已仅有瓜沙二州了。张承奉不甘坐守瓜沙,想用武力恢复归义军兴盛时的旧疆,并于开平四年(914)建立了“西汉金山国”,自称圣文神武天子。连年的战争使瓜沙地区经济凋零,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境内“号哭之声不止,怨恨之气冲天”。失去人民支持的张承奉政权终于在开平五年被甘州回鹘

击败,被迫认回鹘可汗为父,成为甘州回鹘政权的附庸。张氏归义军时期,对佛教寺院利用各种方式继续向社会各阶层发展势力,未加干预。归义军统治者还亲自参加设斋、造窟等佛事活动,并公开宣布保护寺院的财产和依附人口。禁止“倚形恃势之人,妄生侵夺”,致使僧尼人数进一步增加到一千一百人以上,在十七所寺院之外,又出现了不少兰若和私家佛堂。由于佛教势力在政治上已依附于归义军政权,所以其社会势力的发展对归义军政权有利无害。在沙州僧官的倡导下,沙州寺院和当地居民在举行佛教仪式、佛教活动时,大多要为归义军首领及其下属祈福或歌功颂德,这种情况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也有反映。由归义军节度使出资兴建的洞窟,窟中的供养人像往往不是一人一家,甚至祖宗三代、姻亲眷属都依次排列在一起,简直成了他们列家谱、光耀门庭的家庙。在第**155**窟还出现了与佛教没有直接关系的规模巨大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

乾化四年(954),沙州的另一个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贵(后更名义金)取代了张承奉,恢复了归义军称号,此后归义军政权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曹氏归义军政权吸取了张承奉失败的教训,他们努力改善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通过联姻等办法与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于阗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了在平等基础上友好往来的新关系,以图共存。同时积极恢复与中原王朝的统属关系,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奉中原正朔,利用旧日唐朝在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声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对内则继续吸收瓜沙望族和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参加归义军政权,以扩大政治基础。这些措施使曹氏归义军政权既得到了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承认,也得到了境内兵民的支持,使其能在五代、宋初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得以生存、发展。而且,河西西部与西域各绿洲王国间的友好往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还为密切中原王朝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和中西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北宋建立以后,有很多僧人

经由河西、敦煌前往天竺(印度)求法,他们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暂居。很多敦煌僧人,或者随同这些返回的内地僧人,或者随同东行的西域僧人,甚至混杂于西域各国商队和使团中频繁出入中原。敦煌与中原、西域联系的加强和各地僧人的频繁往来,促进了各地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一方面敦煌不断向中原王朝乞求本地已欠损的佛经,那些往来于敦煌的僧人也不断把中原僧人的佛教著述和从印度、西域带来的佛典留在敦煌,同时也将一些敦煌独有的佛教典籍带到中原、西域。敦煌与中原、西域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曹氏归义军时期佛教的继续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而曹氏历任节度使对佛教的支持和尊崇则为保持其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他们不仅把发展佛教、争取佛教势力的支持作为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还试图凭借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来提高归义军政权在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势力。在沙州十七所大寺名籍上仍有一千多名僧尼。僧尼受到人们的尊崇,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仍有巨大的影响。当然,曹氏归义军政权也不是听凭佛教势力自由发展,他们不仅继续将沙州僧官牢牢控制在手中,而且还控制着佛教发展的导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几乎一切佛教活动仍要为节度使及其亲属的文治武功大唱赞歌,并为他们祈福;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着重支持发展敦煌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努力把敦煌建设成为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中心。在他们的支持下,敦煌的佛教在当时无论在藏经方面还是在佛学研究方面都代表了西北地区汉化佛教的最高水平,对西州和于阗佛教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发展佛教艺术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从曹议金到曹延禄,历任节度使都在莫高窟或榆林窟从事过新建或重修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归义军的各级官吏和很多百姓都参与了上述活动,从而把莫高窟建设成为西北地区佛教徒仰慕的圣地。受曹氏归义军政权控制佛教发展导向措施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寺院

经济继续衰落。寺院依附人口对寺院的依附关系日趋松弛。寺院的租佃制和出租加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下层僧徒所承担的劳务日益增多,高利贷收入成为寺院经济的主要支柱。寺院经济的进一步衰落迫使佛教势力更加依赖世俗政权的扶持。

曹延禄执政晚期,归义军再度与甘州回鹘发生战争,引起瓜沙民众的不满。咸平五年(994),归义军内部发生兵变,曹延禄与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杀。延禄的族子曹宗寿在众人推举下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宋廷遂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战争和内乱使曹氏归义军政权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区的回鹘势力在这一时期却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与归义军政权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时,归义军政权已不堪一击,任何外来的攻击和内部的骚乱都足以使其倾覆。这使得在归义军政权庇护下的沙州佛教势力感到极度恐慌。景德三年(1034),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这个消息很可能被沙州寺院从东逃的于阗人那里得知。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下,在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一些重要的经卷和佛像、幡画等集中起来,收藏在原来存放各寺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485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做了必要的掩饰。以后,由于当事人和知情者逐渐离开人世,藏经洞的情况也就不再为世人所知(关于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时间,学术界还有别的说法)。天禧四年(1030)和天圣元年(1023),曹贤顺曾两次向宋廷进贡物品。自天圣元年以后,曹氏归义军政权从史籍中消失。根据相关材料推测,它可能是天圣六年至景祐四年(1035)间被沙州回鹘所取代。

景祐三年,党项族攻占肃、瓜、沙等州。沙州回鹘在抵抗失利后率众撤离敦煌。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建立西夏。康定二年(1041),沙州回鹘率众进攻沙州;次年,攻克沙瓜二州。在沙州回鹘占据沙州时期,始终奉北宋为正统,使用宋朝年号,多次向宋廷入贡,



不向西夏屈服。这一时期回鹘人虽为统治民族,但汉人仍占很大比例,再加上回鹘人长期受汉族影响,故其政治制度、佛教艺术都是汉族和回鹘文化交融的结晶。

乾道元年(1161),西夏再克瓜沙,沙州回鹘政权灭亡。从此西夏加强了对沙州地区的控制。西夏的统治机构模仿北宋,故西夏统治时期敦煌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是将瓜沙二州的统治中心从沙州移到了瓜州,州以下仍设县乡里等行政机构。终夏之世,对外战争频繁,沙州和西夏管辖的其他地区一样,徭役、兵役均十分繁重。敦煌作为西夏的西大门和与西域联系的关口,还担负着沉重的边防任务。而且,这一时期敦煌还曾发生几次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长时期的动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敦煌地区的经济迅速衰落。西夏长期与宋廷为敌,不准西域各国通过敦煌与河西向宋朝贡,对过境商人也课以重税。迫使西域各国使者和商人避开西夏辖区,改由塔里木盆地的南沿经青海进入中原。而从事东西经商最活跃的回鹘人则较多使用从中亚到蒙古的草原之路。自南宋时起,海上丝绸之路也日趋活跃。敦煌逐渐失去中西交通咽喉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其商业和文化也渐趋衰落。西夏统治者既信奉巫术和多神教,也笃信佛教。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在西夏时期仍受到人们的重视,莫高窟以及榆林窟、西千佛洞都曾招致无数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在这些地方修建寺庙,新建重修石窟等活动也仍然盛行。

宝庆三年(1333),蒙古帝国攻占敦煌。同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将敦煌隶于八都大王。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将敦煌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在此复置沙州。在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敦煌在中西交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经由敦煌、河西的交通路线再度成为联结西域与中原的主要通道。蒙古帝国和元朝的版图比汉、唐都大,和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比以往更加密切。为

了保证过往使团的需要,蒙古帝国统治者窝阔台在敦煌和河西的瓜州、肃州等地设置了驿站,敦煌是河西通道的一个重要补给站。元统治者曾采取招抚流民、设置屯田等措施来恢复敦煌地区的经济。但此时敦煌的地位已远不能与汉、唐时期相比。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北方草原之路的继续频繁使用,敦煌未能恢复中西交通必经之地的地位。又由于自宋代以来,中原王朝的都城逐渐向东、向北迁移,距河西、敦煌愈来愈远,使敦煌在全国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再加蒙古帝国和元朝疆域广大,敦煌失去了经营西域的基地的作用。它不过是河西通道上的一个补给站,却不像汉唐时期那样是对整个西北地区,甚至国都的安危都有重大影响的边防军事重镇。这就决定了蒙元统治者对敦煌的重视程度必定是有限的。在很长时间内,沙州并不是专镇边防重地的蒙古军的驻防地,只有部分汉军且屯且戍。直至大德七年(1307),元统治者才在御史台的建议下派一万蒙古军分守沙、瓜等地的险要地方。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统治者从沙州、瓜州往甘州强制移民,人烟稀少的敦煌地区益显荒凉。蒙古帝国和元统治者采取儒释道并重的政策,十分注意扶持和利用佛教。莫高窟现存的蒙、汉、藏、梵、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碑》,乃是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等出资于至正八年(1348)刻立的。至正十一年,继速来蛮镇守沙州的牙罕沙则对皇庆寺(莫高窟)进行了重修。在统治者的倡导和带领下,佛教在这一时期仍然受到敦煌各族人民的信奉。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也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在同年攻克元的都城大都,元朝灭亡。洪武五年(1372),明廷派冯胜率大军经略河西,在瓜州、沙州一带击败元河西守军残部。但此时自宋元以来日渐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经由河西的陆路通道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再加明代的边

府重点在北方,其都城先在南京,后在北京,敦煌的战略地位和元代一样,其得失对全国没有多大影响。所以,明军并未在沙州设防,很快收兵东还,在肃州西筑嘉峪关以为国门。以后,嘉峪关通哈密之路成为中原与西域往来的干线。敦煌失去了屏蔽河西和中西陆路交通中转站的地位。洪武二十四年,重新占据沙州的元朝残余势力派使节向明廷进贡,并表示愿意归服,明廷未予理睬。直至永乐二年(1404),沙州的蒙古族酋长困即来、买住再次“率众来归”,明成祖才下令在敦煌设沙州卫,任命困即来和买住为指挥使。此后,沙州卫不仅按时向明廷进贡物品,还经常保护路经敦煌的关外少数民族政权的朝贡使者,不时向明廷报告关外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但当沙州卫遇到哈密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时,却得不到明朝军队的实质性支持。正统十一年(1446),甘肃镇将任礼率兵至沙州,将沙州卫属下民众全部强行迁入关内,沙州卫遂废。成化十五年(1479),明廷又在沙州故城置罕东左卫,任命早已在沙州境内居留的蒙古部的只克为指挥使,以抵御吐鲁番的东进。此后,罕东左卫不断抗击吐鲁番和蒙古族瓦剌部的进攻。正德十一年(1516),吐鲁番向沙州发动大规模进攻,罕东左卫指挥使乞台力不能拒,率领一部分部众逃入了嘉峪关,余部则投降了吐鲁番。嘉靖七年(1528),罕东左卫的余部又在帖木哥和土巴的率领下逃离沙州,归降了明朝。从此,敦煌遂为吐鲁番占据。在沙州卫和罕东左卫管辖敦煌时期,敦煌成为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的活动区域,使这一地区早在汉代就已形成的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生产方式,又退回到汉以前的水平。由于在沙州卫和罕东左卫治下的军民终日忙于抵御各方面的侵扰,又地处交通不便的边荒,所以在这一百多年中,敦煌在文化上没有任何建树。但蒙古族是信奉佛教的民族,他们虽无暇整修莫高窟,却还不至于对它进行人为的破坏。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占据敦煌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敦煌流行了一千多年的佛教,终归绝迹。被佛教徒视

作圣地、曾盛极一时的莫高窟，此时是“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呈现出满目凄凉的景色。

清朝定都北京，敦煌仍和明代一样，既非边防要塞，又在甘肃通新疆通道之南，不过是一个处在边远偏僻之地的小城。所以在清初很长时间未将敦煌收入版图，任由吐鲁番占据。甚至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以后，也未在敦煌设置军政建制。直至雍正元年（1723），始在敦煌设沙州所。雍正三年，清廷采纳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建议，升沙州所为卫，并从甘肃迁移二千四百余户百姓到敦煌屯田，还重修了卫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改沙州卫为敦煌县。自清廷采取移民屯田的措施以后，敦煌的经济开始复苏，农耕又成为当地的主要生产方式，水利设施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移民中有不少人信奉佛教，使莫高窟的香火渐盛。在嘉庆和道光年间，敦煌的佛教徒对莫高窟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这次整修除新开了第 195 窟和第 196 窟以外，还重修了前代的二百多个洞窟。但由于此时内地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已经衰落，与敦煌接邻的新疆地区居民又多信奉了伊斯兰教，敦煌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已成无源之水。更由于此时敦煌的文化已远远落后于内地，使得清代新开和重修的洞窟的艺术水平无法和前代相比。同治年间，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先后爆发了回民起义，起义军不断与清军交战，敦煌一带也曾成为战场。经过这场战乱，敦煌的人口又减少了很多。在战乱中，由白彦虎率领的回民起义军在被清军追赶逃至敦煌时，尽毁莫高窟联结上下层窟的行廊。十九世纪末，道士王圆箓来到莫高窟。此时莫高窟十分荒凉，崖面上的行廊多已不存，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洞窟则已积起厚沙。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来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说二十

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雇的人在清除第 5 窟甬道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为第 4 窟)。但敦煌当地的官绅无人认识洞内这批古物的价值,腐败的清政府也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分散于世界各地。劫余部分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也遭到劫夺与破坏。1909 年至 1911 年,俄国奥登堡率考察队到敦煌和莫高窟,不仅收集到大批敦煌写本,还掠走了第 4 窟的多块壁画。1914 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白匪军逃窜到莫高窟,他们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1920 年,美国华尔纳曾到莫高窟盗剥了大面积的壁画,并掠走彩塑。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散失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考察的人逐渐增多。经过他们的研究和宣传,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1944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担负起了保护洞窟,临摹、研究敦煌壁画的职责。1951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59 年 1 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62 年 10 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67 年 1 月,敦煌县改为县级市。同年 10 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82 年,敦煌市人口十二万六千六百五十五人(城镇人口三万零四百七十五人)。

(原载《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年)

## 二、试论古代敦煌兴衰之因

古代的敦煌,自汉至清,经历了一个兴起、兴盛、衰落的历史过程。对这个过程的研究,经中外学者的努力,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对敦煌兴衰之因,尚未见专文探讨,故草此文,以为引玉之砖。

纵观敦煌古代的历史,大致可以唐宋之际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敦煌的发展虽有曲折,但总的说来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后一阶段的敦煌虽经历了大一统的元、明、清三代,终于还是逐渐衰落下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敦煌在中原王朝的边防体系中先后所起的作用不同,而这种差别又是中原王朝国都迁移的结果。

如所周知,自汉至唐,中原王朝的都城主要建在长安和洛阳两地,而以长安为主。对于建都在长安的王朝来说,河西特别是敦煌在整个边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是极为重要的。由于河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如果不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占据河西的政权进可寇扰秦陇,退可静观大局;向北可通过额济纳河流域通道与蒙古高原连成一片;向南可以和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结盟;向西可以攻击甚至控制西域。又由于河西具有宜农宜牧的优越自然条件,它还可以成为重要的经济基地。上述形势一旦形成,中原王朝的边防就会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国都长安也会受到威胁。但

是,如果河西控制在中原王朝手中,形势就完全不同了。不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联系被隔断,而且进可控制西域,退可固守河西。这样,秦陇就无外患之虞了。位于河西最西端的敦煌,是河西的门户。当中原王朝对西域采取攻势时,它是前线的后方基地;当中原王朝处于守势时,它又担负着屏蔽河西的重任。所以,在河西地区,又以敦煌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从汉、唐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及其它割据政权的斗争中,敦煌与河西的这种重要地位可看得十分清楚。

汉初,河西为匈奴所占据,是其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基地。并使其在河西的势力与蒙古高原和西域连成一片,十分强大。西汉王朝虽被迫采取和亲政策,匈奴仍是常常入侵。由于河西在匈奴手中,陇西不时受到侵扰。《汉书》卷九十四《高后纪》略云:“六年,匈奴寇狄道,攻阿阳”。又“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余人”<sup>①</sup>。《汉书》卷九十四《文帝纪》亦载,“(十一年)匈奴寇狄道”<sup>②</sup>。同时,西汉王朝北部的安定、北地、上郡等地也经常受到匈奴侵扰<sup>③</sup>。这不仅使西汉王朝的边疆地区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钳形夹击,处于被动的地位,国都长安也受到了威胁,以致“烽火通于甘泉、长安”<sup>④</sup>。汉武帝不愧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首先看到了敦煌与河西在整个边防体系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做出了夺取并控制河西,以“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决策。这是汉代边防政策的重大转折,是西汉王朝得以扭转战局的关键。在元狩二年(前119年)把匈奴势力赶出河西以后,汉王朝在战略上就取得了对匈奴斗争的主

①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一册第285页。

② 同上书，第285页。

③ 参看《史记》卷一百一十五《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汉书》卷九十四《景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④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一册第285页。

动权。首先是隔断了匈奴与青藏高原羌人的联系,而且以河西为军事基地,不仅经常向北出兵攻击匈奴<sup>①</sup>,还向西进一步控制了西域<sup>②</sup>,即使在形势不利时,还可坚守敦煌以确保河西。这就保证了中原王朝腹地的安全。而匈奴失去了河西这个重要的经济、军事基地以后,势力大为削弱,无奈地发出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哀鸣<sup>③</sup>。又经元狩四年(前 119)一役,汉王朝就取得了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

对匈奴斗争的胜利使汉武帝更加重视敦煌与河西在边防上所起的作用,于是下决心对这一地区进行经营和开发。在取得河西的当年,就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武威、酒泉二郡,修建了从令居至酒泉一段的长城。元鼎六年(前 111),又分割武威、酒泉郡的辖地设置了张掖郡和敦煌郡。不久,又继续向西修筑长城,从酒泉一直延伸到了敦煌的玉门关。在长城沿线、河西四郡与敦煌郡的阳关和玉门关,均设重兵把守。为了维持戍卒所需,汉武帝还在敦煌及河西其它地区实行了移民屯田和军屯等措施<sup>④</sup>,并组织人力兴修水利<sup>⑤</sup>。这些由内地来的移民和戍卒不仅改变了敦煌的民族构成,使汉人成为这里的主体民族;还由于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使敦煌从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再加上敦煌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它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已由一个不知名的居民点发展成为具有与内地相当的经济和文化水平的边防军事重镇。

唐初,李轨自立于河西,薛举占据陇右。他们称臣于突厥,与占

① 见《汉书》卷 96 上《匈奴列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② 在西域都护设立之前,西汉王朝对西域用兵,大多以敦煌和酒泉为据点。参见《史记》卷 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和《汉书》,卷 96《西域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③ 《史记》卷 123《匈奴列传》注引《西河故事》,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8 册第 1453 页。

④ 见《汉书》卷 96《武帝纪》、卷 96 下《地理志》第八下、卷 97《刘屈氂传》、卷 98《食货志》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⑤ 见伯 2860 号《沙州都督府图经》。



据着蒙古高原并控制着西域的突厥连成一片<sup>①</sup>,对新建立的唐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不仅突厥频频寇扰<sup>②</sup>,薛举父子也不断向东用兵<sup>③</sup>。为了在战略上取得边防主动权,唐王朝很快消灭了薛氏父子和李轨政权。这既剪除了突厥的羽翼,又隔断了突厥与吐蕃的联系<sup>④</sup>,使唐王朝以后在同突厥的斗争以及开拓西域时始终占据着有利地位。

由于敦煌与河西的得失关系到整个边防大局,所以唐王朝始终十分重视对河西特别是敦煌的经营。首先仍是加强军事防卫力量。早在武德年间,杨恭仁任凉州都督时,就在玉门设立了玉门军。以后,唐王朝又在沙州城内设立了豆卢军,在沙州附近及河西其它各州也分别设置了若干军与守捉,形成了一道“烽戍逻卒,万里相继”的严密防线<sup>⑤</sup>。为了解决居民和士兵的粮食问题,唐政府组织兴修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sup>⑥</sup>,并加强了对水利的管理<sup>⑦</sup>,还把督促农民耕种作为基层行政组织的职责之一<sup>⑧</sup>,从而使敦煌地区的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唐政府又通过和籴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sup>⑨</sup>,还效法汉代实行屯田,以解决军粮问题。这一系列措施使敦煌在开元天宝之际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在军事上,它是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经济上也成为全国的富庶地区,敦煌人以善于农耕而知名<sup>⑩</sup>。由于政局稳

①② 拙见《通典》卷 员苑(边防)《突厥上》(中华书局 员怨年版)。

③ 见《旧唐书》卷 缘(薛举传)(中华书局 员怨年版)。

④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员怨年版)第 员册第 远愿页云“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

⑤ 见《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员怨年版)第 员册第 远愿页;《旧唐书》卷 员远上《吐蕃上》(中华书局 员怨年版第 员册第 缘远页)。

⑥ 见伯 圆缘缘与伯 缘源号中之《沙州都督府图经》。

⑦ 见伯 猿源背《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

⑧ 见大谷文书 圆缘圆号第 缘远页。

⑨ 参看伯 猿源背《天宝年间河西豆卢军军仓收纳余粟麦牒》、伯 圆缘(天宝九载《敦煌郡仓收入粟麦豌豆等簿》)。

⑩ 大谷文书 圆缘圆《长安三年停逃户文书》内云“沙州力田为务,小大咸解农功”。

定,经济繁荣,中西交通也空前发达起来。不仅商旅如流,而且西域的乐舞和西方的宗教与中原的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使敦煌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特别是自西晋时起就开始在此传播的佛教<sup>①</sup>,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已深入到民间<sup>②</sup>。在北魏时已蔚然成风的开窟造像活动,此时更加兴盛,其艺术成就也达到了高峰。

以上事实说明,敦煌所以能够在汉代兴起,在唐代兴盛、繁荣,主要是由于它在定都长安的中原王朝的边防体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的。这些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所以十分注意对河西特别是敦煌的经营,是基于全局性的利害关系。因为“欲保秦陇,必固河西”<sup>③</sup>,对于他们来说,如果秦陇不保,就会危及国都根本。故秦陇必保,因而河西也就必固。

在自汉至唐的一千一百多年间,控制敦煌的中原王朝以长安为都城的有西汉(前206—8)、西魏(534—556)、北周(557—581)、隋(581—618)、唐(618—907)。十六国时期管辖敦煌的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401—460)等几个政权除前秦定都长安外,其它都是割据河西,作为河西门户和边防前线的敦煌对他们更加重要,非尽力经营不可<sup>④</sup>。建都在洛阳或离敦煌更远一点的有东汉(25—220)、曹魏(220—263)、西晋(265—316)、北魏(386—534),包括以平城为都的北魏(386—534)。总计都城在长安或长安以西的朝代与政权有10个,管辖时

① 参见《高僧传》卷一《竺法护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根据唐代敦煌写经题记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参加写经、开窟造像的不仅有皇室贵族,地方官僚,普通民众也不在少数(见姜亮夫《莫高窟年表》、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这说明佛教在敦煌已深入到普通民众之中。

③ 《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一十二·甘肃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页。

④ 十六国时期,中原社会动荡,大量文化典籍焚于战火,许多优秀学者毙命于战乱。而此时的敦煌仍维持着政治相对安定,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不仅早已扎根于此的中原文化未曾沦替,而且由于一些中原学者避乱于此而使中原文化大放异彩(参看施光明《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载《西北师学院报》1998年第3期)。

间达 300 年多一点。都城在洛阳或更远一点的朝代 10 个,管辖时间为 300 年。洛阳在长安以东数百里,对于定都在这里或离敦煌更远一点的政权来说,敦煌与河西在全国边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这必然会影响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如北魏政府中就曾出现过放弃敦煌,把边防线后撤到凉州的动议<sup>①</sup>。这当然不利于敦煌的发展。所以,汉唐间敦煌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但由于自汉至唐,敦煌处于这样的时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其余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统治敦煌的政权为了国都的安全一定会重视对它的经营。且东汉光武统一西汉,在其管辖敦煌的近 100 年中,对敦煌地区一直比较重视。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敦煌在汉唐之间可保持上升的总趋势。

唐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原王朝的国都逐渐向东向北迁移。五代时游移于洛阳、开封之间,北宋定都开封。以后,元、明、清三代,基本上是以北京为都。

中原王朝的都城距敦煌越来越远,敦煌在整个边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也就随之逐步下降。以前,敦煌与河西的得失,是一个危及根本、全局的战略问题,现在则变成了一个西北地区的局部问题。秦陇即使不保,国都也不至于受到威胁。与国都的迁移相关,宋以后中原王朝的边防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唐以前,危及全局的边患大多来自长安的西北边、北边;宋以后,主要威胁则来自开封、北京的北边和东北边;这就使中原王朝的战略防御重点随之大大地向东向北迁移。显然,国家边防重点的远迁,也导致敦煌在整个边防体系中地位不断下降。这样,敦煌也就逐渐不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原本是靠中原王朝的军事部署和人力、物力的投入才兴起、兴盛的敦煌,一旦失去中原王朝的重视和支持,其衰落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北宋的边防重点是北边的辽和后来的金。主要战场在河北的幽

<sup>①</sup> 见《魏书》卷 100《韩秀传》(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3403 页)。

州与河南的澶州。北宋最为重视的战略防线是河北平原的保州至泥姑海口一线,即开封的北方、东北方。而两汉、隋唐时与少数民族政权斗争的主要战场和防范重点是在长安的西北部、北部。二者比较,主要战场和战略防线大大地东移了。北宋与西夏在李继迁和李元昊时虽也曾两度交战,但更长时间内是保持和平局面。而且,对以开封为都的北宋王朝来说,灵州一带已是西北边陲,得失不足以动摇全局,当然也就不能成为边防重点。敦煌在灵州以西,离开封更远,其地位也就更加微不足道了。所以,五代宋初时,曹氏归义军政权统治的敦煌已失去了作为中原王朝边防军事重镇的地位<sup>①</sup>,以后这里又落到了西夏手中。在唐代人看来,敦煌与河西属于“心腹”<sup>②</sup>,到北宋时,就视其为外藩了<sup>③</sup>。当然,此时敦煌的地位还没有降到谷底,它仍是河西的门户,其得失仍关系到河西甚至整个西北地区的安危,故仍是西北地区的边塞要地。

元代的都城设在大都(北京),与北宋相比,都城离河西更远了,敦煌在全国边防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进一步下降。但由于它仍是西北地区的边塞要地,故元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防守尚能注意,不仅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戍军,还曾征调民伕修筑沙州城。尽管如此,地区性的边塞要地自不可与全国性的边防重镇同日而语,前者所需的人力、物力等物质基础比后者要小得多。于是元统治采取了从敦煌往甘州移民的措施<sup>④</sup>,其结果是使敦煌在经济上也迅速衰落。

① 此时汉文化仍赖曹氏政权得以保存,而且在中原佛教开始走下坡路的历史条件下,敦煌的佛教文化仍保持着繁荣的景象。参看本书“一、敦煌”。

② 《贞观政要》载褚遂良疏称“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06 页);另郭元振也把“甘、凉、瓜、肃”之患称为“内患”(《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9 册第 303 页)。

③ 见《宋会要辑稿》卷 183《蕃夷》缘。

④ 《元史·世祖本纪》载“沙州、瓜州民徙甘州,诏于甘、肃两界,画地使耕,无力者则给以牛具、农器”(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精装第 1 册第 347 页)。

明朝的劲敌先是北部的蒙古人,后是东北的女真人。这迫使明统治者把边防重点先是放在国都北京的北部,后是放在东北部。尽管如此,北部蒙古族的瓦剌部还曾兵围北京,东北的女真统治者皇太极也曾兵迫都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明统治者根本无暇经营西北边荒的小镇敦煌。所以,在号称封建社会盛世之一的明朝,也没能给敦煌带来复兴的希望。不仅复兴无望,明统治者在设防时还在肃州以西 40 里处的嘉峪山西麓修筑了嘉峪关,并以此为河西的门户,派兵据守,从而使西北地区的边塞要地从敦煌后撤到了嘉峪关和酒泉。随之而来的是嘉峪关通哈密之路成为陆路中原与中亚往来的干线。这就意味着在明王朝防线之外和中西交通陆路干线之南的敦煌又进一步失去了屏蔽河西与中西交通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其得失不仅无碍整个边防大局,甚至对河西也没有多大影响了。地位如此,它的进一步衰落也就成为必然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明统治者以嘉峪关为国门,把关以西包括敦煌在内的广大领土视作藩属,任由少数民族占据,致使敦煌不仅在经济上进一步衰退,连元代时此地还在流行的佛教,也由素不信佛的少数民族成为这里的主人,而造成了“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掩”<sup>①</sup>的严重后果。这是敦煌的悲哀,却不是明统治者比汉唐统治者缺乏远见,明统治者对北部、东北部边防的经营决不亚于汉、唐统治者对西北的经营,以致史家有“终明之世,边防甚重”的评语<sup>②</sup>。

到了清代,敦煌又回到了中原王朝的怀抱,并且由于招民屯种而使其经济有所复苏。但是,春风难度嘉峪关,由于使敦煌兴起、兴盛的历史条件一去未返,所以,终清之世,它也不过是西北边陲的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小县城<sup>③</sup>。

① 道光辛卯版《敦煌县志》(校注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年版卷 第 8 页。

② 《明史》卷 98《兵志》,《边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精装第 1 册第 4 页)。

③ 《清史稿》卷 123《地理志》“(雍正元年)复置沙州所”,“(三年)旋升沙州所为卫”,到乾隆二十五年,才“以沙州卫为敦煌县”(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 册第 4 页)。

此外,敦煌之军政、经济、文化兴衰的次序和人口增减的原因也说明,敦煌的兴衰是由其在全国边防体系中地位的变化决定的。敦煌的兴起,首先是成为一个边防军事重镇(西汉时),尔后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促进了对敦煌的开发,从而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经济繁荣一段时期以后,它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城市(十六国时),而其成为佛教城市就更晚一些(隋唐时)。其衰落次序是先在五代宋初时失去中原王朝边防重镇的地位,但其文化尤其是佛教还是兴盛,元代时经济又明显衰退,佛教虽仍在流行,但中原教派已趋衰微,到了明代,佛教也终于一蹶不振了。可见,敦煌的兴起与衰落与其在军事上能否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呈对应关系,而敦煌能否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则取决于它在全国边防体系中的地位。

敦煌历史上人口的增减,起主要作用的也不是自然因素,而是政治因素。首先是利用行政手段派兵和移民。如西汉时不但在此派驻重兵,而且还从内地往这里大量移民,使敦煌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到有**属国**户,徙**边**人<sup>①</sup>。元代时把这里的大量居民内迁,在明代,连占据这里的少数民族也被相继内迁<sup>②</sup>。故其人口显著减少,有的学者估计已不满万人<sup>③</sup>。不同时期的统治者采取完全相反的措施并非偶然,而是由于敦煌的地位已发生变化使然。其次,另一个影响敦煌人口变化的因素是中原的战乱。唐以前,由于敦煌是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又由于河西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故在中原离乱时,握有重兵的大将往往据河西自立。如汉代的窦融、西晋的张轨、前秦的吕光等均属此类。在这种情况下,苦于战乱的人们往往去投奔相对安定的河西,从而使这个地区的人口有所增长。如窦融割据

① 见《汉书》卷**四**下《地理志》第**四**下(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第**四**册第**四**页)。

② 见《明史》卷**四**《西域传》(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精装第**四**册第**四**至**四**页、第**四**页)。

③ 参看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续),载《敦煌学辑刊》第**四**集(**一九八**年)。

河西时,中原地区的“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sup>①</sup>。张轨割据河西时,也是“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sup>②</sup>。这些投奔河西的人有不少流落到了敦煌,他们中不乏文化人。所以,敦煌文化的发展也往往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唐以后,由于敦煌已非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长时期内成为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故即使中原有战乱(如元末、明末),人们也不会流到那里去避难了。

应该指出,除了上述影响敦煌兴衰的主要原因以外,以下一些因素对敦煌兴衰也有不同程度影响。

其一,中原王朝的兴衰对敦煌的兴衰有重要影响。当中原王国力强盛、内部稳定、处于盛世时,敦煌就发展较快,如西汉前期、唐前期等。反之,它的发展就慢一些,甚至会停滞、倒退。如东汉末年,中原大乱,河西的武威、张掖、酒泉都建立了割据政权,敦煌则“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sup>③</sup>;又如唐中叶时,中原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而衰,由于大批守军被调往中原奔赴国难而使西北边防空虚,吐蕃才乘机占据了敦煌。但上述影响只是局部的和短时期的,它不能改变唐以前敦煌兴起、上升和唐以后敦煌逐渐衰落这个总趋势。唐以前,中原王朝即使力量不足,也要尽力守住敦煌这个边防重镇;唐以后,即使在元、明、清三代的全盛时期,也未采取复兴敦煌的措施。

其二,少数民族的活动,也是影响敦煌兴衰的一个因素。在中国古代,一般说来,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在经济、文化、社会制度诸方面要落后一些。敦煌在西汉以前,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当然比较落后;从汉至唐,它基本上被控制在汉族手中,故赶上了内地的发展水平。从西夏占领后到明代,它基本上又成了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

① 《后汉书》卷四《窦融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4 册第 34 页)。

② 《晋书》卷四《张轨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4 册第 34 页)。

③ 《三国志》卷五《魏书·仓慈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 册第 74 页)。

这确是它日益衰落的重要原因。但少数民族能否占据敦煌,除了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原王朝力量对比有关外,也受到敦煌在全国边防体系中地位变化的制约。如西汉前期,敦煌本在匈奴控制之下,但由于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西汉王朝一旦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就立即用武力把匈奴赶走,并将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在明初,把蒙古残余从敦煌赶走本是轻而易举之事,但由于其地位已无足轻重,故听任少数民族占据。

最后,丝绸之路的兴衰,对敦煌的兴衰也有一定影响<sup>①</sup>。自汉至唐,丝路一直比较兴盛,而敦煌又是丝路的咽喉<sup>②</sup>,这对敦煌商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绚丽多彩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代以降,海上交通日益发达,中国和西方各国往来多半改走海路,从中亚到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也日益繁忙,使经由河西的丝路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明代以后,甚至河西通中亚的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这些确是导致敦煌日益衰落的重要因素。

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丝路兴衰对敦煌兴衰的影响,因为丝路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原王朝对敦煌与西域的控制。当中原王朝牢固地控制敦煌与西域时,丝路就比较兴盛,如西汉前期、唐前期等;反之,丝路就萧条,如在西夏占领敦煌及河西时,商人与使团就不得不去开辟敦煌及河西以外的新路。而且,唐以后,中原王朝国都的迁移,对经由敦煌的丝路之衰落也有重要影响,但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本文的论述表明:古代敦煌兴起、兴盛的过程,就是以长安为都的中原王朝把它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与内地经济、文化水平相当的边

① 张锡厚在《敦煌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0页),庄壮在《敦煌石窟音乐》(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页)中都认为丝路的衰落就是敦煌衰落的原因。

② 隋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指出丝绸之路“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卷 21裴矩传))(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2册第 144页)。



防军事重镇的过程 ;其衰落的过程,也就是由边防重镇逐步下降为塞外小城的过程。这中间,中原王朝与丝路的兴衰以及少数民族的活动等因素也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发生过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从表面上看,敦煌的兴起、兴盛与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因素,但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在历代统治者人为活动的背后,中原王朝国都的所在地和边防重点的位置起着决定的作用。

(原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 三、古代敦煌文化的特点

古代敦煌文化属于地域文化或地方文化,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敦煌文化的特色,是由其在古代中西交通的重要地理位置决定的。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主要依靠陆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陆路就是丝绸之路,它始自长安(今西安),西行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出阳关或玉门关,经过新疆、中亚,可以和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联结起来。历史上,在海运和空运发达以前,这条道路一直是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线。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在党河下游的一块绿洲上,它的南面是属于祁连山脉的三危山,北面是北山山脉,西边扼玉门、阳关两关。从敦煌向西,在隋代时已有三条道路通往西方,而敦煌则是这三条道路的必经之地。所以,古代敦煌是中原与西域、中国与西亚乃至欧洲、北非交往的咽喉。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才使它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的一颗明珠和中原王朝对外交往的窗口。

敦煌首先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以中转贸易为特征的商业城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中西经济交流之路,早在汉代,这条道路就已行旅不断,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张骞两次通使西域。张骞以后,汉朝派到西域去的使臣每年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每批大的几百人,小的

百余人。这些使团每次出使都携带内地的物品到西域去贸易,所以使者队伍实际上也是商队。同时,西域的使者和胡商也经常来往内地。正是通过敦煌这个中西交通的咽喉,中原地区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被大量输送到西域。除了丝、丝织品和金属工具,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如铸铁、凿井(包括井渠)、建筑技术等也经由敦煌传到了西域和中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也陆续经由敦煌向东土移植;中亚的毛布、毛毡、汗血马、骆驼、各种珍禽异兽,也都源源东来,从而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曹魏时,敦煌太守仓慈对西域商人采取保护措施,西域各国商人纷纷前来,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商业城市。到了唐代,由于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西域诸国的使者,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经济交流也空前活跃。在当时敦煌的集市上,有内地来的汉族商客,更有从中亚各国来的胡商。史书上记载当时“兴胡之旅,岁月相继”。各地来的行商坐贾在敦煌从事着中原的丝绸和瓷器、西域的珍宝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物品的交易,使这个自曹魏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更加繁华。宋元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随着陆路丝绸之路的衰落,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也日趋下降。

其次,古代敦煌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都会,古代丝绸之路还是中西文化交流之路。中西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扩大,给敦煌带来了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使其成为各种文化的汇聚之地。汉文化之外,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在汉代经过敦煌传到中国。曹魏时期,已有僧人在敦煌传教的记载。西晋时期,高僧竺法护、竺法乘先后在敦煌活动,为敦煌在隋唐时成为全国佛教圣地奠定了基础。北朝时期,佛教石窟艺术传入敦煌,而早期敦煌石窟艺术间接受到了希

腊文化的影响。到了唐代,敦煌的文化更加绚丽多彩。佛教以外,当时在敦煌城东一里处有中亚粟特人信奉的祆教(拜火教)神祠。这所祆庙周回五百步,院内立舍,舍内画有神主,共二十余龛。在晚些时候的敦煌白画中,也有祆教尊奉的神的形象。唐前期敦煌还立有景教寺院,名为大秦寺。藏经洞中就保存了七种景教经典,并有景教经目一卷,记录景教经典**七**种,分别为初唐和中唐译本。此外,藏经洞中还发现了开元年间写的摩尼教经典。这些都反映了中亚、西亚宗教在敦煌流传的情况。

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文化都会中,汉文化自汉代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敦煌地区的汉文化是汉武帝经营敦煌与河西时由移民和驻军带来的,并逐渐扎下根来,开花结果。东汉魏晋时,敦煌已出现张奂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名儒。唐前期的沙州有许多传授汉文化的官私学校。当时沙州和唐王朝治下的其它地区一样,在敦煌城内州衙西三百步设有州学校。内有经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 **三百**人。州学之下,敦煌县设有县学校,设博士一人,助教一人。私学则包括私人学塾和寺学。官私学校均以孝敬父、师,忠君报国为主旨,所用教材则以儒家经典为主。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如《尚书》、《易经》、《左传》、《穀梁传》、《礼记》、《文选》、《论语》、《毛诗》、《孝经》等儒家典籍和《千字文》、《太公家教》、《开蒙要训》、《新集严父教》等启蒙读物,其中一些就是当时学校的教材。正是由于汉文化始终在敦煌占据着主导、支配地位,才使这里虽然是各种文化交汇的文化都会,却又没有成为各种文化的杂烩。因为有雄厚的汉文化基础,才使敦煌与河西不仅仅是一条文化交流的河道,还是一个文化交流的枢纽站。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在这里停驻的过程中,一方面互相融汇,一方面又从当地的文化中汲取营养,然后以多少带有敦煌与河西地方特色的,改变了的或发展了的形式,再从这里流向中土、西方、蒙古和西藏。如唐代深受中原人民喜

爱的名为《凉州词》、《甘州》的软舞曲，实际上就是在河西地区经过改变的西域乐舞。

第三，古代敦煌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据史书记载，汉代以前，曾有乌孙、月氏和匈奴先后在敦煌地区活动。汉武帝将敦煌与河西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以后，通过移民和驻军等手段使汉族成为敦煌的主体民族。但因敦煌地处胡汉交接之地，所以，从汉至唐，汉族始终未能成为敦煌的单一民族。如在唐代，敦煌地区的居民有汉族、退浑（吐谷浑）、吐蕃、回鹘等。甚至中亚来的胡商也在敦煌建立了聚落，如敦煌城东的沙州十三个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以善于经商著称的中亚粟特人组成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沙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处有兴胡泊，就是因为胡商在经过玉门关时常在这里停驻而得名。唐后期以降，回鹘在敦煌的影响越来越大。至宋代，史书在记载敦煌入使中原时，有时是将以汉族为主体的归义军政权与回鹘并列的，足见当时回鹘在敦煌的势力之大。归义军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汉族虽仍为敦煌地区的主要民族，但敦煌地方政权却长期掌握在少数民族手中。这种情况直到清代才改变。可见，在敦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月氏、匈奴、汉族、突厥、吐蕃、吐谷浑、回鹘、粟特、党项和蒙古等诸多民族都曾在这里轮番演出或同时登台，也正是我国历代各族人民不间断的努力，共同经营开发这块土地，才有了作为文化宝库的敦煌。同时，敦煌的文化和民俗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明显的多民族特色。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吐蕃管辖敦煌时期，敦煌既使用汉语，也使用吐蕃语，既使用汉文，也使用吐蕃文。这样的民族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

最后，汉唐时期的敦煌文化还是具有国家级水平的地方文化。汉唐时期的敦煌，是对全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边防重镇。由于军事上的重要性，中原王朝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使敦煌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始终与内地相当。如在唐代，敦煌作为全国著

名的佛教城市,有奉皇帝敕建的大云、灵图、龙兴、开元等官寺。所以,长安、洛阳两都新译佛经都能很快传到敦煌。如高僧玄奘在唐初新译的佛典,敦煌藏经洞中就发现了很多,其中仅《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写本就保存了一千多个号。其它唐朝流行较广的经典,在藏经洞中也保存了很多。其次是不少有名的高僧从长安前来敦煌弘传佛法,如高僧昙旷就在敦煌居住 15 年,撰写了不少解释大乘佛教的著作。这样,倡言无论贵贱贤愚,只要专心念佛,凡夫皆得脱离秽土,转生净土的净土宗等在中原流行的廉价成佛、快速成佛的佛教思想也流传到了敦煌。与此同时,中原寺院的壁画样稿也随同佛教经典和高僧来到了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了大批由内地传来的经变画粉本,如《弥勒下生经变》、《劳度叉斗圣变》等等,虽然逸笔草草,但人物状态和故事情节都已具备,完全可供画工作为创作的依据或参考。另一方面,由于敦煌是当时对外交往的窗口,是最早接触新事物和新文化的地区之一,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方面有时还可以领先于内地。仍以唐代佛教而论,在唐前期中外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唐前期敦煌的佛教继续受到印度和西域佛教的影响。贞观年间,玄奘从印度带回大量经像;王玄策四次出使印度,携回图本;著名画家尉迟乙僧等来自西域,“画外国及菩萨”,声誉很高。从一些菩萨像的装束、姿态来看,唐代前期的敦煌艺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中印度笈多王朝艺术的影响。由于敦煌能够及时从中原和西方两个方面吸收新鲜营养,所以,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其艺术成就足以代表唐代,它不仅在当时不知震撼了多少人的心弦,就是直到今天,也仍然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五代至宋,敦煌地区的文化水平逐步降低。以石窟艺术为例,中原宋塑、宋画的写实风格 and 多姿多彩的绘画技巧未能对同时期敦煌石窟艺术产生明显的影响,透露出这一时期敦煌的艺术水准已达不到同期中原的水平。

## 四、二十世纪的敦煌学

敦煌是甘肃省最西边的一个只有**四**多万人口的县级市。它在兰新铁路之南百十公里，从敦煌火车站下车，乘汽车还要走**猿**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敦煌市，敦煌是沙漠、戈壁包围中的一小块绿洲。如此偏僻、荒凉的地方怎会有那么大名气，居然在**灵远**年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并在次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列入的有泰山、北京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而且还形成了一门因地名学的敦煌学，连北京这样一座著名的古都也没有产生北京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有必要在介绍敦煌学的研究情况之前，简单介绍一下产生敦煌学的历史背景。

### （一）产生敦煌学的历史背景

敦煌学之产生源于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和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的研究。所以我们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敦煌莫高窟和莫高窟藏经洞。

### 莫高窟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今敦煌市东南 25 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坐西朝东,前临宕泉,面对三危山。莫高窟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 (384) (或认为此建元应属东晋,即 385 年),经北凉、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历时千年,在武周时已有“窟龕千余”。这些历代开凿的洞窟密布岩体,大小不一,上下错落如蜂窝状,全长达 2171 余米。莫高窟窟群被分为南北两区,现存有壁画、塑像者共 492 窟,多分布于南区;北区除少数洞窟有壁画外,其余 163 多窟均无壁画塑像,多为当时僧人居住的僧房和库房等。有壁画、塑像的洞窟共有壁画约 45000 平方米,彩塑 2040 余身。这些石窟以彩塑为主体,四壁及顶均彩绘壁画,地面漫铺花砖,窟外有窟檐,是当时佛教信徒修行、观像和礼拜的处所。

在我们今天看来,敦煌石窟是以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遗存。敦煌莫高窟是全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一处石窟艺术遗存。它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具有重要价值 (有人将其称为中国古代美术博物馆),还为研究音乐舞蹈史以及古代生产、生活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保存了珍贵的图像材料。

### 莫高窟藏经洞

宋元以后,莫高窟逐渐衰落,不再为世人所知。11 世纪末,一个名叫王圆箴的道士来到了莫高窟。1900 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在敦煌莫高窟第 492 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一丈见方,六尺多高的复洞 (现编号为第 493 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六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摺本 (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



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上一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此外,二十世纪初以来,在古敦煌管辖的范围内还出土许多汉晋简牍。这样一些文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

那么,敦煌为什么会保存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呢?这与敦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处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

### 援古代敦煌的地理与历史

#### (员) 河西与敦煌的地理特征

古代的河西与敦煌在地理上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她是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线。

河西走廊南面是祁连山,高度在海拔四千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再往南是青藏高原,不便通行。河西走廊北面的北山虽山势较祁连山低平,但它的北边是蒙古高原的荒漠,通行也比较困难。这样,夹在南北两山之间的河西走廊就名副其实地成了一条地理上的走廊。历史上,在海运和空运发达之前,它一直是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线。从河西走廊西行,经过新疆、中亚,可以和南亚、西亚乃至欧洲连接起来。中原的丝绸、瓷器、技术、发明和文化典籍等都是通过河西、敦煌向西传播,而中亚、西亚甚至欧州的特产、珍宝和音乐、宗教、艺术等也是通过敦煌、河西传入中原。

其次,她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中间地带。

在中国古代,河西以内在大多数情况下归中原王朝管辖,河西以外则经常被少数民族占据。故河西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谁占领了这一地区,谁就占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权。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斗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汉初,河西被匈奴占据。匈奴经常以河西为基地,骚扰陇右地区,西汉王朝的都城长安也时时受到威

胁。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河西匈奴,将敦煌与河西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此后,汉王朝在与匈奴的斗争中就占据了有利的地位。汉王朝以河西为基地,向北攻击匈奴,向西经营西域,完全改变了以往被动挨打的局面。

正是由于敦煌与河西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才使得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都要积极争取对河西的控制权。

最后,她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河西东有黄河之险,西有阳关、玉门关相阻,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容易产生割据势力。如东汉的窦融和五凉时期李轨等都曾在河西建立割据政权。特别是在中原发生战乱时,河西的割据势力有时能给河西、敦煌带来相对的平安,这对河西、敦煌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是有利的。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咽喉,河西的门户,在河西四镇中又具有特殊的地位。

由于以上的地理位置,使敦煌在古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频繁出入轮番演出的大舞台,成为中西各种文化的交融荟萃之地。剽悍的胡骑、抗戈的汉卒、扬鞭的牧民、垦荒的农夫、虔诚的僧侣、远行的商队、往来的使者,都在这里留下了脚印,洒下了汗水。也正是由于我国历代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共同经营开发这块土地,才有了作为文化宝库的敦煌。

#### （四）敦煌简史

依据考古资料,在中原的夏代时,敦煌一带已有人类活动,这就是玉门市火烧沟类型文化的主人。

战国至秦时,敦煌一带曾居住过塞种人、乌孙人和月氏人,后来月氏强大,打败并赶走了乌孙。秦汉之际,匈奴强盛,打败了月氏,成为敦煌地区的新主人。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19),名将霍去病大败河西匈奴,河西与敦

煌归入中原王朝版图。汉王朝在敦煌设置郡县,建立军事防御体系,并大规模移民,把敦煌建设成为一个边防军事重镇。汉民族成为敦煌主体居民,农耕成为主要生产方式。西汉时期是敦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东汉时期,敦煌又发展成为中原王朝控制西域的军政中心。

曹魏时,由于郡守仓慈推行保护商人的措施,使敦煌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城市。中原的大族与汉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在敦煌扎下根来,佛教徒的活动也开始见于记载。

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五个政权。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破坏相对较小,文化由于中原文化人的流入反而有所发展。一般认为莫高窟的开凿始于这一时期。

北朝时期敦煌的特点是政治不稳定,经济衰退,佛教兴盛,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活动多了起来。

隋唐时期,敦煌达到了鼎盛期。经济文化均与内地水平差不多,并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佛教城市,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均很频繁。

宋元明时期,是敦煌持续衰落的时期。元朝统治者曾两度从河西西部的敦煌等地往酒泉、张掖移民,使这里从事农耕的汉族大大减少,少数民族又成为敦煌的主体民族,游牧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明王朝更在酒泉之西修筑了嘉峪关,派兵据守,敦煌失去了河西门户的地位。同时,经由河西走廊的中西交通陆路通道也不再经过敦煌,而是改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敦煌又失去了陆路中西交通中转站的地位。所以,在明统治者眼中,敦煌成了无足轻重的边塞小城,长期得不到安定,又始终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最终在公元1513年被吐鲁番占据。

敦煌藏经洞一般认为封闭于宋代,即归义军晚期,时间在十一世纪初。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攻占了与敦煌有姻亲关系的于阗,使敦煌佛教界恐慌,故将佛教典籍和部分重要的文书封存了

起来。

清统治者在平定新疆以后,曾往敦煌移民,使这一地区的经济有所复苏。但由于使敦煌兴盛的历史条件已一去不返,所以,终清之世,敦煌不过是一个处在边远偏僻之地的小县城。

### 源 援外国文化强盗在敦煌对中国文物的劫掠和破坏

敦煌藏经洞发现于 员圆年,时值清王朝末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公然派遣的八国联军侵入我国。正忙于奔跑逃命的清政府自然无暇顾及西北边陲发生的事,而当时甘肃、敦煌的地方官员又大多昏聩无知,遂使藏经洞中发现的稀世珍宝未能得到应有的保护,结果被打着探险名义的帝国主义文化强盗掠走了其中的大部分。

第一个到敦煌盗宝的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于 员圆年 猿月至 缘月和 员源年 猿月曾两次到敦煌,采用哄骗的手法掠走 员圆件多件写本、印本经卷与文书和 缘箱艺术品。这些经卷和文书现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艺术品则藏在大英博物馆。

员圆年 圆月至 缘月,法国人伯希和率“探险队”来到敦煌,掠走经卷文书 缘件多件,另有一批绢画和艺术品。这批敦煌文献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绢画和艺术品现藏吉美博物馆。

员圆年,清政府下令将劫余的敦煌文献押解回京,入藏京师图书馆,约 愿余轴。但王道士在此前已收藏起来一批,清政府的押解官员也未把藏经洞收拾干净。

员圆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敦煌停留八周。员源年吉川小一郎又从新疆返回敦煌,这两次他们共带走数百件敦煌文书。这批文书后来散落到日本的京都和韩国的汉城等好几个地方。

员源年至 员缘年,俄国人奥登堡率“探险队”来到敦煌,得到 员余件经卷文书和约 猿件绢画、纸画、雕塑等艺术品。这些经

卷文书现藏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艺术品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1958年,甘肃省教育厅再次对莫高窟进行彻查,又获得藏文文书 800 册。这批东西现分藏于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兰州等地。

1949年至 1951年间,数百名在国内战败的沙俄白匪军越过边界逃入中国,被中国当局扣留。当局竟以莫高窟的佛教洞窟作为拘押这批残匪的场所。这些绝望之徒在莫高窟中居住长达半年之久,在窟中生火做饭,致使浓黑的烟油污染了大批的壁画。

1956年,美国“探险者”华尔纳又从敦煌掠走壁画十多幅,塑像一尊。

敦煌文献与文物的流散,无疑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但它在客观上也推动东西洋学者从不同角度来研究敦煌文献和文物,并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

## (二) 敦煌学的兴起和发展

自 1900年至今,敦煌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 1900年至 1949年)敦煌学的兴起

从 1900年至 1949年,是敦煌学的兴起时期。敦煌学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学术新潮流。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1908年,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 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拍照。这是我国学者接触、研究敦煌文献的开端。

1933年 8月,王仁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

石室真迹录》<sup>[15]</sup>月,罗振玉出版了他和蒋斧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石室秘宝》(民国初年,存古学会辑)、《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罗振玉辑)、《敦煌零拾》(1918年,罗福葆辑)、《沙州文录补》(1918年,罗福葆辑)、《敦煌石室碎金》(1918年 缘月,东方学会编)等。上述著作几乎公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敦煌文献的录文和照片图版。这些著作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伯希和 1908年带到北京的敦煌文献和伯希和归国后陆续寄给罗振玉等的敦煌文献照片,也有少量购于民间的私人收藏品和入藏于京师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还有一些系罗福苾、罗福葆分别从日本狩野直喜处和美国人影本转录的英藏敦煌文献录文。这一时期公布的内容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书为多,但也有不少有关佛教、道教、摩尼教经典和少量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通俗文学等方面的文书。

在整理、刊布上述文献的同时,我国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等人还对不少写本的性质、价值进行了考证与论述。

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入藏京师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进行整理。有两项重要成果,一是 1914年佛学专家李翌灼在遍阅京师图书馆所藏的八千多件敦煌写经的基础上编成了《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为研究京师图书馆收藏的佛经指出了门径。1915年,京师图书馆更名北平图书馆,邀请陈垣先生对所藏敦煌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于 1916年完成了详细记载每卷起、迄,纸数、行数、题记和残缺情况的《敦煌劫余录》。这是最早的一部敦煌文献馆藏目录,水平也比较高。为学术界了解、使用北图所藏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一时期另一项值得一提的工作是 1918年出版的《敦煌掇瑣》,刘复编。此书的特点一是材料来源与他书不同,二是所收内容

比较广泛,所收**原件**敦煌文书多为我国学者前所未见,其内容包括民间文学、语言文字、社会经济、官府文书等多方面材料,完全超出了四部书的范围。这部书开阔了国内研究者的眼界,为他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原始材料,从而促进了国内学者对敦煌文献的研究。

在国外,日、法、英等国在这一时期也都开展了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其中以与中国文化同源的日本行动最快。**1908**年,《朝日新闻》以《敦煌石室的发见物》为题报道了敦煌发现藏经洞及伯希和从敦煌带走大批古书的消息。同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在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第二次总会上展览了罗振玉寄赠的敦煌文献照片,由几位专家对照片作了讲解,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轰动。**1910**年,从欧洲留学回国的黑板胜美博士将其在伦敦考察斯坦因劫去敦煌文物的情况向日本学界作了介绍。**1910**年,在北京任教官的藤田丰八出版了《慧超传笺释》,对伯希和劫走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注释。

此后,狩野直喜、矢吹庆辉、藤田湖南、石滨纯太郎、小岛祐马等日本学者又先后赴法、英考察、抄录、拍摄敦煌文献。并陆续出版了:《佛典研究》(松本荣三郎**1910**年)、《敦煌遗书》(影印本、活字本)(羽田亨与伯希和合编,**1910**年)、《三阶教研究》(矢吹庆辉**1910**年)、《大正新修大藏经·**缘**卷·古逸部、疑似部》(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18**年)、《沙州诸子廿六种》(小岛祐马**1918**年)、《鸣沙余韵》(矢吹庆辉**1910**年)等一批著作和论文。

法国,伯希和自**1908**年北京回到巴黎以后,用很大精力从事对敦煌文献与文物的研究。他首先对劫去的敦煌文献进行初步清理,编成了一个草目,并对其中的汉、藏、回鹘、粟特等多种语言的敦煌文献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从**1909**年开始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亚细亚讲座,介绍他研究敦煌文献的成果在这个讲座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还利用在敦煌拍摄的照片,于**1910**年至**1910**年出版了六卷本的

《敦煌石窟》。这是有关敦煌佛教艺术最早的大型图集。

英国开始对敦煌文献的研究稍晚一些,但也于 1908 年将敦煌文献交给翟理斯进行整理和研究。

总之,到 1914 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并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寅恪先生在为《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将这门学问概括为“敦煌学”。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敦煌学这个新词。此后,“敦煌学”这一名词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此时的敦煌学主要指的是对敦煌文献的研究。

第二阶段(1915 年至 1937 年)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拓宽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更多的东西方学者投身到敦煌学研究中来,促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

其一,中日学者继续到法英考察、抄录、研究敦煌文献,中国去的人数增多。有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等,日本有那波利贞、神田喜一郎等。与前一时期相比,资料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向学术界介绍、公布或带回的敦煌文献录文、照片的范围也更加广泛。

王重民和向达陆续发表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王重民 1934 年)、《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向达 1935 年)、《伦敦所藏敦煌群书叙录》(王重民 1937 年)等论著,使国内研究者对巴黎、伦敦的敦煌文献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寄回或带回的文书录文或照片则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研究资料。

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敦煌历史和俗文学方面,王重民和向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王重民的《金山国坠事零拾》(1934 年),利用敦煌文献中有关资料,对史籍记载简略的金山国史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使之“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向达不仅利用敦煌文献结合文献资料撰写出了敦煌俗文学的著名论文《唐代俗讲考》(1935 年、1937 年),以后发表的《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还开辟了将敦煌文



迹、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洞窟壁画结合起来研究敦煌史地的新途径。

对英法所藏敦煌文献研究的进展促进了国内学者对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进一步整理。许国霖将其中的题记和变文、契约等世俗文书录出,辑成《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出版)一书,为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日本的那波利贞在 1904 至 1905 年留学欧洲期间,仔细阅读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并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进行了抄录和拍照。在那波利贞以前,旅欧访察敦煌文献的东方学者,其注意力主要放在佛教典籍和四部书上,而那波利贞关注的主要是寺院文书、社邑文书等社会经济资料。回国以后,那波利贞长期致力于对这批在当时被称为“杂文书”的整理、介绍和研究。他曾多次在日本史学研究会等学术会议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了《梁户考》(1905 年)、《关于唐代的社邑》(1905 年)等若干篇著名论文。那波利贞的研究拓宽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使学术界对敦煌文献中的所谓“杂文书”的内容和价值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那波利贞以后去欧洲考察敦煌文献的神田喜一郎,在回国后完成了《敦煌秘籍留真》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而仁井田陞则在日本国内完成了他的敦煌学巨著《唐宋法律文书研究》。

其二,在三、四十年代,对敦煌石窟艺术的考察和研究得到了中日学者的重视。

这一时期,我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实地考察的人逐渐增多。他们分别就其专长在这里进行了踏查洞窟、抄录碑文题记、临摹壁画等工作,并对壁画的内容、建窟年代、洞窟的分期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还通过撰文、著书、展览临摹的壁画等形式向国人宣传、介绍莫高窟。贺昌群《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1934 年)是国内有关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对敦煌石窟艺术

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并择要介绍了若干洞窟的壁画,使国人对千佛洞的内容和结构有了大体的了解。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调查》,则是莫高窟最早的一份内容总录。张大千的临摹品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展出中,曾引起轰动。

张大千曾两次奔赴敦煌,其中第二次他率子、侄、夫人前往,在敦煌停留长达两年(1941—1943年)。在这两年中,他对敦煌及其附近的文物古迹进行了系统调查,并为莫高窟和榆林窟编了号,同时临摹了莫高窟中各时期壁画的代表作以及部分雕塑精品,还写了《敦煌石室记》一书。去敦煌考察、临摹壁画的还有向达、阎文儒、谢稚柳、何正璜、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经过这些学者的介绍与宣传,莫高窟在学术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

1943年猿月,民国政府在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呼吁下(于右任、向达、贺昌群等),决定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圆月员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为所长。他从重庆招聘了以美术工作者为主体(董希文、潘絜兹等),包括美术史(史岩、李浴)、文献(苏莹辉)、测绘(胜其力)、摄影(罗寄梅)等专业人员二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个保护、研究敦煌文物的专门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员自愿来到荒凉的莫高窟,身居破庙,饮食苦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担负起保护莫高窟的重任,并开展了临摹、记录、测量、考证等方面的工作。修筑了保护洞窟的围墙、对洞窟内容进行了初步踏查和考证、抄录了供养人题记、对主要洞窟进行了简单的测量和绘图、整理了土地庙发现的藏经。史岩编著了《敦煌石窟画像题识》,这是我国第一部对石窟题记进行整理考证的著作。抗战结束以后,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撤消,人员均返回了内地。后经向达、傅斯年等著名学者和所长常书鸿四处活动,八方呼吁,民国政府决定保留敦煌艺术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1946年秋,常书鸿所长重返敦煌,又在重庆、成都、兰州等地招聘了段文杰、霍熙亮等一批自愿献身于敦煌

石窟艺术的专业人员。**1957**年和**1958**年,又从成都等地来了史苇湘等一批美术工作者。这一时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临摹壁画,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1959**年秋,三年间临摹壁画**1200**幅,计**1000**平方米,临摹塑像五件。

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则在这一时期出版了《敦煌画の研究》(**1959**年)和《敦煌画の研究・图像篇》(**1960**年)。

这表明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已由敦煌文献扩大到敦煌石窟艺术。

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人们对敦煌学这一概念的认识也逐步深化。**1960**年,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在龙谷大学作“敦煌学五十年”的学术报告时,已开始把对敦煌壁画的研究纳入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

第三阶段(**1960**年至**1979**年)敦煌学的稳步发展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它已成为一门显学。

在敦煌石窟艺术方面。

**196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接由文化部领导,仍由常书鸿任所长。并增加了人员编制,扩大了工作范围。到**1979**年,已有各种专业人员**100**多名,分设美术、考古、保护、资料四个室。在这一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全面加固莫高窟。

**1960**年抢修了唐宋木构窟檐。**1962**年加固了第**100**窟至**103**窟一带的早期洞窟。**1963**年到**1964**年,对莫高窟进行全面加固,长度达**1000**米,使主要的洞窟得到全面保护,并能经受七级地震。加固的洞窟通道上下衔接,南北贯通,彻底改变了残破坍塌的旧面貌,使莫高窟焕然一新。

对窟内壁画和塑像也进行了抢修。使**10000**平方米的壁画和

圆身彩塑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二是临摹壁画。

临摹壁画仍是研究所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从 1949 年至 1959 年,段文杰等美术工作者共临摹了通史代表作、专题资料和原大整窟模型共 150 幅,计 1000 平方米,还临摹了彩塑 100 多身。这一时期的临摹水平比前一时期有了较大提高。

三是整理资料和编辑出版物,撰写论文。

他们对《石窟内容总录》和《供养人题记》进行了校勘和增补。有计划地对壁画和塑像进行摄影和记录。编辑出版了《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壁画临本选集》等一批大中型图册和一套十二册的通俗读物《敦煌艺术小画库》,并配合出版物撰写了近二十篇学术论文。

这些工作对于保护、宣传敦煌石窟艺术,促进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以及美术工作者学习敦煌遗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方面。

陆续出版了一批总结以往成果和经验的专著。有:

总结几十年来研究变文成果的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和王重民、向达等的《敦煌变文集》。

总结敦煌曲子词研究成就的有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

总结我国学者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中四部书成果的有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

总结敦煌文献目录成就的有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王重民、刘铭恕)。

在语言音韵方面,则有深入探索变文字义的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在这方面的著作还有姜亮夫的《瀛涯敦煌韵辑》。

在社会经济方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出版《敦煌资料》第一

辑,此书广泛搜集了敦煌文献中的户籍、契券等与社会、历史文书。

此外,还发表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其内容涉及历史、考古、社会经济、民间文学、文字音韵、科技等诸多领域。

在国外,日本敦煌学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几乎各个领域都有人研究。

京都“西域文化研究会”~~员~~~~至~~~~员~~~~至~~年出版了六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其中包括研究论文、资料、目录等方面的内容,是日本这一时期敦煌学的集大成之作。

东京,东洋文库设立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研究室”,开始编辑《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这一时期完成的有公文书、道教文献等。

而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和西村元佑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则是日本学者研究敦煌文献中法制和社会经济文书的代表作。

法国戴密微完成了他运用敦煌文献研究禅宗入藏问题的名著《拉萨僧净记》(有中译本),谢和耐则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资料撰写了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有中译本)。此外,对敦煌文献中的藏文、粟特文、回鹘文的整理与研究,法国学者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英国翟理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英国博物馆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书摄成缩微胶卷(编号~~杂~~~~卷~~~~四~~以前部分)与各国交换(北京图书馆是在~~员~~~~至~~~~员~~~~至~~年通过交换得到了这批缩微胶卷),这就为各国学者利用英藏敦煌汉文文献提供了方便。

苏联孟列夫主编的《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卷和第二卷终于在~~通~~年代出版,使学术界开始对奥登堡劫去的敦煌文献有了初步的了解。

上述成果之外,日、法、英、俄等国学者还撰写了一大批有关敦煌

学的论文,从多方面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

总之,到了 1949 年代中叶,敦煌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各类目录日趋完善,人们可看到的资料日益增多,对资料的整理、考订以及各个领域、各个专题的研究也都有了相当的基础,研究方法也更加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但正当我国学者准备在这个基础上与各国学者一道再展宏图时,大陆发生了十年动乱。

第四阶段(1949 年至 1979 年) 台港地区敦煌学的异军突起

这一阶段大陆的敦煌学研究陷于停顿,而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却异军突起。以潘重规、苏莹辉、饶宗颐为代表,出版了一批重要成果。潘重规不仅完成了一批成果(如《敦煌云谣集新书》等),还带出了一支研究队伍,台湾的敦煌学研究以文学和四部书为主。

国外的敦煌学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日本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又完成了寺院经济和文学文献,还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法国在 1980 年终于编出了《法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册。

第五阶段(1979 年至今) 敦煌学的迅速发展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我国大陆的敦煌学研究不仅在许多领域已远远落后于日本、法国和港台地区,更值得忧虑的是由于正规的文化教育中断了十年,使我们整整少培养了一代人,研究队伍存在着严重的青黄不接的局面。研究队伍呈倒三角型。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在学术界的呼吁下,我国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纷纷采取措施,急起直追。

第一项措施是集中人才,进行科研攻关。

在兰州,甘肃省于 1985 年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任命段文杰为院长。敦煌研究院现有职工 150 多人,各类专职、兼职研究人员 300 多人,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敦煌石窟艺术

为中心的研究实体。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大学等都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

我国学者还创办了敦煌学专业刊物,敦煌研究院创办了《敦煌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室(现已升格为所)创办了《敦煌学辑刊》,台湾学者创办了《敦煌学》。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创办了《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和年刊《敦煌吐鲁番研究》。

第二项措施是抓紧培养人才。

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相继开设有关敦煌学的课程,招收研究生。杭州大学和武汉大学还相继举办了有关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讲习班。

1985年,在兰州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季羨林先生任会长。学会在组织协调国内研究力量,加强国内外交流,资助学术著作出版方面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已经赶了上来,敦煌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研究人才。正常的学术梯队已经形成。这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有所建树,这是我国敦煌学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这一时期我国敦煌学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是,随着大陆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在世界性的“敦煌学”热潮的推动下,大陆敦煌学界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也日益增多。

二十年来,大陆老中青三代学人与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者一起比翼双飞,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各种著作在一百部以上。许多领域都已处于领先地位。

在资料刊布方面:

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的缩微胶片开始在国内发行。台湾黄永武编纂了《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1—1982年),将英、法和北图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成书;涂自强主编了以北

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佛经为主包括部分英法藏品的《敦煌大藏经》(前景出版社 员缘年)。进入 怨园年代,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推出。现已出版的有《英藏敦煌文献》(员-员源卷,只差第 缘卷目录尚未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员怨园-员怨缘年)、《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 圆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怨缘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全 圆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怨缘年)、《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 苑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怨远-员怨愿年)、《甘肃藏敦煌文献》(全 远册,甘肃人民出版社 员怨愿年)、《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 源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怨愿年)、《浙藏敦煌文献》(全 员册,浙江教育出版社 圆园园园年)、《俄藏敦煌文献》(员-员苑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怨园-圆园园员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员-苑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员怨愿-圆园园员年)、《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员-猿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怨缘-圆园园缘年)、《俄藏敦煌艺术品》(员-远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怨缘-圆园园缘年)。目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在重新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出 猿册),计划在 圆园园苑年出齐 员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计划出 员-缘册。这些新印本的图版比以往的印本和缩微胶卷清晰,有利于正确释录图版上文字。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员-缘辑(第 员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员怨远年;第 圆-缘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员怨园年),收录了敦煌文献中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文书和价值较高的历史文献 员源件,采用上图下文方式编排,极便使用。

对敦煌文献中的各类文书进行分类录校也取得显著成绩,相关出版物已达数十种,几乎每类重要的文献都已有录校本,有的甚至已有两三种录校本。如王梵志诗、邈真赞等。其中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分类录校丛刊水平较高。已出版的有《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敦煌赋汇》、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敦博本禅籍录校》、《敦煌约论语集解 跃校证》等。

目录和工具书的编纂方面：

目录方面的工作有三个方面值得一提。

一是国内各单位分散收藏的敦煌文献目录相继刊布，如敦煌研究院收藏目录、西北师范大学收藏目录等。

二是已有学者开始从理论上探讨敦煌文献的编目问题。如白化文、杨宝玉《敦煌遗书目录初探》。

三是敦煌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有三种。即郑阿财教授和朱凤玉女士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师勤、卢善焕的《中国敦煌吐鲁番著述资料目录索引》及其续编、刘进宝编的《敦煌学论著目录》。

工具书的编纂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最重要的是由季羨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已于 1995 年底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部辞典集中了数十位敦煌学家的力量，耗时十余年。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知识性，是敦煌学研究者和其他学科学者了解敦煌学必备的工具书。潘重规主编的《敦煌俗字谱》、金荣华编的《敦煌俗字索引》、潘重规主编的《龙龕手鑑新编》和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等，对于检索敦煌文献中的俗字极有帮助。此外还有收录敦煌文献中的语词并进行诠释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蒋礼鸿主编）。

敦煌石窟艺术方面：

一是完成了莫高窟南区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护，通道互相连接，与中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至此，洞窟加固工作全面完成。

二是在石窟保护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清洗烟熏壁画取得进展，使被白俄匪军烟火熏黑的壁画露出了优美的风姿。敦煌研究院还与

化工部涂料研究所合作对壁画颜色成分褪变进行了科学化验和分析研究。在治理壁画的病害和对病害严重洞窟的监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三是在对石窟艺术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敦煌文物研究所与日本合作编辑、出版了五卷本《敦煌莫高窟》，在《中国美术全集》中有《敦煌壁画》两卷，《敦煌彩塑》一卷。江苏美术出版社现在正在出版由敦煌研究院编辑的按窟出版的巨型敦煌艺术图集。

记录敦煌莫高窟内容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记录供养人题记的《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也在这一时期完成出版。前者已于1982年出新版，因增加了榆林窟的内容而更名为《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上述成果和一批相关的专著、论文标志着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断代及内容的考订、著录、供养人题记的整理等工作已基本完成，并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对各时期石窟特征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可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国际上已具有明显的优势。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方面：

一是对归义军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现已基本搞清了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张曹两氏执政时期的政治史脉络。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郑炳林主编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和一大批高水平的论文。

二是对莫高窟史的研究，比较集中的成果是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5年）。

三是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的均田、赋役、户籍、法律制度以及手工业、商业、高利贷等方面的问题继续深入，并开始研究一些新的课题。主要著作有宋家钰的《唐代均田制与户籍法研究》（中州古籍

出版社 1985 年)、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等。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方面:

对敦煌文献中的韵书和字书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对敦煌俗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唐五代河西方音也进行了探索,特别是在敦煌文学作品文字的校勘和词义的解释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周祖谟《唐五代韵书辑存》、项楚《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等。

敦煌文学方面更是硕果累累。首先是在理论上开展了对敦煌文学的概念、范围,敦煌变文的概念和性质的讨论,使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发表了如《敦煌文学概论》(颜廷亮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等专著和论文。在敦煌歌辞、敦煌诗歌、王梵志诗、敦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等方面则发表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如任二北《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全敦煌诗》(张锡厚主编,全 4 册,分为“诗歌”、“曲词”、“偈赞”三编,作家出版社 1984 年)、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 1983 年)、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 1984 年)、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 1987 年)等。

少数民族历史语言、音乐、舞蹈、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全面开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著作有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年)、叶栋《唐代音乐与古谱译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室 1983 年)、庄壮《敦煌石窟音乐》(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 1984 年)、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中华书局 1984 年)、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辨证》(中华书局 1984 年)等和一大批高质量的论文。

国外的敦煌学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资料的整理与刊布方面：

法国公布了所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出版了《集美博物馆和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丝织品》、《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伯希和石窟笔记：题记与壁画》。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卫泓博士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敦煌文献数据库（网址：<http://www.bl.uk/egypt/egypt.htm>）。日本出版了《敦煌道经——图录篇》、《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和大型资料丛书《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丛刊》（东洋文库已出法律文书、户籍、契券和社邑文书等专辑）。前苏联则出版了《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册。

目录方面：

法国又出版了《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猿源缘册，现在只差第圆册正在编辑之中。日本出版了《敦煌道经——目录篇》和《斯坦因、伯希和搜集敦煌法华经目录》。

各个方面的研究：

日本组织国内数十位各方面专家和部分外国学者正在合作撰写一部大型学术丛书——《讲座敦煌》，拟出猿猿卷，现已出版了《敦煌的自然与现状》、《敦煌的历史》、《敦煌的社会》、《敦煌佛典与禅》、《敦煌与中国道教》、《敦煌与中国佛教》、《敦煌胡语文献》、《敦煌的文学与语言》、《敦煌汉文文献》等大部分。这套丛书每一卷都在主题下分若干专题，每一专题都由学有专长的专家执笔，并尽量做到深入浅出。所以这套丛书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是一部从各方面介绍敦煌的普及读物。但由于是书成于众手，每卷内各专题的水平并不一致，有的全为撰写者的研究心得，有的只是介绍日本国内以前的研究成果。此外，日、法、英、俄等各国学者在这一时期还分别撰写了一大批专著和论文，不断将敦煌学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

此外，在匈牙利、荷兰、意大利、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也都有学者致力于敦煌学研究，有的还取得了相当好的

成绩。

总之,在最近二十余年来,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随着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引起了人们对敦煌学的思考。~~190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敦煌学理论进行了探索。多数学者认为敦煌学是一门学科。他们认为:

敦煌学是以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考古、宗教、艺术、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科技、音乐、舞蹈、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多科性的学科。它的目的是揭示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过程、内容、特点和规律;深入揭示敦煌、河西乃至中国古代社会和中西交通的历史本来面貌和发展规律;探求主要研究对象间的内在联系;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促进现代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这个表述说明: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四个方面。敦煌学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多科性,一是因地名学。

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敦煌学的内容比较庞杂,不能算一门学科,认为还是将“敦煌学”放在引号内好。

### (三) 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展望

当然,目前国际敦煌学研究中还还存在不少问题,尚未解决的问题和有待开展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尽快公布原材料的任务还很繁重。**

公布原材料包括敦煌文献的图版和释文两个方面。在敦煌文献的图版的公布方面,如果~~1900~~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能如约出齐国图收藏的敦煌文献,将标志着世界各主要藏家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图版已基本公布。只有英国国家图书馆~~1900~~号以后的佛教文献的

图版未曾公布。另外,在日本一批敦煌文献藏在私人手中,国内也还有少数散藏品尚待公布。就数量而言,尚待公布的敦煌文献图版已经不多,但编辑和出版这些敦煌文献图版的难度却不小,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和出版社参与这项工作。

### 图版全面录校工作亟待进行。

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和图版的公布虽然十分重要,但其使用者主要是专业研究者。一般研究者阅读敦煌文献主要靠释录本。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缩微胶卷和图版价格昂贵,发行量较小,不便于大多数读者阅读。二是敦煌文献中有许多俗体字、异体字和别字,还保留了不少河西方音,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读者,即使有条件读到敦煌文献图版,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要想将敦煌文献推向学术界,最根本的还是将其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这些释录本不仅文字应该力求准确,还应有对文书年代、性质、名称等有关情况的说明,并附有有关的研究信息。用这个标准衡量,我们在分类录校方面虽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符合标准的还嫌太少。所以,我们应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强分类录校工作。

但分类录校工作也有其局限。

一是分类录校本不能反映敦煌文献的全貌。目前被纳入分类整理范围的敦煌文献只是其中一部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分类录校本之和尚不能包括全部敦煌文献。

二是分类录校本目前收录很难齐全。由于敦煌文献尚未完全公布,所以各类分类录校本的内容不可能齐全。

三是分类录校容易使人忽略敦煌文献的整体性。

这样看来,编纂、出版一套包括全部敦煌文献的录校本就是很有必要的了。目前,我正在主持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全面录校工作(已出版《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员缘卷,第员卷,科学出版社 圆园园年;第 圆猿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圆园园年;第 源缘卷,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5 年)。以后再释录法藏、俄藏,最终将包括全部敦煌文献。这将是一项将敦煌文献推向学术界的宏伟工程。预计大约需要 10 年才能完成。

援编纂各类工具书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应该承认,我们目前使用的敦煌文献目录都已老化。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目录出版于 1931 年(北图藏敦煌文献新目录编纂工作已完成,但尚未出版),英藏敦煌文献的目录出版于 1934 年,俄藏敦煌文献的目录不仅不全,且也是 1940 年代出版的,法藏敦煌文献的目录自 1940 年代开始出版,但至今还差一卷,即 1940 至 1949 号。目前仍在发挥作用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出版于 1954 年。可见,现在我们使用的几种主要目录都已出版 10 多年了。而这期间敦煌学的研究已有极大的进展。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 1986 年),在原书的基础上吸收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仅靠修订《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已经远远不够,应该编纂一部具有新观念、使用新体例、反映新的研究成果的《敦煌文献总目》,这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是分类目录的编纂工作也有待加强。过去在馆藏分类目录(如北图藏、英藏、俄藏等)和分科分类目录(如道经、法华经等)做过一些工作,但包括全部敦煌文献的分类目录可以说用力不多。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需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因为只有分类目录才能纳入图书馆的检索系统。

三是编纂新的敦煌俗字索引。以前出版的《敦煌俗字谱》和《敦煌俗字典》等工具书,为人们阅读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所收俗字有限,很多俗字未能收入。所以,依据现有条件,编纂新的《敦煌俗字谱》或《敦煌俗字索引》不但已有可能,也很有必要。

四是编纂敦煌文献系号研究信息索引。

对敦煌文献研究信息的检索与研究一般课题有所不同。就研究一般课题而言,主要靠检索研究论著目录索引即可查到所需的研究信息;对研究敦煌文献而言,这种方法却往往不能奏效。这是因为对各件敦煌文献的研究一般不能从著作和论文的名称中反映出来,只有在阅读所有有关论著以后,才能确知有关研究对象的研究信息。这一点在敦煌学发展的初期阶段比较容易做到,随着敦煌学的发展,为了研究一件文书而遍读所有有关敦煌学的著作愈来愈难以做到。所以,最近一些年来,在敦煌学研究领域,重复劳动有日益增多的趋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编一套敦煌文献系号研究资料索引,将一百年来学术界对每号敦煌文献的研究情况都按号系于该号之下。这样,每个利用、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可以按图索骥,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研究信息。因而,编纂一部《敦煌文献系号研究信息索引》就成为二十一世纪敦煌学界的一项重要工作。

五是敦煌石窟研究信息索引等。

与《敦煌文献系号研究信息索引》相类,按窟编制敦煌石窟研究信息索引也会给研究者提供很大方便。其他如《敦煌文献人名索引》、《敦煌文献地名索引》等都有待进行,这些工具书的编辑不仅会给研究者提供方便,在编辑过程中还能发现敦煌文献之间的联系。

**源 各领域各专题的研究有待深入。**

近二十年来,我们虽然在专题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整体上看,深入、具体、细致地研究某一领域、某一专题的专著或系列论文还嫌太少。有些领域如少数民族语言、佛教文献都有待加强,否则将会影响宏观和综合的研究。

**缘 综合、宏观的研究有待展开。**

这类研究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敦煌文献,开展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石刻资料、石窟艺术遗存及其他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敦煌文献



与吐鲁番文献、黑城文献及其他地区同期考古资料的比较研究,敦煌文献与汉晋简牍的比较研究。

其二,各专题、各学科、各语种之间的综合研究。打破学科界限,深入研究 8 世纪后半叶至 10 世纪初敦煌社会的各个方面。为人们深入、具体了解中古时期的社会提供一个模型。

其三,把敦煌的资料纳入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放到中古世界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察。

此外,应该重视和加强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注意引进新的研究观念。如利用电脑、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等都有待加强。

## 五、二十世纪敦煌文献与历史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2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4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尤以在唐后期五代者居多。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六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摺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sup>①</sup>。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发现都可以说是上一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发现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

---

<sup>①</sup> 敦煌文献又被称为敦煌卷子、敦煌遗书、敦煌文书等。另外，1908年在敦煌土地庙出土的文书，一般也被包括在敦煌文献中。

法、俄、日等国,为我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国学术界自 1900 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新潮流逐渐扩大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 1900 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有关情况略作回顾,并对这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动向试作讨论。

自 1900 年至今,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00 年至 1949 年建国前为第一阶段,1949 年建国后至 1976 年“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文革”后至今为第三阶段。

## (一)

第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00 年至 1909 年《敦煌掇琐》出版以前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1900 年,法国人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 1900 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拍照。同年九月,王仁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十一月,罗振玉出版了他和蒋斧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石室秘宝》(1904 年,存古学会辑)、《鸣沙石室佚书》(1905 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06 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07 年,罗振玉辑)、《敦煌零拾》(1908 年,罗福葆辑)、《沙州文录补》(1908 年,罗福葆

辑)、《敦煌石室碎金》(1908年五月,东方学会编)等。上述著作几乎公布了当时所能见到所有敦煌文献的录文和照片图版<sup>①</sup>,历史文书和历史典籍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辑录者还以跋、按语、提要和论文等形式对上述文献进行了探索。这一时期所公布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西北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被迫调动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趁机向唐州县发起进攻,自755年至763年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以后又从东向西至763年攻占了整个河西地区。公元788年,位于蒙古高原的漠北回鹘汗国因内乱被黠戛斯击溃,部众大批西迁,进入河西与天山东部地区。806年,吐蕃王国因内部权力之争而发生内乱,势力大衰,其在陇右、河西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开始动摇。大中二年(852),沙州大族张议潮率众起义,在控制了瓜沙二州后上表降唐,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此后直至十一世纪上半叶,张议潮家族和曹议金家族相继控制归义军政权达一百多年。归义军的控制区域,兴盛时包括整个河西及沙州以西的一些地方。九世纪晚期以后则仅有瓜沙二州,其东的酒泉、张掖地区被由西迁回鹘建立的甘州回鹘占据,凉州一带则是吐蕃系的唃廝囉部的活动地域;其西则有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由西迁回鹘建立的西州回鹘王国和以于阗为中心的于阗王国等少数民族政权。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代中原王朝始终未能有效控制上述地区,故当时的官修史籍对吐蕃管辖时期西

① 这些著作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伯希和1908年带到北京的敦煌文献和伯希和归国后陆续寄给罗振玉等的敦煌文献照片,也有少量购于民间的私人收藏品和入藏于京师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还有一些系罗福苾、罗福葆分别从日本狩野直喜处和美国人影本转录的英藏敦煌文献录文。

北地区的情况和归义军政权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关情况记载极为简略,且多讹误。幸赖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大批属于这个时期的官私文书和史籍,为学术探讨吐蕃、归义军史和同期西北民族变迁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我国学者在最初接触敦煌文献时,就开始了有关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即有《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马衡)、《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马衡)、《曹良才画像赞》(马衡)、《曹仁贵状》(马衡)等多件与归义军有关的文书,王仁俊还以“按语”的形式介绍了几件同类文书,并依据所见文书对归义军历史进行了初步探索。如《张淮深传》(似应为《张淮深墓志铭》)按语,依据敦煌写本否定了《新唐书·吐蕃传》有关张淮深卒于咸通十三年(873)的记载,考定张淮深应卒于大顺元年(890)。《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按语指出《旧五代史》等史书中有“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此敕当即张奉之敕。并推测张奉之尚白是受摩尼教的影响。《曹议金壁画题名》按语,指出曹议金即《旧五代史》所记之沙州曹义金,检出了《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纪传中有关曹议金的材料。并据《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指出曹议金是在张奉后以长史身份主持州务,他联合回鹘,通使中原,遂以留后被中原王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夫人赞》(马衡)按语正确判定此赞为曹议金夫人赞,十年以后,仍有学者认为此赞是曹元忠夫人赞。王仁俊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太少,所以他的按语在许多地方沿袭了传世史籍的错误。

在《敦煌石室遗书》中,也辑录了不少有关归义军的资料(一些与《敦煌石室真迹录》重复)。其中蒋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跋注意到了此碑文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指出据此碑可知在张氏归义军内部曾发生“争夺之事”,但他推定的时间不确,也未能对

“争夺之事”作进一步考察。《敦煌石室遗书》中由东吴曹元忠撰写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是第一篇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史书有关记载研究归义军史的论文。此文指出《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张淮深后即由曹议金继任不符合历史事实，其间尚有张奉和索勋曾为节度使。该文还正确考定了曹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次序，即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禄、曹宗寿、曹贤顺，并确定了曹宗寿取代曹延禄的时间在咸平五年（~~无题~~）。上述次序虽尚缺曹延恭一任，但作者已指出延恭有可能担任过沙州节度。曹文最后指出景祐四年（~~无题~~）西夏取瓜、沙、肃等州后，并未能对沙州实施有效统治，故有沙州继续向中原王朝进贡之事。这篇文章为确立曹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奠定了基础，有关西夏未能有效控制沙州的观点也极富启发性。罗振玉为《鸣沙石室佚书》所收《张延绶别传》录文撰写的目录提要则进一步指出继淮深者为淮□，淮□以后，尚有嗣者，虽沙州中间偶有篡夺，然不久即灭。张氏主河西，直至唐终。从而彻底推翻了《新唐书·吐蕃传》关于曹议金在咸通年间即以长史身份主持归义军的错误记载。

~~贞元~~至~~贞元~~年，罗振玉依据史籍记载和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先后撰写了《补唐书张义潮传》和《瓜沙曹氏年表》（两文均见《雪堂丛刻》~~贞元~~）。前文首先指出了《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吐蕃攻陷沙州过程的疏失，考定沙州陷蕃应在贞元元年（~~贞元~~）。继而考察了张议潮起事、收复河西、遣使入朝等历史事件的过程。并确定了张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即咸通八年（~~贞元~~）张议潮入朝后，张淮深嗣为节度；淮深卒，淮□嗣；淮□卒，托孤于议潮婿索勋，勋乃自为节度，并在景福元年（~~贞元~~）得到朝廷任命；后议潮十四女又于乾宁元年（~~贞元~~）率将士诛勋以议潮孙为节度，并以其长子李弘愿任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次子和三子则分任瓜州刺史和甘州刺史；后梁开平年间的沙州节度使张奉可能是张议潮末孙。罗

氏的成果奠定了张氏归义军政治史的基础。他关于陷蕃年代的考证推进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判断张议潮攻克凉州应在咸通二年的说法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张氏归义军节度使世次的考证,以后的研究都是在此框架基础上逐步深入和具体化的。罗氏此文的主要不足是未能参考王仁俊有关张淮深卒年的研究成果。后文在曹元忠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按时间顺序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梳理、编排和考订,在一些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如确定了曹议金在贞明年间已执掌归义军大权,曹氏取代张氏的时间当在贞明以前;指出在归义军张氏时统治区域有瓜、沙、甘、肃等十一州,到五代时归义军所领仅有沙、瓜二州;在“年表”的序言中确定接替曹元忠的应是曹延恭,并推测在延恭后可能还有延禄一世;确定了曹宗寿卒于大中祥符七年(1015),子曹贤顺继任。限于材料,此文仍未解决大部分节度使的卒立时间。

民国元年,王国维《于阗公主绘地藏菩萨题记》跋(载《沙州文录补》)据英藏《开宝八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施舍疏》,判定《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关曹元忠卒于太平兴国五年和卒后由其子曹延禄继任的记载是错误的。亦指出在元忠和延禄之间尚有延恭一世,元忠应卒于开宝以前。但王氏未能确定此于阗公主是曹延禄之妻,误认为是延恭之妻。王国维还在跋中开探索于阗史事之先河,对唐初以来有关于阗的情况作了初步考察,并推测李圣天是回鹘人。

在这一时期公布的材料中,还包括一些归义军时期的牒、状、契约和书信等。吐蕃管辖敦煌时期的资料则公布了《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马继祖)、《大蕃故骨萨康再荣建宅文》(马继祖)、《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铭并序》(马继祖)、《吴僧统碑》(马继祖)等。此外还有反映唐前期敦煌历史情况的《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马继祖)等。时人虽未能对上述资料进行有价值的研究,但却为以后人们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原始资料。有的资料直

至今日仍被人们引用、研究。

第二个方面是对历史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历史典籍有些是佚籍,有些是有传世本的史籍。佚籍的价值自不待言,有传世本的史籍也因其抄写时间较早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所以,我国学者对早期接触到的历史典籍自然十分珍视。这一时期公布的佚籍有《鸣沙石室佚书》收录的《春秋穀梁传解释》“僖公上第五”(马衡辑录)、《春秋后国语》(马衡辑录)、《春秋后秦语》(罗振玉藏)、《春秋后魏语》(马衡辑录)、《晋纪》(马衡辑录)、《阆外春秋》(马衡辑录)等,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分别据传世文献考出以上史籍的名称,并说明其对研治各时期历史的价值。《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则影印了《略出籀金》(马衡辑录)和包含有历史佚籍片段的《古类书》三种(马衡辑录原马衡辑录、马衡辑录)。《沙州文录补》公布了《开元天宝残史书》(王国维跋),王国维跋云此件系“占家所用历”,“非史家编年书”。此外,这一时期公布的文学作品《唐太宗入冥小说》(王国维跋)和《秦妇吟》(马衡辑录、王国维跋)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王国维有关跋文结合传世文献对唐太宗入冥事进行了探索。

写本传世史籍这一时期公布了《隶古定尚书》“顾命”(马衡藏)的图版和录文,“夏书”四篇(马衡藏)和“商书”七篇(马衡藏)的录文,蒋斧、罗振玉分别指出上述写本均为未经天宝中卫包改定的隶古定原本。王仁俊和蒋、罗二人还将写本“顾命”与传世本进行了校勘。罗振玉《吉石庵丛书》(吴省潜)影印了《尚书释文》“尧典、舜典”(马衡藏)。《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了《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五年至十五年”(马衡藏)、 “僖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马衡藏)、 “昭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马衡藏)、 “定公四年至六年”(马衡藏)、《春秋穀梁传集解》“庄公、闵公”(马衡藏)和《汉书·王莽传》(马衡藏)残篇,罗振玉有关跋文分别考定上列第一、三件为初唐写本,二、四件为六朝写本,第五件为唐龙朔年间写本,第六件为唐太宗时



写本。罗振玉还将上述写本与传世本进行了对勘,具体指出了写本可订正传世本之处。《敦煌石室碎金》收录了罗振玉校录的《春秋左氏传·昭公残卷》(中村不折氏藏)和《汉书·匡衡张禹孔光传残卷》。

第三个方面是对有关宗教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佛教史方面,《敦煌石室真迹录》和《敦煌石室遗书》、《沙州文录补》公布了《翟家碑》(罗振玉)、《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罗振玉)、《释龙辩惠云绍宗等牒》(罗振玉)、《沙州乞求遗失经本牒》(罗振玉背)、《雍熙二年女弟子程氏戒牒》(罗振玉)、《尼灵惠唯书》(罗振玉)等一些寺院文书,但未及对这些文书进行研究,相关的按语和跋每有失误。道教史方面,《敦煌石室遗书》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卷一(罗振玉)、卷十(罗振玉)的录文,《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影印了这两件文书的图版。王仁俊按语(载《敦煌石室真迹录》)认为写本《化胡经》是唐初僧人伪造,并云《化胡经》一造于晋、二造于唐、三造于宋、四造于元。蒋斧《老子化胡经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搜集了许多传世史籍中有关老子化胡的记载和《化胡经》佚文,但有的佚文是《化胡经》类文献佚文。罗振玉《老子化胡经补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指出元代所传《老子化胡经》已与唐代所传之本不同,并已认识到有关《化胡经》的文献有《化胡经》和“化胡经类”文献的区别。罗振玉还对《化胡经》写卷的文字进行了校订。《沙州文录补》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序》(罗振玉),王国维跋指出此序应为魏明帝撰。摩尼教和景教方面,分别公布了《摩尼经》(罗振玉)和《景教三威蒙度赞》(罗振玉)的录文图版。王仁俊按语认为《摩尼经》为唐写本,辑录了史书中一些有关摩尼教记载,但误将摩尼教视为回教。蒋斧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罗振玉又对蒋文有所补充,但他们关于摩尼教传入中国的论断都属于推测。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员卷 圆号 员圆年),在全面搜集、深入分析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结合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摩尼教经》(字字缘号),断定摩尼教传入中国是在唐武后延载元年(延载),并探明了此后其流行与遭禁的有关情况。《国学季刊》在发表此文的同时,还刊出了陈垣校录的字字缘号和马衡原(摩尼教残经)录文。

第四个方面是对唐代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代法律文献为数不多,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到的仅有几件。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也是王仁俊。1909年,他刊布了《唐写本开元律·名例疏》(北图河字残号背)(《敦煌石室真迹录·己集》),录文后附有他撰写的《唐开元律案证》。“案证”结合传世《唐律疏议》考定写本为唐开元律疏《名例》的一部分,认为此写本当即唐尚书都省所写,发使散于天下的五十本之一。“案证”用写本与传世本对勘,互相校补,指出传世本并非开元二十五年律疏,因而写本对于了解唐律的演变及开元律疏的修撰过程都有重要意义。《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唐代《水部式》(马衡原)残卷录文,罗振玉目录提要据《白氏六帖》考出其名。指出该卷可补《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缺失者十处,并据该卷结合传世文献考察了唐代的海运情况。《敦煌石室碎金》亦刊布了罗振玉校录的北图河字残号背“律疏”和《唐律疏议·杂律下残卷》(李盛铎旧藏),罗跋考定了写本与传世本的不同。同书还刊布了《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李盛铎原),王国维1915年跋云此卷系由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所录,王氏经过考证,认为其为唐武德职官令。此名虽不够准确,但作者仅依据该卷的一小部分即判明了其性质,为后来者进一步考定其准确名称奠定了基础。

第五个方面是对地志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到的地志类文献也为数不多。《敦煌石室遗书》公布了《沙州图经》(马衡原)、《敦煌录》(李盛铎)和《西州图经》(马衡原)等地区性地志的录文。罗振玉有关跋文和校录札记(均载《敦煌石室遗书》)考定《沙州图经》作于开元天宝年间,《西州图经》作于唐乾元以后至

贞元以前。并据写本订正了《元和郡县图志》和两唐书《地理志》等史籍的缺失。《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马援图经)和《贞元十道录》(马总图经)等全国性地志。此前,刘师培已于贞元年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国粹学报》辛亥第四号)据《新唐书·艺文志》和《太平寰宇记》考出了《贞元十道录》的名称和作者,并指出了该卷与传世史志的异同。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则考出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名称和作者,并举例说明两个残卷可补正《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和两唐书《地理志》等书的缺失。《敦煌石室遗书》还刊布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马总图经)的录文,此书虽为僧人游记,但因保存不少有关历史地理的资料,故有的学者也将其列入地志类。罗振玉跋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考定出此卷书名,并据其内容推断该书成于玄宗朝。罗振玉还撰写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校录札记》,指出写本的别字异文和伪误。

第六个方面是对有关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因受材料的限制和当时学术取向的影响,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直到贞元元年,《沙州文录补》才刊布了罗振玉收藏的《先天二年平康乡籍》、《天宝六载龙勒乡籍》、《大顺二年沙州范保德等户状》和《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手实》(杂题家原背)、《雍熙二年邓永兴户状》(杂题家原)、《至道元年沙州何石住等户状》(杂题家原)等数件户籍类文书。但当时学者尚不能分辨户籍、手实、户状等的区别,将这类文献均名为户籍。王国维的有关跋文依据传世文献和户籍类文书探索了唐代的户籍制度,并以户籍所载应受田数、已受田数与唐代文献中有关均田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开启了运用户籍文书研究唐代均田制的先河。

在国外,日、法、英等国在这一时期也都开展了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日本学者的行动最快,所出版的著作中与历史有关的有:《佛典研究》(松本荣三郎 贞元元年)、《敦煌遗书》(影印本、活字本)(羽田

亨与伯希和合编,1907年)等。

法国,伯希和自1908年从北京回到巴黎以后,用很大精力从事对敦煌文献与文物的研究。他首先对劫去的敦煌文献进行初步清理,编成了一个草目,并与其他法国学者一起对其中的汉、藏、回鹘、粟特等多种语言的敦煌文献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从1909年开始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亚细亚讲座,介绍他研究敦煌文献的成果,在这个讲座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国学者在这一阶段出版或已经开始出版的重要成果有:沙畹、伯希和《中国发现的摩尼教经典》;《粟特语语法试编》,此书系高梯奥遗著,由邦旺尼斯特整理完成;高梯奥、伯希和《粟特语佛说善恶因果经研究》;阿甘《十世纪梵藏对照词汇表》。以上成果均为该领域的基础性成果。

刘复《敦煌掇瑣》的出版,标志着第一阶段第二时期的开始。《敦煌掇瑣》虽亦为敦煌文献资料集,但其中的资料均系作者直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继刘复之后,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拍照、研究敦煌文献。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已能接触巴黎所藏敦煌文献的大部分和伦敦所藏敦煌文献的一部分,与前一时期相比,资料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介绍、公布或带回的敦煌文献录文、照片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其中与历史有关者亦明显增多。同时,我国学者加强了对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其中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4)辑录了不少有关历史的资料。而罗振玉又推出了《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5),影印出版了自家搜集、收藏的敦煌文献,其中亦包括一些与历史有关的文书(有些已公布过录校本)。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史语所集刊》1本 1分 1944年)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史语所集刊》1本 1分 1945年),不仅具体介绍了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史料价值,还从学术发展史的高度对敦煌文献之类的新材料与学术新潮的关系进行了精

辟论说,并呼吁国人利用敦煌文献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陈氏的这两篇序文特别是前一篇影响深远,指引数代学人加入到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行列。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方面陈氏也率身垂范。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 1980年)中,曾利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探明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取胜的原因,以实例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其《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史语所集刊》1980年),亦曾利用敦煌写本吐蕃诏书以印证作者的结论。其《秦妇吟校笺一卷》,以诗证史,每有所得。

关于归义军和金山国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时期又有进展。孙楷第《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图书季刊》1980年),利用《张议潮变文》结合史籍记载初步探索了归义军政权周边的吐浑、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同作者之《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0年),推测“克复凉州之役,必是淮深首功”;继而进一步考察了安西回鹘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两个政权的关系,认为甘州回鹘是“旧河西回鹘部落,非自安西移来者”;该文还探讨了河西五郡陷蕃的次序和具体过程,首次揭出《元和郡县志》中沙州于建中二年(781)陷蕃的记载,但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此前罗振玉关于沙州陷蕃年代的考证;作者认为以沙州为中心的归义军政权在唐宋间延续近二百年是因这里的居民是以汉人为主体的,指出归义军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孙氏两文的结论虽与后来的研究尚有一定距离,但他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并开创了以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的先例。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辽海引年集》1981),对沙州陷落和收复的时间及张淮深死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其结论对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大。该文还首次利用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探讨归

义军史的有关问题,扩大了归义军史的史料范围。但该文涉及的一些问题已被上举《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和藤枝晃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东方学报》~~第~~册~~第~~分—~~第~~册~~第~~分~~第~~源—~~第~~源年)解决。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卷~~第~~期~~第~~缘年),依据作者在巴黎搜集的敦煌文书,对金山国史事进行了考证。使“千载坠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填补了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之间的一段历史空白。虽然此文有关金山国的立国时间及部分文书年代的判定存在问题,但作者公布的材料至今仍是研究金山国史的基本史料。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第~~期~~第~~源年),认为张承奉“白衣天子”名号是受到弥勒教的影响。

向达还发表了《玉门关阳关杂考》(《真理杂志》~~第~~卷~~第~~期~~第~~源年)和《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新~~第~~缘卷~~第~~源期~~第~~源年),开辟了利用敦煌文书结合传世文献和实地踏勘研究敦煌历史地理的新途径。

此外,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说文月刊》~~第~~猿卷~~第~~源期~~第~~源年),开始尝试利用敦煌写经题记考察敦煌世族。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第~~源期~~第~~源年)则利用莫高窟供养人题名和历史文献对敦煌的索、汜、令狐、安、李、张、曹、阴等大姓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对历史典籍的介绍和研究仍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致力于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反映在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中,《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先是以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后由北平图书馆汇为两辑印行(第~~第~~辑刊于~~第~~源年,第~~第~~辑刊于~~第~~源年)。此书虽以介绍新发现的古代典籍为主,但也包含了作者对其进行考证、研究或与传世本对勘的结果。该书介绍的历史佚籍有《春秋后语》之《秦语》上、中、下和《赵语》上、下,同时探索了《春秋后语》全书各卷的内容;《阙外春秋》卷一和卷二(部分),对其作者作了进一

步考证,指出了罗振玉的疏失;《帝王略论》,考出其作者为虞世南;《籀金》,指出《略出籀金》系张球所作,并对张球的事迹作了初步考订。此外还有《唐高宗天训》和唐张仁亶《九谏书》和被怀疑并非今本的《晋书·何曾传》。传世史籍介绍了《古文尚书》**员**件,《今字尚书》**猿**件,《春秋经传集解》和《春秋穀梁传集解》各**员**件,《史记集解》**员**件,《汉书》**猿**件。分别判定了各件的抄写年代,勘对了写本与传世本的异同。**猿**件《今字尚书》均被定在卫包改字之前,并据以判定在卫包前已有《今字尚书》。

此外,姜亮夫《瀛外访古劫余录敦煌卷子目次叙录》(《志林》**员**期**员**圆年)也简单介绍了一些写本《尚书》和《左传》。潘重规《敦煌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志林》**圆**期**员**圆年),通过对比写本与传世宋本的异同,考察宋人删改《尚书释文》的情况。越政《敦煌左传残卷校记》(《艺观》**源**期**员**圆年),勘对了李鸣南藏敦煌写本《左传》与宋本的异同。

宗教史方面。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依据写经题记初步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窟寺之创建与寺观之名。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自序”利用敦煌文献结合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考出了**员**处所寺院的名称,并对这些寺院的寺址与兴建存废等情况进行了初步探索。胡适《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员**圆年),录校了《神会语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等神会的著作,并撰有《菏泽大师神会传》,开整理敦煌禅籍之先河。陈寅恪《武曌与佛教》(《史语所集刊》**缘**本**圆**分**员**圆年),据敦煌本《大云经疏》考出武则天所颁《大云经》,乃薛宗义取后凉县无谶旧译《大方等大云经》附以新疏,巧为附会而成,推翻了旧史所记武氏时有沙门伪撰《大云经》的说法;《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国学论丛》**员**卷**圆**号),依据敦煌写本题记考出了吐蕃译经大师法成的史迹。道教史文献的研究仍是围绕《老子化胡经》进行。王维诚《老子化胡说

考证》(《国学季刊》源卷 圆号 员源年),在比较彻底地清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敦煌本《化胡经》在“化胡说”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此文至今仍是研究这一问题必须参考的论文。刘国钧《老子神化考略》(《金陵学报》源卷 圆期 员缘年),注意到《化胡经》与三张道派有关。牟润孙《宋代摩尼教》(《辅仁学志》苑卷 员圆期 员愿年),指出十卷本《化胡经》已列入唐官方道经。逯钦立《跋〈老子化胡经玄歌〉》(《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 圆号 员源年),认为《化胡经》卷十中含有太武帝灭佛的背景因素,并推断此卷为北魏时作品。朱维之《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尊经考》(《基督教丛刊》员源期 员源年)及《景教经典一神论》(《基督教丛刊》愿期 员源年),结合史籍探索了敦煌景教文书反映出的问题。

社会经济方面这一时期仍是以整理、公布资料为主,但也有少量相关论文问世。《敦煌掇琐》辑录《宅舍图》、《户状》、《户籍》、《差科簿》各一件,反映经济关系的各类契券、凭据、案卷、牒状等二十余件。《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辑录各类契券近二十件,有关社邑的文书数件。《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影印了罗氏收藏的两件户籍、一件户状、一件有关长行马的案卷与一件《枝头白刺头名簿》。《食货》源卷 缘期 (员源年)是《唐户籍簿丛辑》专刊,将当时见于中日文书籍、杂志的二十件敦煌户籍、差科簿(时称丁籍)收罗在一起。陶希圣《小序》指出户籍、丁籍是重要的经济史料,对研究均田制、百姓负担和社会组织都有重要意义。曾了若《隋唐之均田》(《食货》源卷 圆期 员源年)是最早尝试利用敦煌户籍研究均田制的专题论文。虽然他据之得出的结论为现在一般学者所不取,但他的研究仍加深了人们对均田制的了解,其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亦有积极意义。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源卷 苑期 员源年),利用敦煌写本《水部式》结合唐代文献探索了唐代关于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碓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及海上运输的有关规定。



对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此期亦有进展。董康依据内藤湖南提供的照片校录了《神龙散颁刑部格》，并与唐律做了比较研究（《书舶庸谈》**民国**年）。罗振玉也对该文书作过探讨。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介绍了《唐律》和《唐律疏议》各**四**件，考证了各件的书写年代，指出了写本与今本的异同。王氏还据写本律疏考出传世本《唐律疏议》中之“疏议曰”系因宋元人不明律疏之义“连疏于议”所致，发数百载之覆。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猿**卷**四**期**民国**年），最早对**马建忠**原号文书进行了校录和研究，据《旧唐书·职官志》考定该件为《天宝官品令》，指出该件可与《职官志》、开元令互相印证，并列表具体展示其可补《职官志》之漏、误处。虽然此文对文书的定名未能成为定论，但作者的探索对唐令的研究仍有一定意义。

从文献角度研究地志类文书此期趋于沉寂。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介绍了一件新发现的带有原题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考证其年代在证圣二年，不同意罗振玉的定年。王氏还介绍了两件《大唐西域记》残卷，附有与今本对校的校勘记。

日本学者在这一时期又取得了很大成就。矢吹庆辉出版了《三阶教研究》，利用敦煌文献对在历史上盛行一时而史籍缺载的三阶教进行了深入研究；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辑出版了《大正新修大藏经·**缘**卷·古逸部、疑似部》，收录了一批失传的唐代佛教典籍。

那波利贞在**民国**至**民国**年留学欧洲期间，仔细阅读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并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进行了抄录和拍照。在那波利贞以前，旅欧访察敦煌文献的东方学者，其注意力主要放在佛教典籍和四部书上，而那波利贞关注的主要是寺院文书、社邑文书等社会经济资料。回国以后，那波利贞长期致力于对这批在当时被称为“杂文书”的整理、介绍和研究。他曾多次在日本史学研究会等学术会议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了《梁户考》

(1935年)、《关于唐代的社邑》(1935年)等若干篇著名论文。那波利贞的研究拓宽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使学术界对敦煌文文献中的所谓“杂文书”的内容和价值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那波利贞以后去欧洲考察敦煌文献的神田喜一郎,在回国后完成了《敦煌秘籍留真》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而仁井田陞则在日本国内完成了他的敦煌学巨著《唐宋法律文书研究》。藤枝晃发表了《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充分利用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对归义军史做了深入的研究。铃木贞太郎与公田连太郎共同完成了《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六祖坛经·兴圣寺本六祖坛经》。

西方学者在这一阶段继续做出新的贡献。重要成果有:英国贝利《于阗文献选刊》和《于阗语文献集》,翟理斯《敦煌的六个世纪》,托玛斯《南语——汉藏边境地区的一种古代语言》;法国邦旺尼斯特《粟特语文献选刊》和《粟特语桑檀罗本生故事研究》,菲利奥札《龟兹语医药与占卜文献残卷》,谢和耐《荷泽神会禅师语录》;法国巴考、英国托玛斯和比利时图散《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德国赖歇尔特《英国博物馆所藏粟特语写本残卷》,挪威柯诺夫《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 悦振 国藏号于阗文医药文献》等。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纵观第一阶段的两个时期,我国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前一时期我国学者所能接触到的敦煌文献十分有限,但他们不遗余力地多方搜求,并且几乎全部公布了他们见到的有关历史的文献。虽然在今天看来他们所公布的资料在文字录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资料在此后几十年内一直是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材料来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掌握的资料很不系统,其研究成果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对归义军史的探索和历史典籍、宗教史文献、法律文献、地志类文献等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仍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所做的整理和研

究工作,在世界上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罗振玉父子在这一时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所做的贡献最大。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他们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历史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利用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应以王重民和向达的贡献最大。但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敦煌文献的主要方式是亲赴巴黎、伦敦查阅,他们拍照、抄录的大量文书除《敦煌掇琐》外大多未能像前一时期那样公开出版。这样,不能出国的人只能主要依靠前一时期公布资料或出国者赠送的照片进行整理和研究,其研究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而这一时期我国赴欧洲访求敦煌文献的几位学者的治学重点又均不在史学方面,这当然会对历史研究在整个敦煌文献研究中所占的地位产生影响。就整体而言,后一时期国内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古籍,热点在文学,对历史典籍的重视是因其系古籍的一部分。与同期的日本学界相比,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宽,如那波利贞对寺院经济文书和社邑文书等世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我国尚无人涉足;一些方面研究深度也有差距,未能出现如《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那样全面、深入、细致的论文。与西方学者相比,我们在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方面也有明显的差距。

## (二)

在第二阶段,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开始得到改善。

其表现一是英国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 ~~杂~~ ~~卷~~ ~~愿~~ 号以前部分的缩微胶片自 ~~员~~ ~~缘~~ ~~苑~~ 年开始与一些国家交换,我国和日本都在这一阶段得到这批缩微胶片。台湾史语所也于次年购得相同内容的缩印本(用缩微胶片冲印成册),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终于可在国内查阅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主体部分了。日本京都“西域文化研究会”在 ~~员~~ ~~缘~~ ~~苑~~ 至 ~~员~~ ~~缘~~ ~~愿~~ 年陆续出版了六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其中包括研究论文、资料、目录等方面的内容。其二是出版了一批有关敦煌文献的目录。商务印书馆于 ~~员~~ ~~缘~~ ~~愿~~ 年出版了由王重民、刘铭恕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该目录著录了北图藏、英藏、法藏和散藏的共两万多件敦煌文献,为国内外学者了解、调查、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此外,比利时瓦雷·普散出版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员~~ ~~缘~~ ~~愿~~ 年),翟理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完成了《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员~~ ~~缘~~ ~~愿~~ 年)。由孟列夫主编的《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卷和第二卷也在 ~~员~~ ~~缘~~ ~~愿~~ 至 ~~员~~ ~~缘~~ ~~苑~~ 年出版。~~员~~ ~~缘~~ ~~愿~~ 年,法国学者编纂的《法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卷也终于出版。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设立的“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研究室”陆续编辑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的“公文书”、“寺院经济”、“文学文献”和“道教文献”四种。这些当然有利于史学工作者对敦煌文献做进一步调查和研究。

有关西北地区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仍集中在对瓜沙史事的探索上。苏莹辉《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愿~~ ~~袁~~ 卷 ~~员~~ ~~期~~ ~~员~~ ~~缘~~ ~~苑~~ 年)和《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愿~~ ~~袁~~ 卷 ~~苑~~ ~~期~~ ~~员~~ ~~缘~~ ~~苑~~ 年),依据文书记载和沙州的地理形势提出寿昌、敦煌并非同时陷落的看法,指出建中二年陷落者应为寿昌。虽然苏氏对敦煌的陷落时间仍沿袭了罗振玉的说法,但其思路对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具有启发意义。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东方文化》~~愿~~ ~~袁~~ 卷 ~~员~~ ~~期~~ ~~员~~ ~~缘~~ ~~苑~~ 年),对戴密微提出的敦煌陷落于贞元三年(~~苑~~ ~~苑~~ ~~苑~~)的说

法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得到了包括苏莹辉在内的港台学者和欧洲学者的广泛认同。苏莹辉《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落最晚的原因》(《大陆杂志》愿源卷 怨期 愿源年),指出敦煌陷落最晚与吐蕃进攻河西的路线、河西节度使的进驻使守军增强及唐与吐蕃的通和等因素有关。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员辑 愿源年),指出文书中所记张淮深等归义军节度使的职衔有自称和朝命之别,确定光启三年(愿苑)向朝廷求旌节者为张淮深,推断张淮深在继任后的很长时间内,甚至可能终身都未被朝廷授予节度使名义,并对其原因和当时归义军内部的矛盾做了初步探讨。该文还确认莫高窟第 怨窟张承奉题名的结衔是当时自揽实权的索勋赠与的虚衔;讨论了曹议金的继任时间和卒年;初步考察了归义军与甘州和凉州的关系,认为凉州收复后即属归义军管内,但至张淮深末年,除瓜、沙二州之外,凉、甘、肃等州相继失控。此文虽存在如将文书中的“天福”年号误释为“天祐”等不足,但依据新资料提出了新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是这一阶段取得成就较大的文章之一。苏莹辉《瓜沙史事系年》(《中国东亚学术年报》第 圆期 愿源年),综合前人著述,以年为经记述瓜沙史事,并依据法国人的提示确定曹元忠卒于公元 怨源年。金启宗《唐末沙州(敦煌)张议潮起义》(《历史教学》员缘年 圆期),对张议潮团结少数民族、重视农业和水利等巩固政权的措施进行了考察。苏莹辉《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州郡之年代》(《新社学报》圆期 愿源年),对张议潮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进行了讨论,并对张议潮收复河陇的年代和收复各州后献表的年代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对正确理解文献与文书相关记载的差异具有积极意义;《试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后遣使献表长安之年代》(《包遵彭先生纪念论文集》愿源年),考察了张议潮先后派遣的各批专使之姓名、所取道途、抵达长安的日期及上图籍情形等问题;《张淮深于光启三年求授旌节辩》(《敦煌学》猿辑 愿源年),认为光

启三年向朝廷求旌节者不一定是张淮深,也有可能是索勋或张淮口,指出唐长孺关于张淮深终身未获节度使旌节的推测“似乎言过其实”。此文的前一推论未能得到学界的认可,后一判断却为以后新发现的材料所证实。陈祚龙整理出版了对研究瓜沙史事具有重要价值的《唐五代敦煌名人邈真赞》。

这一阶段有关瓜沙史事的研究以苏莹辉用力最勤,成果也最为丰富。在这二十多年间,苏氏陆续发表有关论文达十多篇,这些论文大多被收入他的论文集《敦煌论集》(台湾学生书局 1982年)和《敦煌论集续编》(台湾学生书局 1985年)中。虽然他的一些论文是以综合、整理前人的成果为主,但也力图在排比旧说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并解决了一些问题;虽然他的不少推测都为后来的研究所否定,但这些推测往往能引起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因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有关问题的研究。在大陆学者与海外信息交流不畅的年代,苏氏的研究成果在港台和欧日均有广泛的影响。他是这一阶段推动港台地区敦煌学发展的代表人物之一。

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东方学报》京都 1981年),对吐蕃管辖敦煌时期历史做了深入的探讨。这方面的成果还有石泰安《汉藏边境的若干古代民族》。

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其他材料考察莫高窟史此期开始有人涉足。宿白《莫高窟记跋》(《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 圆期),考证了莫高窟的始建年代、窟数及一些窟像的建造年代。金维诺《敦煌窟龕名数考》(《文物》1953年 缘期),依据敦煌文书《十二月八日夜社人遍窟燃灯分配窟龕名数》,对部分洞窟的名称和建造年代进行了考证。虽然作者对文书年代的推测为以后的研究所否定,但对文书所记洞窟的认定却有很多被近年的研究所证实。

对社会经济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阶段受到大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在资料整理方面最重要者当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辑

录的《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 1957 年),其内容包括户籍、名籍(差科簿)、地亩文书、寺院僧尼丁壮眷属名牒、契约等 14 种社会经济方面的文书原卷录文,大部分系编者从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由于当时许多研究者尚无条件利用敦煌文献缩微胶片,故这本资料集的出版为史学工作者研究、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方便。虽然此书在文书的定名和文字的录校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但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传入我国之前,它一直是许多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史料来源。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经济的则有西村元佑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日野开三郎的《唐代租庸调研究》。

开始尝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均田制)、租佃关系、徭役制度与农民的生活状况等问题是这一阶段大陆学界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探索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相关,对均田制的研究一度成为唐史研究的热点,争论的焦点是唐代均田制的施行问题。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研究》(《历史研究》1959 年 1 期),认为唐代均田制度实际上并未施行,其立论依据之一就是敦煌户籍文书。他指出在敦煌户籍中,每一户的已受田数目距其应受田之数无不相差甚多,而已受田与未受田的比例各户又绝不相同,这足可说明唐代的均田制度在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看法与三十年代曾了若依据敦煌户籍得出的结论略同<sup>①</sup>,但在五、六十年代受到许多唐史学者的反对。有趣的是反对者也以敦煌户籍作为主要论据之一。岑仲勉《租庸调与均田有无关系》(《历史研究》1959 年 1 期)、韩国磐《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历史研究》同上年同期)、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同上年同期)等文均认为均田制曾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过。他们指出,受田不足是从北魏开始推行均田制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唐代敦煌户籍存在受田不足的现

① 韩国学者全海宗在 1953 年也发表过类似看法(见《历史学研究》1953 年第 1 期)。

象也在情理之中,不能据此以否定均田制;各户各乡受田并非同年,在不同年月政府收回的口分田数量与受田户受田丁数亦不同,故户籍中所记各户已受田与未受田的比例不能划一。李必忠《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4期),试图用唐代法律中有关宽乡、狭乡的规定解释户籍中受田不足的现象,并指出在户籍上有应受田、已受田、永业田、口分田等符合均田令规定的名目,且合应受田数与均田令的规定基本相符,这都表明均田制确实实行了。田野《关于唐代均田实施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83年1期),认为敦煌户籍证明了均田与私田是并存的,户籍上出现受田不足的现象是因耕地少造成的。韩国磐《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1期),利用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中保存的授田和还田的记载,进一步论证唐代确曾施行过均田制,并对文书中所记载的永业、口分、园宅和自田等田地的性质做了初步探索。他还依据敦煌文献论证唐代确实存在自给自足的庄园。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山东大学学报》1984年1期),对敦煌户籍所载各户应受田数量依据田令的规定进行了全面核算,结果与上述李必忠的结论相合;他还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授田还田的资料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唐氏的工作为上述多数学者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证据,但他同时指出田令施行的程度被夸大了。现在看来,胡如雷等的观点理由更充足一些,证据也更充分一些。但邓广铭的文章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人们对均田制的研究,其观点对后来人们进一步探索均田制的实质也有启发。对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租佃契约的性质,学者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起初,人们将其都看作封建租佃契约。韩国磐《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问题》始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认为一种是贫苦农民不得已而典租土地,实际上是以田地作为抵押的关系;另一种是缺地农民以很高租额租种土地。孙达人



《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1954**年 远期），进一步明确了这两种契约的不同性质，指出一种是租田人利用租价（高利贷）剥削“田主”（贫苦农民）的关系；另一种是真正的封建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地租是租地人向地主提供的无偿劳动。上述探索对于深入认识古代封建租佃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6**年 5期），结合传世文献考出以前被人们称为“丁籍”或“男子之籍”的数件敦煌文书系唐天宝十载政府为征发徭役而编造的“差科簿”，对文书中出现的职务和徭役名称分别进行了考释，丰富了人们对唐代徭役特别是色役的认识，是这一阶段史籍文书相互印证、相互发明的成功之作。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 源期），尝试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物价资料探索天宝时的农民生活情况，认为一般农户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55**年 远期），利用敦煌文书揭示了武则天长安年间关于逃亡人户法令的变化。崔维德《唐代财政制度》，也利用了相关的敦煌文书。

历史典籍方面。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 **1956**年）对以往有关敦煌古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和汇编，其中包括我国学者在第一阶段介绍和研究敦煌历史典籍的主要成果，为人们了解、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方便。在此基础上对历史佚籍进行整理校录的有郑良树《春秋后语辑校》（《书目季刊》源卷 源期 **1954**年）。传世史籍则以陈铁凡对敦煌本《尚书》的整理和研究最为系统。其《敦煌本尚书述略》（《大陆杂志》**1954**卷 愿期 **1955**年），全面介绍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 **10**件《尚书》的内容、所存行数、书写年代和有关研究信息。而《敦煌本虞书校证》（《南大中文学报》**1954**期 **1955**年）、《敦煌本夏书校证》（《南大中文学报》**1954**期 **1955**年）、《敦煌本商书校证》（台湾商

务印书馆 员缘年)和《敦煌本虞夏书校证补遗》(《大陆杂志》猿卷 圆期 员愿年)等论著则是参照多种传世本和相关文献分别对 猿件敦煌本《尚书》进行校录。《敦煌本尚书十四残卷缀合记》(《新社学报》猿期 员愿年),在王重民所做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将已断裂为 源件的敦煌本《尚书》重新缀合为五卷。此外,陈铁凡《法京所藏敦煌左传两残卷缀合校字记》(《书目季刊》缘卷 员期 员愿年),将两件敦煌本《左传》缀合为一卷,并与今本进行了校勘;《左传节本考》(《大陆杂志》源卷 苑期 员愿年),对敦煌节本《左传》进行了考证。对敦煌本《春秋穀梁传》作进一步校理的成果有田宗尧《春秋穀梁传阮氏校勘记补正》(《孔孟学报》愿期 员愿年)。苏莹辉《敦煌写本国语解残卷》(台湾《史语所集刊》外篇第 源种 员愿年),尝试对敦煌本《国语解》的本源进行了推究。研究敦煌本《史记》的有乔衍官的《敦煌卷子本史记残卷跋》(《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圆期 员愿年)。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在历史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港台地区的学者已成为主力,其中陈铁凡取得的成就最大。陈氏的工作并不限于历史典籍,在整理和研究敦煌写本《论语》、《孝经》等古籍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宗教史方面。谢和耐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资料结合传世记载撰写了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有中译本)。兹野井恬《唐代佛教史论》,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资料。藤枝晃《敦煌の僧尼籍》(《东方学报》京都 圆册 员愿),对敦煌僧尼籍做了精细的考证。竺沙雅章《敦煌の寺户について》(《史林》源卷 缘期 员愿)、《敦煌の僧官制度》(《东方学报》京都 猿册 员愿),充分利用英藏敦煌文献中的资料,对敦煌的寺户制度、僧官制度做了开创性的研究。苏莹辉《论敦煌资料中的三位河西都僧统》(《幼狮学志》缘卷 员期 员愿年)和《从敦煌吴僧统碑和三卷敦煌写本论吴法成并非绪芝之子亦非洪辩和尚》(《大陆杂志》源卷 猿期 员愿年),对竺沙雅

章等将《吴僧统碑》中之吴僧统与敦煌文书中的洪辩、吴和尚比定为一入提出异议,并试图证明他们是三个人。他关于吴和尚为另一人的证据比较充分,再经上山大峻等进一步论证后已得到公认,但否定吴僧统与洪辩为一入却未举出过硬的证据,受到多数研究者的反对。戴密微完成了他运用敦煌文献研究禅宗入藏问题的名著《拉萨僧诤记》(有中译本)。饶宗颐《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序说并校记》(《崇基学报》怨卷 圆期 员苑年),在欧美日学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发现的敦煌文献及相关汉藏文资料,对禅宗入藏的历史、地理、年代等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索。胡适依据西方学者新发现的资料 and 有关研究成果,对神会的《坛语》、《定是非论》做了新的校订,收入新版《神会和和尚遗集》(胡适纪念馆 员苑年),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柳田圣山出版了《初期禅宗史書の研究》。牧田谛亮出版了《疑经研究》。贝利则又发表了《于阗语佛教文献集》。道教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围绕《老子道经想尔注》进行。饶宗颐《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东南书局 员苑年),首次影印、校录了《老子想尔注》,发掘出了反映道教原始思想的重要资料。饶氏考证该书为张道陵所著,并据之对东汉老学神仙家说进行了探讨。陈世骧《“想尔”老子道经敦煌残卷论证》(《清华学报》新 员卷 圆期 员苑年),认为“想尔注”乃张鲁所为,其性质是道教初期一派的教门圣典。饶宗颐《想尔九戒与三合义》(《清华学报》新 源卷 圆期 员苑年)和《老子想尔注续论》(《福井博士颂寿纪念东洋文化论丛》 员苑年),对作者关于“想尔注”成书年代的结论作了进一步论证。对景教文献的研究有梁子涵《敦煌景教之文献》(上)(《大陆杂志》 员卷 员期 员苑年)、《敦煌景教之文献》(下)(《大陆杂志》 员卷 圆期 员苑年)、《唐代景教译经考》(《大陆杂志》 圆卷 苑期 员苑年)等文,对敦煌文献中的景教文献作了介绍、说明和校录,并据之探索了景教的汉文译经情况。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的社会史在这一阶段也有进展。竺沙雅章《敦煌出土“社”文書の研究》(《东方学报》京都 猿册 员源年),对上一阶段那波利贞利用较少的英藏敦煌文献中的社邑文书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研究。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文史》猿辑 员源年),依据敦煌写本《新集吉凶书仪》和《下女夫词》中的婚礼资料,结合史书、笔记、诗文等考察了送通婚书、新郎迎娶和女家的仪节、男家的仪节等唐代婚姻礼俗,描绘出了唐代婚礼过程,并考证了这些礼俗的渊源。毛汉光《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台湾《史语所集刊》源本 圆分 员源年),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北图藏《姓氏录》和英藏《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认为这两件族谱是流行于士大夫间的民间族谱,并分析了关于族谱标准论争的社会意义。罗宗涛《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文史哲出版社 员源年),分类摘录敦煌变文、敦煌曲、敦煌韵文中的社会风俗资料,加以考释。

法律文献方面。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汇集了第一阶段我国学者研究唐代律、令、式的主要成果。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是日本学者研究敦煌法制文献的代表作。唐长孺《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书两种跋》(《中华文史论丛》缘辑 员源年),首次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英藏《开元户部格》和《神龙散颁刑部格》的内容,并对其其中的一些资料结合史籍进行了探索。但作者未能考出这两件文书的正确名称,实际此前日本人已考出其中一件为《开元户部格》。

此外,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 员源年),利用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及传世汉藏文献整理注释《新唐书·吐蕃传》,是国内较早利用敦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研究历史的著作之一,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谢海平《讲史性之变文研究》(嘉新文化基金会 员源年),对以历史为题材的变文进行了探索。苏莹辉《敦煌石室真迹录题记订补》(《东海大学图书馆学报》怨期 员源年)和《敦煌石室真迹录题记订补之续》(《“中央图书馆”馆刊》新 圆卷 员

期(1955年),对王仁俊原书有关历史文书的按语有所补正。

第二阶段我国学者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发展比较平缓。与国外同行相比,在瓜沙史地和历史典籍的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虽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但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则已明显地落后于法日等国。

第二阶段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港台学者成为研究敦煌历史文献的重要力量,他们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

### (三)

在第三阶段,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巴黎国立图书馆将所藏全部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公开出售,并出版了韩百诗主编的《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画图版》、麦克唐纳夫人等合编的《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书选刊》和《伯希和石窟笔记:题记与壁画》(韩百诗主持整理)。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也开始在国内发行。英国国家图书馆卫泓博士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敦煌文献数据库(网址: <http://www.bl.uk/egypt/egypt.htm>),麦肯尼发表了《英国图书馆所藏粟特语佛教文献》。苏联则出版了《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册。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1—1985年),将英、法和北图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成书。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推出。现已出版的有《英藏敦煌文献》(1—5卷,只差第6卷目录尚未出版)(四川人

民出版社 员熙园-员熙缘年)、《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 圆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熙猿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全 圆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熙缘年)、《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 苑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熙远-员熙愿年)、《甘肃藏敦煌文献》(全 远册,甘肃人民出版社 员熙熙年)、《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 源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熙熙年)、《浙藏敦煌文献》(全 员册,浙江教育出版社 圆熙圆年)、《俄藏敦煌文献》(员-苑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熙圆-圆熙圆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员-苑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员熙熙-圆熙员年)、《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员-猿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熙缘-圆熙缘年)、《俄藏敦煌艺术品》(员-远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熙缘-圆熙缘年)。目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在重新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出 猿册),计划在 圆熙苑年出齐 员熙圆册;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计划出 员熙-员熙册。这些新印本的图版比以往的印本和缩微胶卷清晰,有利于正确释录图版上文字。

目录方面,法国又出版了《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 猿源缘册,现在只差第 圆册正在编辑之中。此外,池田温任责任编辑的《讲座敦煌·缘·敦煌汉文文献》,对包括历史文献的敦煌汉文文献做了全面的介绍。

我国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一道,充分利用上述有利条件,在第三阶段掀起了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热潮,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得到迅速发展。史学工作者置身其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前两个阶段。

对西北地区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全面展开。

榎一雄任责任编辑的《講座敦煌·员·敦煌の自然と現状》、《講座敦煌·圆·敦煌の歴史》和池田温任责任编辑的《講座敦煌·猿·敦煌の社会》,对敦煌的各个时期(包括唐代)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敦煌学辑刊》员集 员熙园

年)和《敦煌沿革与人口》(续)(《敦煌学辑刊》1981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史籍与敦煌文献中的有关资料,首次对敦煌自建郡以来直至清代的行政、地理沿革及人口变化做了系统考察。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台北《汉学研究》源卷 1981年 10月)和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1年 1期)分别对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和学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1年 1期),全面搜集了敦煌学郎的题记资料。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汉学研究中心编《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81年),深入讨论了敦煌文献中的启蒙教材。

马德、史苇湘《河西节度使公文集》保存了一些反映“安史之乱”后河西节度管内情况,及河西节度使与伊西北庭留后关系的资料,唐长孺最早利用其中的材料探讨伊西北庭节度使及留后的情况。其后,安家瑶又撰文对该文书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史苇湘则结合其他材料对文书记述的河西节度使覆灭前的情况做了解说。但由于该文书首尾残缺,以上学者对文书名称、年代和文书中人物的归属认识并不完全一致。马德在此基础上撰《关于马德、史苇湘写卷的几个问题》(《西北师院学报》1981年增刊),认为这件文书应是经过汇集和整理的誊抄文卷,其誊抄时间应在大历元年(766)夏秋之后至大历二年,其名称应为“河西节度使公文集”。马氏还对史苇湘提出的文书中的“副元帅”和多次出现的“尚书”应为杨休明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关于敦煌陷蕃的年代问题,仍不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既有人对旧说作进一步论证,也有人尝试提出新说。安忠义提出贞元四年(788)说,马德再倡吴廷燮提出的大历十二年说,李永宁则提出两次陷落说,即敦煌首次陷蕃于建中二年,再次陷蕃于贞元三年。史苇湘、杨铭亦主张敦煌首次陷落于建中二年,其后,因一再发生汉人反蕃起义而导致敦煌的“陷落”和“降下”不止一次。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1年 1期),对山口瑞凤提出的贞元二年说

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此说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还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沙州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矛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沙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称“节儿”,王尧依据藏汉文书碑铭考出了这一语词的含义和来源,指出它是吐蕃官制中一城一地的守官。邵文实《沙州节儿考及其引申出来的几个问题》(《西北师大学报》**1984年 3期**),考出沙州节儿执掌当地军事、财政和司法大权,其上司是节度使,其属官有都督、部落使和判官等。吐蕃统治者用部落制取代了沙州的县乡里行政组织,有关情况日本学者曾作过初步探讨。王尧、陈践和杨际平都曾涉及这方面问题。姜伯勤《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敦煌研究》**1984年 3期**),在详尽考证由道士、女官及有关内亲外亲组成的“沙州道门亲表部落”的同时,也概述了部落设置的一般情况。姜氏和张广达还先后探索了沙州行人部落的性质,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4年**),认为担任驿传任务的人员属于行人部落。杨铭认为敦煌地区的通颊部落管理人身地位较低的寺户、杂户等。荣新江《通颊考》(《文史》**1984年 1辑**)充分利用藏汉文书资料,对通颊部落的渊源、组成及在敦煌、河西等地的设置情况进行了考证,证明敦煌的通颊部落是吐蕃统治者镇抚百姓的重要军事力量。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西北史地》**1984年 4期**),考辨了吐蕃在敦煌设置部落的时间、次数、部落的名称与作用。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4年**),对吐蕃时期的计口授田制、突税差科和农业、商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陈国灿分析了吐蕃土地赋役与唐制的联系,杨铭对计口授田的渊源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所见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 1辑**),探索了吐蕃时期发生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的原因、时间和作用,指出起



义打击了吐蕃在沙州的统治。马德也对这一时期沙州的史事进行过探讨,对部分文书和史事的年代持有自己的看法。

归义军政治史仍是学者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创获颇多。姜亮夫《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订补》,搜集罗振玉所不及见的有关文书和石窟题记等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成文,意在拾遗补缺正误,但在参考研究信息方面存在不足。苏莹辉《瓜沙史事概述》(台湾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员愿缘年**),似系综合旧作而成,但未能参考大陆有关新成果,一些地方沿袭了已为学界所不取的旧说;《咸通中凉州节度使统管凉洮鄯河临五州说》(《史学汇刊》**怨卷 员苑愿年**),推测瓜沙与凉州曾分为二部,张议潮卒后,张淮深曾任凉州节度使或曾兼任凉州节度使。胡小鹏《关于唐末五代宋初凉州自立政权的几个问题》(《西北师大学报》**员愿愿年 员期**),认为张议潮收复凉州后不久,河西地区又陷入各族混战中,形成了包括归义军政权在内的几股势力,凉州自立政权是其中之一。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西北师院学报》**员愿园年 圆期**),用充分的证据否定了流行多年的索勋作乱杀淮深兄弟自立为节度使的旧说,并推测张淮深之死与唐廷有关。此文引起了学界的反响,李永宁、钱伯泉和邓文宽等都同意孙氏对旧说的否定,钱伯泉为孙氏的观点补充了证据。但对张淮深的死因,李永宁和邓文宽又分别提出了与孙氏不同的看法。李永宁《竖牛作孽,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权者之更迭》(《敦煌研究》**员愿元年 圆期**),认为杀淮深者为张议潮子淮鼎。淮鼎临终将幼子承奉托付索勋辅佐,不意索勋在淮鼎死后竟自立为节度使,被嫁给李明振的议潮女张氏及诸子杀掉。张氏虽名义上复立侄承奉为节度使,实权却掌握在诸子手中。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在肯定李永宁上述推论的前提下,以充分的材料证实了李明振诸子执掌大权排挤张承奉的论断,并进而推论瓜沙大族在**愿苑年**又发起倒李扶张的政变,张承奉得以掌握

实权。杨秀清则试图从淮深父张议潭与议潮间的不和来解释淮鼎杀淮深的原因。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4年 猿期**），对王重民确定的金山国建立于**848年**说提出质疑，认为应在**849年**。李正宇进一步指出王重民确定金山国建立时间的依据不能成立，并提出**852年**说。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对藤枝晃提出的**850年**说进行了有力的论证。荣新江进一步为**850年**说补充了证据，并对金山国建立的日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850年**说已为多数学者接受。姜亮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搜集史籍、文书、洞窟题记中有关曹氏父子夫妇、家世婚姻的资料，汇为一编，为进一步研究曹氏归义军史提供了方便。此文推定曹元忠卒于**859年**，但文中对一些史料定年或内容的理解存在问题。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 猿期**），指出了姜文存在一些问题，并确定曹氏取代张氏始于**859年**，推定曹议金卒于**864年**，考定曹延恭卒于**862年**。姜亮夫《瓜沙曹氏世谱》（以上所列姜氏诸文均被收入该氏《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试图通过考辨莫高、榆林窟题记和敦煌文书来组织曹氏家人关系，在利用洞窟题记时存在一些错误。孙修身《谈与瓜沙曹氏世谱有关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 缘期**），对姜文做了补正。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也为探索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事迹作出了贡献。起初，人们都以为曹氏归义军的首任节度使是曹议金。六十年代，日本学者最早提出曹仁贵应为曹氏首任节度使的说法。马楚坚于**1980年**提及曹仁贵取代张氏的问题。以后，苏莹辉对曹仁贵为曹氏首任节度使做了初步论证。唐耕耦《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始末》（《敦煌研究》**1986年 圆期**），为落实这一问题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材料。但曹议金为曹氏归义军第一代执政者的说法也是言之有据，于是，如何解释仁贵与议金的关系成为难题。贺世哲、李正宇先

后撰文论证仁贵就是议金,不过不同时期使用了名和字,此说虽无直接证据,但推论合理,已为学界接受。荣新江《敦煌卷子札记四则》,考定议金卒于~~883~~年二月十日。谭蝉雪《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敦煌研究》~~1985~~年~~1~~期),考定元德卒于~~883~~年,并为陈祚龙所考曹元深卒于~~883~~年提供了新的证据。至此,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卒立时间与世系已基本明确。与此同时,我国学者还对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荣新江《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和《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指出归义军在表面归顺唐廷的背后,双方实际上存在着明争暗斗的关系。尤其在张淮深主政时期,自~~883~~年至~~883~~年多次遣使求授旌节,但长期未能得到朝廷的有力支持。荣氏找到证据证实直至~~883~~年朝廷才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吴震《张淮深论节始末补证》(《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纪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对淮深求授旌节屡受挫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杨秀清《晚唐归义军与中央关系述论》(《甘肃社会科学》~~1983~~年~~4~~期),提出将双方关系划分为互为声援、逐渐疏远与名存实亡三个阶段。李正宇考察了曹仁贵归奉后梁的过程和时间,并曾论及曹元深与中央朝廷的关系。苏莹辉对曹氏归义军兼事宋辽的情况进行过探索。荣新江《归义军改元考》,在藤枝晃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证了归义军时期中原王朝年号在敦煌文献中的始见和终止时间,为人们了解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疏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归义军官制方面,苏莹辉对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称王及受封为王的情况作过初步探索。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3~~年;其修订稿刊于《敦煌学》~~1983~~辑,~~1983~~年),搜集考辨大量有关史料,对历任节度使生前死后由低到高的各种加官称号做了系统分析。此文虽有个别节度使的称号的确定存在问题,但总的来看做得比较彻底,已成为人们确定相关文书年代的依据。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

研究论集》**猿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员愿年**),考察了归义军所属各机构的名称和各机构长官的职衔。荣新江对归义军府僚佐的情况进行了考证。齐陈骏、冯培红探讨了归义军的基层将领“十将”及其下属诸职。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敦煌研究》**员愿年 猿期**),考证了唐五代各个历史阶段敦煌乡里的增减情况。刘进宝对陈文有所补充。

对归义军社会经济的研究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员愿年 员期**),对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户口、土地制度和赋税做了开创性探索,但其有关归义军政权处分土地原则的解说和对文书年代的判定都存在问题。唐刚卯考察了归义军的请田制度。杨际平《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敦煌学辑刊》**员愿年 员圆期**),对归义军时期请射土地的范围和原则做了进一步论述,并对归义军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性质提出了看法。近年,刘进宝连续发表了《**马建忠**号《壬申年官布籍》研究》(《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社 **员愿年**)等系列论文,对归义军时期“布”、“地子”等赋税的有关情况做了进一步探索,并尝试利用敦煌文献中的材料,结合史籍观察同期中原地区的情况。郑炳林《唐五代敦煌手工业研究》(《敦煌学辑刊》**员愿年 员期**),全面考察了唐五代敦煌工匠的称谓、都料的身份以及归义军对手工业的管理等。刘惠琴试图通过敦煌文书中有关纺织物的记载观察敦煌的纺织业。郑炳林对敦煌的酿酒业和种植林业分别进行了探讨。雷绍锋讨论了曹氏归义军使衙雇佣的“牧子”。郑学檬《从敦煌文书看唐代河西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员愿年**),主要依靠敦煌籍帐资料重点对瓜沙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进行了考察。

对莫高窟史的研究,这一时期成果明显增多。史苇湘《丝绸之

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世族与石窟》(均见《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在概略论述莫高窟兴衰历程的同时,着重阐发了其兴衰演变的历史背景。王素《敦煌出土前凉文献所见“建元”年号的归属》(《敦煌吐鲁番研究》4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论证敦煌文书和碑铭中记述莫高窟始建的“建元”年号应属东晋。施萍婷《建平公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以文书题记和石窟题名相结合,确定了第 195 窟为建平公窟。贺世哲《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校勘》(《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依据供养人题记,结合敦煌文献、碑刻和史籍,对莫高窟部分洞窟的修建年代进行了考证。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考出了一批曹氏时期洞窟的窟主和修建年代。王惠民《独煞神与独煞神堂考》(《敦煌研究》1983 年第 1 期),考出了文书中记载的独煞神与独煞神堂。马德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专题研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9 年)。他在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中的造像功德记及其它有关文书的基础上,运用石窟考古学上的崖面使用理论,结合供养人题记及史籍等多方面的相关资料,考出了一批洞窟的年代和施主;并对佛教石窟建筑的起源、莫高窟佛教活动的社会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有关唐宋之际西北民族的资料十分丰富,涉及归义军政权控制地区的少数民族、归义军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情况、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和西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这些资料在前两个阶段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以上各方面都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陆庆夫《略论敦煌民族史料的价值》(《敦煌学辑刊》1985 年第 1 期)、《敦煌民族文献与河西古代民族》(《敦煌学辑刊》1985 年第 4 期),论述了敦煌文献中少数民族资料的价值及与唐宋时期河西少数民族的关系。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

煌研究》**员怨年 源期**)等系列论文,考察了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及在敦煌佛教、敦煌农牧业和商业、手工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员怨年 远期**),从职业分布、婚姻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探讨了敦煌粟特裔民的生活情况和汉化问题。陆庆夫还尝试依据敦煌写本判文观察唐长安的粟特聚落情况。苏莹辉讨论了慕容氏与曹氏的婚姻关系。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敦煌学辑刊》员怨年 员期**)、《略论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敦煌研究》员怨年 源期**),认为曾担任瓜州刺史的慕容归盈一系出自吐谷浑慕容氏,并探讨了慕容归盈及其后代与归义军的关系。从整体上探讨归义军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的研究成果,常与讨论西北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成果交织在一起。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总第 源期 员怨年**),最早对唐后期至宋初河西各民族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初探》,概略考察了归义军政权与凉、甘、肃、西、伊等州,楼兰、于阗等地的关系及归义军与周边各族相互影响的情况。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和《吐蕃对河西的统治及归义军前期的河西诸族》(**《甘肃民族研究》员怨年 圆期**),指出唐代西北诸族有与吐蕃融合的趋势,分析了归义军前期河西诸族的复杂情况及与归义军的关系。邵文实《唐代后期河西地区的民族迁徙及其后果》(**《敦煌学辑刊》员怨年 员圆期**),讨论了由于吐蕃的侵入造成河西诸族的迁徙过程及其后果。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员怨年 员期**),论述了甘州回鹘和安西回鹘对归义军历史的影响。以上诸文均属综合研究,自不能对各个方面作深入细致的探索。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员怨年 缘期**),主要利用四种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论证张淮深曾两次平定甘州回鹘。此文的最大贡献是发掘出了有关回鹘与归义军关

系的新史料,但由于这些史料没有具体年代,所记回鹘的族属亦不明确,因而不断引起学者们对这批材料的思考和研究。黄盛璋认为淮深平定的回鹘应来自沙州的西方。郑炳林《敦煌本张淮深变文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1期),认为淮深平定的是位于玉门关外曲泽一带的西桐回鹘,西桐回鹘属于西州回鹘系统;《唐五代敦煌金山国征伐楼兰史事考》,讨论了张承奉征讨楼兰的时间、原因及当时楼兰所居民族的族属。荣新江《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4期)、《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敦煌研究》1989年4期),对曹氏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做了全面探讨。苏北海、丁谷山、孙修身也都对这方面问题有所论述。荣新江还考察了曹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的关系和在文化方面的交往。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 1985年),从酒的支出观察到瓜沙与甘州、伊州、西州、于阗交往频繁。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敦煌学辑刊》1989年1期),考察了归义军与周边政权通使的使团首领——使头一职的设置及其权限、作用等。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探讨,以甘州回鹘最引人注目。但成果虽多,分歧也很大。诸家观点,难以备述。大致说来,在甘州回鹘的建立过程与建立时间的诸说中,以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89年3期)的论证最为充分。关于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高自厚、苏北海、周美娟、孙修身、程溯洛等都曾作过排列。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敦煌学辑刊》1989年4期),在吸收以上诸家成果的基础上,对甘州回鹘可汗的世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施萍婷、黄盛璋、邵文实等对“南山”部族进行了探讨。郭锋《略论敦煌归义军时期仲云人(物)的族属诸问题》(《兰大学报》1989年1期),讨论了仲云的族属和活动时限。黄盛璋亦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年)、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分别考证了

达怛和龙家部族的有关情况。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 4期),依据一篇文学文献考出了西州回鹘的一些官制和民族情况。钱伯泉《沙州回鹘研究》(《甘肃社会科学》**1983年** 远期),提出敦煌在归义军后应有一个沙州回鹘时期,并试图考定这一时期的时限。但此文和作者有关回鹘的其他论文一样,对回鹘的作用和活动区域似估计得过大,对其活动时限似估计得过长。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198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史地语文篇》,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5年**),认为沙州回鹘统治沙瓜的时间约从 **1004年** 到 **1038年**。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5年**),论述了沙州回鹘国的建立、消亡过程,以及政权组织、社会性质、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并附有相关回鹘文献译文和疏证。钱伯泉综合考察了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和西北各民族政权的交往情况。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83年** 猿源期)等文,试图通过探索甘州回鹘与中原的交往,勾勒出五代时期中西交通的概貌。李德龙曾论及甘州回鹘与唐廷朝贡贸易。荣新江考察了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阆的影响。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年**),也利用了相关的敦煌文书。

敦煌文献中的碑文、墓志铭和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对研究唐宋时期西北历史和民族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这一阶段大量原材料的公布为对各方面文书进行分类整理提供了可能。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缘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84年**)最早对这类文献进行了全面释录,但文字释录存在不足。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4年**),补充了唐、陆录校遗漏的重要文献,在探寻所收录的文书之间关系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且在详尽的注释中备列并考释了大量相关文书,颇为学界称道,惜录文仍不完善。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



究》(新文丰出版公司 吴昊源年),专门对邈真赞做了进一步的精细录校和研究。

在这一阶段对西北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中,荣新江的研究最有特色。荣氏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被收入其《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昊源年)。首先,荣氏是在对敦煌文献中有关文书进行了全面调查、整理、排年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与那些仅对一件文书或部分文书加以解释、阐发的学者相比,荣氏的研究虽也存在局限和不足,但从总体上说,他对问题的观察比较全面,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八十年代以后,在全面调查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对某类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学者颇多,但对有关归义军史和西北民族关系的文书进行全面系统整理研究的学者尚不多见。其次,荣氏的研究所含学术信息量较大。他的论著都注意详列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将自己所讨论问题的正、反面资料 and 前人论说均加以考辨和评说。在当前敦煌文献研究领域严重存在对前人研究成果重视不够的情况下,荣氏的做法特别值得表彰。其三,荣氏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如他力图将归义军史的研究放到唐宋之际中国历史的复杂背景中,故其成果对唐后期藩镇的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近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分专题对归义军史开展研究,已初步显示出规模,亦值得注意。

利用敦煌文献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文书研究历史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重大进展。由山口瑞凤任责任编辑的《讲座敦煌·远·敦煌胡语文献》,对敦煌文献中的胡语文献做了全面介绍和解说。山口瑞凤还主持编纂了《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俄国则出版了萨维茨基编纂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在对吐蕃文献的译释和研究方面,王尧、陈践合作或分别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内容涉及吐蕃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文化及归义军与于阗关系等诸多方面。他们的论文多被收入王尧、陈践

《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年)和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中国藏学出版社 1989年)。王、陈还合作编著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 1990年)、《敦煌吐蕃文献选》(汉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8年),将部分重要的吐蕃历史文献译成汉文,并附有注释和疏证,为学术界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方便。林梅村《藏文古籍所述于阗王谱系迄始年代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 3期),认为包括敦煌藏文文献在内的藏文古籍所记于阗王谱系的起始年代在东汉末。林冠群《唐代吐蕃史料研究》(《大陆杂志》1980卷 1期 1980年),介绍了敦煌文献中的吐蕃文献。张广达、荣新江、任树民、马林、汶江、陈庆炎、端智嘉等也对吐蕃历史文献进行过研究。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の研究》,使用了大量敦煌吐蕃文献。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年)及相关论文,全面介绍了敦煌突厥回鹘文献的内容及研究情况。李经纬《九件回鹘社会经济文书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 1期)等论文,译释了一些回鹘文历史文书。牛汝极《六件 9-10世纪敦煌回鹘文书信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80年 1期)等系列论文亦译释了一批回鹘文历史和宗教文献,杨富学也参加了其中部分工作。黄振华《于阗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 3期),介绍了敦煌于阗文文献的内容、价值和研究情况。张广达、荣新江在深入钻研有关汉文文献的基础上,对涉及于阗国号年号、从德太子、使臣等一批于阗文献的年代进行了考证,并利用各种语言资料探讨了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和王家世系、于阗之佛寺等问题。他们的主要成果已结集为《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 1988年)。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中之龙家及其相关问题》(《西域研究》1985年 1期)等系列论文利用于阗文文书结合其它语种文献研究探讨了西北民族问题和历史地理问题。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 3期),介绍了敦煌粟特文文献的内

容、价值和研究概况。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1期），推断敦煌出土的粟特文书信的年代可能在公元494年。荣新江《古代塔里木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82年1期），依据敦煌和新疆地区出土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对于阗、楼兰、据史德、龟兹、焉耆等地的古代粟特移民情况进行了考察。季羨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及相关系列论文，考察了吐火罗语的发现、资料内容、价值和研究方法，并探讨了吐火罗语两个方言之间及与其它语言的关系。

这一阶段对地理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常与对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李并成《敦煌遗书中地理书卷的学术价值》（《地理研究》1984年1期），全面阐述了敦煌地理文书对历史地理学的重要价值。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2年），收集该类文献比较齐全，注释亦详，以辑录相关文书较多为其特色。他在此基础上还撰写了探讨古代敦煌道路、山名等问题的系列论文。王仲荦对一批地理文献逐篇进行考释，其成果经郑宜秀整理编成《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一书，其考释以征引史籍文献繁富为学界称道。但以上两书的录文都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充分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大唐西域记》残卷。周绍良《读〈沙州图经〉卷子》（《敦煌研究》1982年1期），考察了其中之“歌谣”反映的史迹。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敦煌学辑刊》1982年1期）等文，对该件所记地名进行了考释。黄氏还对沙州曹氏归义军的军镇进行过探讨。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4年1期），对唐五代瓜沙地区军镇的职能、演变、位址等做了全面考察。他还对敦煌四出道路作过探讨。程喜霖《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4年1期），结合史籍对《西州图经》所记道路进行了考

证。宁欣《唐代敦煌地区水利问题初探》(《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猿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员怨愿年**),依据敦煌文献对敦煌地区的水渠和对水渠的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索。通过实地踏勘的方式对地理文书与其它文书史籍记载的瓜沙地区古城、关、道路、驿站、渠道等进行调查考证,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方面以李并成和李正宇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李并成发表的有关系列论文和《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员怨缘年**),调查考证的范围包括古城址、玉门关址、军镇和戍址、驿址、古道路、水系等,并对古代瓜沙与河西的开发史和绿洲变迁、沙漠化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李正宇调查考证了敦煌的古塞城和唐宋时期敦煌县的疆域、四至、绿洲范围、耕植面积、水利灌溉网络、诸山位置等,绘制出了敦煌塞城、唐宋时期敦煌十二乡位置及渠系分布示意图、五代沙州归义军辖境诸山位置关系图。李正宇有关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多被收入《敦煌史地新论》(新文丰出版公司**员怨愿年**)。

因材料所限,这一阶段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政治史的论著仍然不多。黄惠贤《〈常何墓碑〉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圆期****员怨愿年**)和郑必俊《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释》,分别利用《常何墓碑》保存的资料结合史籍证、补唐初政治史。黄文认为常何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地位并不像陈寅恪所说的那样重要,郑文则认为陈氏有关常何与玄武门之变的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黄永年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郭锋《敦煌本〈侯昌叶直谏表〉与晚唐懿、僖时期之政局》(《兰州大学学报》**员怨愿年 猿期**),结合史籍考察了“侯昌叶直谏表”的内容、上表经过、时间及侯昌叶的有关情况。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员怨愿年**)及相关系列论文,依据史籍中有关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的记载,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勾官进行勾检的实际记录,全面考察了唐代上自中央、下到地方的勾检制及其实行情况,填补了唐官制研究的一项空白。薄小莹、马小红亦曾对唐代勾

检制进行过讨论。孔祥星《唐代里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1期),依据敦煌吐鲁番文书结合文献记载考察了唐代里正的职责与作用,认为唐代里正是乡里基层政权的实际管理者。赵吕甫《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中国史研究》1983年4期),探讨了唐代乡的行政职能。

日本东洋文库组织的《敦煌吐鲁番经济资料丛刊》出版的第一种就是“法律文书”(1983年出版),对敦煌法律文书进行了细致的校理,并附有文书的图版。刘俊文有关唐代法律文献的系列论文涉及唐代律、律疏、令、令式表、格等方面。还编著了《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3年),辑录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律、律疏、令、格、式、令式表等法典和制敕、判、牒、案卷等法律档案共160件,并对各件文书都进行了考证、校补和笺释。他点校的《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亦充分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法制文书。高明士《从英藏吐蕃律断片论唐贞观捕亡律之存在问题》(《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对吐蕃律应为贞观捕亡律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并对史籍关于贞观律无捕亡、断狱两卷的记载作出了解说。楼劲《伯382号残卷所载公式令对于研究唐代政制的价值》,利用公式令探讨了唐代尚书省的内部结构及其演变。赵和平《敦煌写本S.461号性质初探》(《文献》1989年1期),认为该件是唐前期礼部据留司格拟定的公程式,形成于永徽至垂拱年间。王永兴对《开元水部式》做了录校和考释,并探讨了该件涉及的番役和造舟为梁问题。赵吕甫对《开元水部式》的年代提出不同看法。齐陈骏《有关遗产继承的几件敦煌遗书》(《敦煌学辑刊》1989年4期),利用敦煌文献中有关家庭遗产分配、纠纷的文书,考察了唐宋时期家庭遗产继承的原则。雷闻依据S.461号景云二年七月九日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对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的军事问题。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利用了相关的敦煌文书。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代军队衣装》(《敦煌学辑刊》1988年 1期),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记载探讨了唐代募兵的军衣名称和每个士兵的军衣消费量等问题。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与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9年 4期),依据敦煌吐鲁番有关文书,结合史籍记载,对唐前期交通通讯所用驿马、传马的异同及其管理措施进行了探讨。卢向前《伯希和盗劫莫高窟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考察了沙州的传马坊。

对经济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阶段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依据敦煌文献和传世史籍对我国古代的籍帐编制情况进行了考察,并对一大批经济文书做了精细的整理和校录,此书曾在一段时间内成为部分中国唐史研究者的资料来源。东洋文库组织的大型资料丛书《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丛刊》中之“户籍文书”,刊出了该类文书的图版和经过细致整理的释文。王永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年),介绍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户籍、差科簿及有关田制、徭役的文书,并结合史籍对文书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年,4-5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年),收录了敦煌文献中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文书和价值较高的历史文献 152件,分 10类。该书在编排上采取上图下文方式,每类分若干细目,按年次先后顺序排列。所收文书都包括定名和录文两项,部分文书附有注释。由于此书收录范围较广,不免在资料搜集、文字释录、文书定名、定性、分类、归类、编排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因其具有包容文书量大和附有图版、释文等优点,至今仍是史学工作者调查、利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重要参考书。此书还为敦煌文献研究者分类对社会经济文献做进

一步的精细录校奠定了基础。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均田制这一时期经历了由逐步深入到进行总结的阶段。这一阶段对唐代均田制的探讨是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进行。上一阶段争论的焦点是均田制实施与否,但争论的双方都把均田制理解为按田令的标准授受土地。主张均田制是“一纸空文”或“实际上并不存在”者的重要论据之一,就是敦煌户籍中各户已受田数字均与应受田数相差甚多,而已受田与未受田的比例各户又不一样。但他们未能对户籍上为什么会出现应受田、已受田、永业田、口分田等符合均田令规定的名目,且各户合应受田数与田令的规定基本相符作出解释,反对者则以此为重要论据,论证均田制确曾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并用受田不足来解释户籍上已受田和应受田之间的差额。这样的解释虽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并不圆满。所以,在这一阶段初期,林天蔚《敦煌户籍中所见唐代田制新探》(《珠海学报》**1984年 1期**)仍据敦煌户籍得出了均田制在唐代有名无实的结论。但另一些学者则试图通过重新认识田制的实质来对上述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及相关系列论文,从研究户籍法入手,探明均田制或均田令是封建国家颁行的有关各级官府和官民私人土地占有的法规。田令规定的受田数即敦煌户籍上的应受田数,是法律规定可以占田的最高限额,并非官府要实际授给的土地数;户籍上的已受田是民户现有土地的登记,其主要来源是继承祖业,请自官府无主地亦是来源之一;户籍上的永业、口分田的区分是为了便于根据田令审核民户土地的继承、转让是否合法,在所有权上并无区别,均为私田;田令关于民户土地收授的规定,并非按期收授所有民户的土地,收回的主要是户绝田、逃死户田等,授给低于本地请授田标准的民户。王永兴《论唐代均田制》(《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 4期**)及相关论著,也反对把均田制视作土地分配制度。他认为均田制是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对私田的

管理制度。这种管理表现为依据田令收退田、补欠田。均田制的目的是保证各等级各种人可以占有不等量的私有土地。宋、王二人对均田制性质的认识十分接近。王氏对应受田、已受田的解释亦与宋氏基本相同。如果依据宋、王二人对均田制的解说,户籍上已受田和应受田之间存在差额和比例不一的现象得到了合理解释,已不可能再作为否定均田制的论据。上述宋王关于均田制基本观点已为多数学者接受。但对此问题也还存在不同的理解。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及相关系列论文,认为均田制是一种全国土地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官僚、地主、百姓等臣民依照一定的标准和条件“均平”占有土地(通过国家授受的方式占有)的土地制度,均田制下的口分田、永业田具有国有和私有两重性质。他提出土地授受方式有簿籍授受、官田授受、户内通分、对共给授等,其中簿籍授受是运用最多、最广泛的方式。他所谓的簿籍授受就是依据田令的规定将民户的土地登记于户籍之上,并认为正是这种授受方式造成敦煌户籍上应受田和已受田数额差距不均等。按照武氏两重性质的观点,必须将簿籍授受视作行使或部分行使土地所有权。这种看法似未考虑到封建土地私有的特点。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及相关系列论文,认为从均田令的条文来看,均田制是一种国有土地制度。但一方面均田制下存在着永业、口分田之外的私田,另一方面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允许民户在一定条件下将永业田和口分田混通使用,且经常性的土地还授只是户内帐面调整,口分田亦可继承,与私田没有多少差别。这样,均田制实质上还是一种土地私有制。杨氏的解说虽自有其依据,但与宋王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其区别似源自杨氏仍将均田令理解为一种土地分配制度。朱雷《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1 辑,1982 年),利用文书证明在均田制实施过程中,民户的私田包括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均被



作为“已受”纳入均田制轨道。他还指出户与户之间的土地,每一“至”所毗邻相接的决非一户,但敦煌户籍的“四至”皆只书写一户,故而难以据之作出比较能反映现实关系的田地图。朱氏的论证对杨际平关于口分永业田之外有私田的说法极为不利。与此相关的是对四至中“自田”的解释,或认为是均田制以外的私田,或认为有的是均田以内的土地,有的是均田以外的私田,朱雷的文章对更加合理地解释自田亦有助益。金铎敏《八世纪初唐代农民土地所有研究》(《史从》**1985**年**1**期)利用户籍文书与其他资料说明当时可分的土地数量处于绝对不足的情况。均田制之外,齐陈骏《简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职田的资料》(《中国史研究》**1982**年**1**期),对有关职田的文书做了介绍和研究。姜伯勤《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论证该文书反映的是河西营田由兵屯到民营的转折。杨际平则认为该件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平民的贷粮册。赋役方面,宋家钰探讨了手实、户籍、计帐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上列《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及相关论文)。朴根七《再论唐前期的手实、计帐》(《魏晋隋唐史论集》**1982**年),试图通过分析手实、计帐、户籍之间的关系与性质来探讨唐前期籍帐制的意义;同作者之《唐代户籍制的运营原则与变化——以分析户籍类文书为中心》(《庆尚史学》**1982**年**1**期),通过敦煌、吐鲁番出土户籍类文书所记载的内容和形式,分析了唐前期户籍制的执行情况和弛缓过程。唐耕耦《唐代课户课口诸比例释疑》(《历史研究》**1982**年**3**期),利用敦煌户籍手实等资料对史籍有关课户课口记载存在的问题做了解说。王永兴《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4**年**1**期,中华书局**1984**年),全面考察了唐代的色役制,杨际平对其中一些问题有所补充。财政方面,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1983**年)及相关论文,利用

相关敦煌文书结合史籍探讨了财务勾检、户税、交采和帐历的形式与异同等唐前期财政史中的重要问题,以及唐后期财政机构的演变、格局、收支体系与收支特色等。马世长《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廩本钱》(《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4**年)、吴震《敦煌石室写本唐天宝初年“郡县公廩本钱簿”校注并跋》(《文史》**1984**年)分别考察了唐代公廩本钱。卢开万利用敦煌文书结合史籍论证唐前期的和采是具有强制性的变相赋税。杨际平、卢向前、王永增、赵文润等则主张唐前期和采基本上是一种不带强制性的交换关系。卢向前《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文书看唐前期和采的一些特点》(《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4**年),指出卢开万对文书的理解有误,结论不能服人。他认为和采具有双重性质,百姓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成为主动者。他还探讨了开元天宝时期和采的特点与弊端。王永兴依据敦煌文书对和采和交采做了区分,认为交采是高利贷。杨际平《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采会计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 **猿**期),认为交采是政府和采计划的一部分,并对付本取利的交采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张弓《唐朝仓廩制度初探》(中华书局 **1984**年),在讨论军仓和采与假贷、正仓的职能与出贷时,都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市场方面,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考》,考察了唐代行、市制度及奴婢马匹买卖的有关情况。卢向前《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4**年),探索了时估的制定与市估法的功能。

对敦煌契约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成为这一阶段社会经济文献方面的重要课题。日本东洋文库组织的《敦煌吐鲁番经济资料丛刊》,于**1984**年出版的第三种就是“契券文书”,包括文书的释文和图版。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4**年)及相关论文,对契约文书做了精细的录校和研究。陈国灿《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

考》(《敦煌学辑刊》**员愿源年 员期**)、《唐代的民间借贷》等论文,考出了一批借契的年代,并对民间借贷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唐耕耦《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敦煌学辑刊》**员愿缘年 圆期**、**员愿远年 员期**),对敦煌吐鲁番借贷文书的类别和内容、借贷双方的身份和借贷原因、利息率、违约处罚担保和高利贷后果,以及契约形式的变化等问题做了全面考察;《敦煌写本便物历初探》(《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缘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员愿园年**),考察了便物历所反映的高利贷的有关情况。高潮、刘斌《敦煌所出买卖契的研究》(《中国法学》**员愿员年 猿期**),从法学角度考察了敦煌买卖契约。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雇工契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圆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员愿苑年**),依据文书探讨了唐五代雇佣劳动的特点。李天石《唐宋时期典身性质的变化及其意义》(《历史研究》**员愿猿年 猿期**),利用敦煌文献中的典身契考察了唐末五代时期典身的特点。

朱雷《〈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辨疑》、《〈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破魔变〉诸篇辨》(《魏晋南北朝史资料》**员猿辑 员愿源年**)等系列论文,对敦煌变文做历史学考察,发掘出其中有关历史的资料,别开生面。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宗教史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由牧田谛亮和福井文雅任责任编辑的《講座敦煌·苑·敦煌と中国佛教》,对敦煌文献中的佛教典籍做了全面的介绍与解说。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学辑刊》**员愿愿年 员圆期**),依据敦煌文献及其它有关记载,全面考察了敦煌地区古代出现过的每座祠庙、道观和佛寺的基本情况,奠定了进一步研究敦煌宗教史的基础。杨富学《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湾文津出版社 **员愿远年**),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其它资料探讨了佛教在回鹘中的兴衰情况。荣新江考察了九、十世纪敦煌佛教的盛衰概况,并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归义军时期部分都僧

统的年代和事迹进行了考证(《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谢重光《吐蕃占领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考察了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僧官系统和僧官活动的世俗化倾向;《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2年),对沙州寺院的等级结构和寺院经济的经营内容、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在寺院经济研究方面,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 1996年)及相关系列论文,虽以研究敦煌寺户制的各种表现形态及其衰落演变为中心,实际考察的范围牵涉到敦煌佛教史的诸多方面。张弓《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兰州学刊》1998年第4期),对敦煌寺院牧羊人的身份进行了考察。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6年)及相关论文,对敦煌寺院入破历、常住什物历等会计文书做了缀合、复原和研究。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及相关系列论文,对前人关注不多的沙州僧尼的出家、受戒、生活状况、宗教活动与宗教收入进行了系统考察。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宗教篇”及相关论文,探讨了禅宗在敦煌的流传、律宗在敦煌的传承及敦煌佛教的中国大乘佛教特色等。方广锬《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5年)及相关论文,将敦煌文献中的资料与传世资料、金石资料结合起来,系统考察了汉文大藏经的形成、发展过程。并探讨了沙州从中原乞经的情况。兜木正亨编纂了《斯坦因、伯希和搜集敦煌法华经目录》。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 1993年),是国内第一部对敦煌写本坛经进行录校、注释的著作。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首次对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坛经》进行了录校。但两书的录文都不够完善。潘重规《敦煌坛经新书》(佛陀教育基金会 1998年),以影写的方式对《坛经》重新做了录校。邓文宽

《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如闻出版社 1987年),用敦煌学方法对《坛经》进行了整理。篠原寿雄和田中良昭任责任编辑的《講座敦煌·愿·敦煌仏典と禅》,对敦煌文献中的禅宗典籍做了介绍与研究。田中良昭《敦煌禅宗文献之研究》,亦对禅宗文献进行了探讨。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3年)及相关论文,对反映敦煌地区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间生活的《佛说十王经》进行了录校,并着重对该件涉及的地狱问题做了探讨。道教史方面,大渊忍尔出版了《敦煌道经——目录篇》和《敦煌道经——图录篇》。《講座敦煌·源·敦煌と中国道教》对敦煌文献中的道教文献做了解说与探讨。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宗教篇”及相关论文,讨论了敦煌的中国道教精神。刘屹《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经〉新探》(《唐研究》10卷 1995年),将十卷本现存的四个残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并探讨了《化胡经》的发展与李唐皇室的关系。摩尼教史方面,以林悟殊取得的成就最大。他有关这一课题的系列论文,对敦煌本汉文摩尼教残经进行了缀合、定名、定年和细致的校勘,并对摩尼教入华年代应在唐以前的说法做了充分的论证。他有关这一课题的中文论文大多被收入《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 1987年)和《古代摩尼教艺术》(淑馨出版社 1985年)两书中。杨富学、牛汝极《牟羽可汗与摩尼教》(《敦煌学辑刊》1987年 1期),探讨了摩尼教成为回鹘国教的过程。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敦煌吐鲁番学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9年),成功地考辨出敦煌白画中的持犬女神和持日月蛇蝎女神都是与祆教有关的粟特神祇。

社会史方面的研究在这一阶段拓宽了领域。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年),试图构建起以礼仪为主线的敦煌社会史框架;《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则利用敦煌文书深入考索了唐代礼乐的演变。有关姓望和氏族的文书因有助于

了解土族地主的衰亡过程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王仲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sup>①</sup>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等论文，录校并结合文献考释了一批有关姓望和氏族的文书。唐耕耦《敦煌四件唐写本姓望氏族谱（一）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sup>②</sup>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亦对一些姓望氏族谱做了录校，并据之探讨了郡姓的发展演变。王仲荦、唐耕耦、邓文宽、华林甫等都曾对北图位字 79 号文书进行过探讨，但对其性质、名称和年代的认识很不一致。邓文宽《敦煌文书位字七十九号——〈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辨证》（《中国史研究》1982 年 1 期），认为该件是一件原始奏抄的节本，其用途与唐初解决旧土族卖婚问题有关，是贞观年间“刊正姓氏”的真实记录。林立平在探讨唐代土族地主的衰亡时也曾利用敦煌谱书。一些学者开始分别对敦煌地区的郡望和大姓进行考察。荣新江在《敦煌卷子札记四则》（《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sup>③</sup>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中探讨了敦煌的望族“清河张氏”和“南阳张氏”的渊源、异同及其社会意义。邓文宽《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4 年），讨论了敦煌“南阳郡开国公”封爵和“南阳张氏”郡望的由来与相互关系。孙晓林《〈汉——十六国敦煌令狐氏述略〉》（《北京图书馆馆刊》1982 年 1 期）、《敦煌遗书中所见唐宋间令狐氏在敦煌的分布》（《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4 年）、《跋伯二一九八〈东都发愿文〉残卷》（《敦煌吐鲁番研究》<sup>④</sup>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等文，对敦煌的大姓之一令狐氏的兴衰之迹做了全面考察。孙修身考证了敦煌李姓的渊源及其世系。马德《敦煌李姓世系订误》（《敦煌研究》1984 年 1 期）又有所补充。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资料探讨唐代敦煌的家庭结构与人口结构也开始有人进行尝试。熊铁基《以敦煌资料证传统家庭》，认为敦煌文献中所反

映的家庭,基本上与中国古代传统家庭的特点一致。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 1998年),依据敦煌籍帐编制了缘起世纪敦煌家庭结构类型表,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家庭数量变化及其原因,考察了时人的平均寿命与家族的规模,还探讨了家庭的功能与家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郑学檬《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后期敦煌县人口结构试析》(《敦煌学辑刊》1989年 1期),指出当时存在男女比例、劳力与非劳力比例不合理的现象,并分析了当时人口增殖缓慢的原因。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年),亦探讨了沙州的家庭结构与人口结构。婚姻方面,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年),在整理、录校敦煌文献中有关婚姻文化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敦煌壁画中的相关资料探讨了唐宋时期沙州地区婚嫁、生育习俗。卢向前《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以上所列卢氏论文多被收入其《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利用敦煌户籍、手实及其它资料探讨了胡族婚姻形态对唐代百姓、氏族的影响。社会组织方面,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在全面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社邑文书做了细致的录校和研究。他们合作或分别撰写的系列论文对社邑文书做了细致的排年,并对社邑的组织、活动及其与寺院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还借助从这批文书中获得的认识,结合石刻文字、文献资料对汉至唐及唐以后社邑发展的脉络做了进一步考察。卢向前深入探讨了文书中的马社。郭锋、陆庆夫、郑炳林等也对社邑文书作过研究。生活习俗方面,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及相关系列论文,利用敦煌文书及其他材料,对唐代的衣、食、住、行和社会交往等做了系统考察。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及相关系列论文,对保存了许多社会生活和民俗资料的敦煌历法文献做了精细的录校和深入的研究。周一良、赵

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考证了敦煌书仪的源流、性质、类型和年代,并对书仪中保存的有关历史、社会生活、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资料做了深入的探讨。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2年)、《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年),则对各类书仪进行了细致的录校。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 1989年),以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为中心,探讨与“东西方贸易担当者”——粟特人有关的丝路实况,并考察了波斯通往敦煌吐鲁番的“白银之路”和敦煌吐鲁番通往印度的“香药之路”,以及曾在敦煌流行的波斯文化和天竺文化。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年)、《隋唐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年)等论著及相关论文,在探讨胡商、商品、物价、商镇、商路和丝路贸易商业制度等问题亦充分利用了敦煌吐鲁番文献。季羨林《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历史研究》1984年 1期),依据敦煌文献中之《西天五印度制糖法》结合其它文献探讨了甘蔗的种类和制糖方法问题。

历史典籍的整理方面。黄永武《敦煌古籍叙录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4年),在王重民原书基础上增加了有关文书图版和部分新的研究信息,其中历史典籍仍占有重要地位。康世昌《孔衍〈春秋后语〉试探》(《敦煌学》1981年第1辑 1981年)、《春秋后语辑校》(《敦煌学》1981年第1辑 1981年、1982年第2辑 1982年),探讨了《春秋后语》的体例特色、兴衰亡佚经过、注本与译本、辑本的概况等,并广泛搜集敦煌文献和其它文献中相关资料对其做了重新辑校。王恒杰《春秋后语辑考》(齐鲁书社 1982年),亦对敦煌本《春秋后语》进行了录校。李际宁《〈春秋后语〉拾遗》(《敦煌吐鲁番研究》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年),新考出一件北图收藏的《春秋后语》,并做了录校。许建平对《春秋后



语释文》做了进一步校证。林聪明《敦煌写本“周秦行记”校记》，对敦煌本《周秦行记》进行了录校。饶宗颐依据敦煌吐鲁番写本讨论了孙盛晋春秋及其流传情况。屈万里对敦煌本《史记·伯夷列传》做了校勘。郭锋《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成书年代诸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 1 期），考证了该件的作者、年代、特色，并对其文字作了录校和注释。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可以看出，二十世纪我国数代学者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第三阶段获得的研究成果的数量比前两个阶段明显增多，成果的质量也大为提高。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在归义军史和西北民族史、敦煌历史地理、敦煌社会史、有关均田制的研究及一些类别文书的分类整理和研究等方面也明显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自豪地说，我国史学工作者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 （四）

敦煌文献为历史学提供了一大批内容丰富的研究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其史料价值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以今天的认识水平观察，它至少在以下一些方面对历史学具有独特价值。

其一，它为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中古时期的一个地区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研究资料。与甲骨文和汉晋简牍等其他出土文献相比，敦煌文献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涉及的学科和方面较多。仅对历史学而言，就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诸多方面。其次，每件文献所包含的内容也相对比较丰富。再次，它涉及的时间较长，自 ~~缘~~ 世纪初至 ~~宋~~ 世纪初将近 ~~远~~ 个世纪。即使文献年代比较集中的 ~~愿~~ 世纪中至 ~~宋~~ 世纪初，亦达 ~~圆~~ 多年。最后，全部文献

都与敦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或联系。就世界范围来看,具备以上条件的出土文献似也为数不多。如果我们依据这些资料对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的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作全方位的考察,其成果将为学术界认识中古社会的具体面貌提供一个模型或参照系。这当然有助于推进人们对中古时期社会的进一步认识。显然,对历史学而言,解剖敦煌这样一个麻雀,其意义会超出敦煌地区。而敦煌文献为解剖这个麻雀提供了必要条件。

本文的简略回顾表明,数十年来,我国学者在这一方面已做了许多重要准备工作。如对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对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等都已经相当深入,并有总结性论著问世。有的相关类别文书如碑铭赞类文书和契券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也已达到较高水平。从第三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有的类别的文书已有两种甚至三四种录校本(如邈真赞、地理文书等),有的专题也已有两三种总结性著作(如有关均田制的研究等),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已相当深入,近期再投入较大力量也不易取得大的进展,似可暂缓投入。但从整体上看,研究比较深入,比较全面的专题还不够多,许多方面有待加强,不少方面有待展开。如归义军时期的经济史、佛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都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有些方面甚至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以后才能进行总结。如敦煌佛教史需要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完成“敦煌佛寺志”、“敦煌的佛教与社会”等系列专题研究以后,才有可能在这方面进行总结性研究。敦煌社会史也要在完成“敦煌氏族志”等系列专题研究后,才有可能进行总结性研究。至于敦煌文化史,我们以前做的工作就更有限,大量的工作有待展开。可见,在二十一世纪,专题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因为只有在深入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有分量的专史,而各方面专史的完成又是全面综合研究的必要准备工作。在从事专题研究过程中,需要完成大量艰苦的微观考察。不少工作表面看来十分细碎甚

至繁琐,无关大局,如过去我们对归义军政治史许多小问题的探索就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但这些微观探索又是我们全面、深入、系统地考察敦煌地区必不可少的工作。当我们将这些具体的探讨整合为对整个敦煌地区的微观透视时,就会发现在敦煌文献研究领域,微观考察的意义不同一般。

当然,要完成对敦煌地区的全方位考察,仅靠专题研究还远远不够。必须同时积极开展综合研究与宏观研究。在第一、二阶段,我国学者因受到资料的限制,往往只能就所见少量文书或一件文书进行阐发,研究是点式的,很难做专题或综合研究。到第三阶段,我们能见到的材料日益增多,对敦煌文献做分类整理或专题研究的学者也逐渐增多。但对各类文书、各个专题、各个学科进行的综合研究还很薄弱,将敦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工作也有待展开。就目前而言,首先应注意从整体上把握敦煌文献。敦煌文献虽然分属各个学科,可以分为许多类别,但同时又是一个整体,各类文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人们利用有关 10 世纪的一大批文书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若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时期的各类文书打通,相信对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了解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其它如对历史资料与文学史资料等各学科之间联系的研究,汉文历史文献与藏文历史文献等各文种之间联系的研究,也都是具有很大潜力的研究领域。在二十一世纪,当各个专题和综合研究都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撰写贯通中古时期敦煌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领域的“《敦煌中古史》”了。

其二,敦煌文献为我们进一步研究 9 世纪中叶至 10 世纪初西北地区的民族史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9 世纪中叶至 10 世纪,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发生大变动的时期。但传世史籍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少,很难据之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一批反映这一时期民族情况的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公私文书,为

我们探讨西北地区民族变迁、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与相互间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本文的回顾表明,我国学者在利用这些资料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第三阶段,我们不仅在利用敦煌汉文文献研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对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有较大进步。同时应该承认,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与国外同行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在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研究方面,一些文种与国外的研究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取得的成果仍以第二次译释居多,能直接解读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的学者亦嫌太少。所以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字文书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藏文文献,数量很大,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时,应提倡在全面搜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将敦煌汉文文献、各民族文种文献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以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之所以分歧较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些研究者有时仅据部分材料就匆忙做出了结论。

其三,敦煌文献还为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材料。古代的敦煌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所以,敦煌文献不仅对了解敦煌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许多材料还反映了中原地区的一般情况。我国学者在利用这些材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均田制即属中国古代史的重大问题,但在敦煌文献发现以前,对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始终无法深入。我国学者主要依据对敦煌文献中有关材料的具体探讨,才为均田制实施与否的争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并对均田制的实质形成了新的认识。又如本文所述我国学者对敦煌法律文书的持续探索,不仅解决了许多有关唐律和唐代历史的具体问题,还使学术界对久已亡佚的唐代令、格、式等法律文献的形式、内容、性质有了具体而形象的了解,并为令、格、式的辑佚提供了样式。再如本文所述我国学者对唐代勾官的研究,也是在具体探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

有关勾官进行勾检的记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的整体认识。对敦煌文献中反映中原地区一般情况的材料作微观考察,容易使人产生细碎繁琐的感觉,但从中获得的知识不仅有助于认识同期中原地区的情况,有时对认识某一事物或社会现象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发展脉络亦有助益。如前述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社邑发展情况的探讨和对中国古代书仪源流的考察,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从相关敦煌文献研究中获得的认识。

我国学者在利用敦煌文献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问题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如有关佛教史和社会史方面的资料就利用得很不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提倡将敦煌文献放到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在对敦煌文献和传世文献、石刻文字中的相关资料作彻底调查的基础上,将敦煌文献中有关某一专题的资料放到唐宋时期甚至中古时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一方面虽已有学者进行尝试,但尚需大大加强。

其四,古代的敦煌是中国和世界接触的窗口。所以,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反映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资料。我国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探索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波斯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探索丝绸之路的贸易等课题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这方面材料相比,还有许多工作可做。特别是在唐代,敦煌汇聚了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文化,这些在敦煌文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站在中古时期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发掘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项重大课题。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学者在二十世纪虽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和有待开展的工作更多。所以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取得更大的成绩。回顾二十世纪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历程,似有以下一些因素对研究的进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较大影响。

第一是资料的限制。对我国一般史学工作者而言,在前两个阶段能见到的敦煌文献数量有限。虽然在第二阶段我国已有英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由于种种原因,能直接利用的人很少。多数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仍主要依靠少量很不完善的敦煌文献录校本。到第三阶段,我国学者终于可在国内看到英、法和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但有关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和影印图集实际上只有少数高校和科研单位有条件购置,对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查阅敦煌文献仍有诸多不便。另一方面,由于敦煌文献多为写本,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唐宋时期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还有不少写本使用河西方音。这就要求阅读某件文书的学者不仅要掌握该文书有关学科的专门知识,还应当对敦煌的历史、敦煌俗字及河西方音等整理敦煌文献所需的专门知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否则,即使有条件直接查阅敦煌文献,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遇到重重困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得拥有缩微胶卷和图集的单位,其资料使用率并不高,查阅者多为专门或主要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一般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仍主要依靠录校本。可见,资料方面的限制,一直是影响我国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原因。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应是二十一世纪的首要任务。因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敦煌文献图版是正确释录文字的前提,所以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敦煌文献图版的编辑、出版步伐,力争在二十一世纪初叶完成这项工作。同时加快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录校工作,这既包括分类对敦煌文献进行录校,也包括按号对敦煌文献作全面录校。目前,分类录校正在有计划地进行,全面录校的工程也已启动。这项工作是将敦煌文献推向学术界的基础工程,是为史学工作者解除资料方面限制的关键步骤,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争取在二十一世纪的前 10 年完成此项工作。

第二是史学观念的影响。在第一阶段前一时期,用传统方法治

学的罗振玉等人对历史典籍和有关政治史的资料比较感兴趣。后一时期陶希圣利用《食货》出版《唐户籍簿丛辑》，显然是其社会史史观使然。第二阶段我国学者对社会经济资料关注较多，也明显受到用马克思主义史观研究社会经济史风气的影响。在第三阶段，随着各种新的史学观念和新方法的流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各方面问题得以全面展开，其中尤以社会史观念的重新流行影响最为显著。数十年的敦煌文献研究史表明，新的史学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发掘敦煌文献的史料信息，应该大力提倡。

第三是对利用敦煌文献意义的认识。1944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这里，陈先生从学术发展史的高度阐述了参与研究敦煌文献的重要意义。数十年来，陈先生的论述激励几代学人积极投身整理、研究、利用敦煌文献的行列。今天，出土近百年的敦煌文献似已无资格被称为新材料了，但与敦煌文献所蕴藏的丰富史料信息相比，史学界对它了解和利用仍很不够。如在历史典籍方面，建国后出版的标点本史籍不只一种未能吸收敦煌学界整理和研究相关敦煌写本的成果。再以唐史研究而言，不少学者在搜集资料时可以遍读与唐代有关的文献，却很少有人将敦煌文献列入自己的阅读范围。结果是其它方面的有关材料几乎被网罗殆尽，惟独遗漏了敦煌文献中的相关材料。这是有的非常优秀的著作存在美中不足的原因之一。就目前的条件而言，一般史学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献虽说还存在不少困难，但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些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阻碍史学工作者了解、

利用敦煌文献的主要是客观条件的话,现在则是主观因素起的作用愈来愈大了。所以我们应进一步增强利用敦煌文献的意识。对一般历史工作者来说,至少应注意了解敦煌文献的研究情况,及时吸收相关的研究成果。对唐五代史学工作者而言,似应将敦煌文献列为必读史料。因为敦煌文献的大部分成于唐五代宋初期间,对其进行系统阅读不仅可搜集到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资料,还可加深对这一阶段社会的了解和理解。而敦煌文献研究者则应积极为历史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既包括加快敦煌文献图版的编辑出版步伐,更包括加快敦煌文献的整理录校,为史学工作者提供更多的经过整理的录校本,力争早日出版全部录校本。但学术界和出版界都应更加重视敦煌文献录校本的质量。近年出版的一些录校本因质量不佳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录校者缺乏整理敦煌文献的专门知识。所以,对敦煌文献进行分类或全面录校的工作最好由敦煌文献研究者去做。

第四是要加强对研究信息的调查。在从事一项课题研究时,对有关研究信息进行彻底调查,本是学术研究的常识。但因对敦煌文献研究信息的调查具有特殊的困难,故有特别强调的必要。对一般历史课题研究信息的调查,可主要通过查阅书目和论文索引来解决;但对一件敦煌文献研究信息的检索,光靠查阅书目和论文索引却不能完全解决。因为对每一号敦煌文书的研究情况,多数不能从书名和论文标题中反映出来。也就是说,要全面了解每一号敦煌文书的研究情况,必须通览全部研究敦煌文献的专著和论文。在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一些论著中,就已出现对研究信息调查不够的现象。二十世纪~~八~~四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全面展开,每年发表的论文和专著都很多,要想迅速摸清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文书的研究情况确非易事。所以,在第三阶段中,对研究信息调查不彻底的现象日益严重,重复劳动有增多的趋向。有的杂志的相关专号和少量



论著,基本未对数十年的研究情况进行调查,出产了一些比目前已达到的学术水平低得多的过时产品。这提醒利用敦煌文献的史学工作者,一定要十分重视对以往研究信息的调查。

最后,应该重视和加强利用新的研究手段、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比如在研究中充分发挥电脑这种新科技手段的功用,就是值得下大力量进行开发的课题。像用扫描手段将文书图像制成电子图书,编辑敦煌文献录校本电子图书,都会给史学工作者阅读、利用敦煌文献带来更多的方便。就现在的技术水平而言,完成上述工作已不存在任何问题,但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展开。在敦煌文学领域,已有人尝试利用电脑研究王梵志诗,取得了初步成果,为我们史学工作者做出了榜样。在新方法方面,已有学者尝试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敦煌社会史资料,并取得了初步成果。新方法的运用,有利于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发掘敦煌文献的史料信息,值得大力提倡。

## 六、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研究述评

(员怨愿—圆园园苑)

**摇摇**社邑(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它源远流长,自先秦至明清,在社会生活中始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传世文献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少,且很零散,使人难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六万多件古代文献中,保存了 **源园**多件社邑(主要是私社)文书,这批内容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为学术界对唐五代宋初的社邑,特别是私社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和细致的描述提供了可能,对这批文书的研究还使人们对汉至唐及唐以后社邑发展的脉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敦煌文书的发现使中国古代社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可以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敦煌社邑文书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在 **员怨源**年以前,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主要是国外学者。

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是此项课题研究的开拓者。早在 **员怨愿**年,他就发表了《关于唐代的社邑》(载《史林》第 **圆**卷第 **圆**猿源 **员怨愿**年 **源—源**月)一文,这是国内外最早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国古代社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那波先生首先对我国自先秦至明清从官府到

民间的春秋二社祭祀活动进行了考察。而后依据敦煌文献并结合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指出在中晚唐五代时期在中国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社邑。

第一种是以佛教信仰为中心,由在家的佛教信徒组成的佛教社团。他利用敦煌文献中的《春秋座局席社司转帖》和《建福社司转帖》说明南北朝时期广为流行的以从事造像活动为中心的佛教社团在中、晚唐五代时期大量存在。但其名称已由邑义、邑会等改称社邑、邑社等;其活动内容已由造像变为以支持寺院的俗讲为主。这就向日本学者山崎宏等所主张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社团入唐以后逐渐衰落、唐后期至宋初完全消失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第二种是从第一种派生出来的社邑,但两种社邑又存在根本区别。佛教社团以佛教信仰为纽带,以从事佛教活动为主,第二种社邑则从共同出钱崇佛造像发展为平时成员间的互助活动,从单纯组织每年二次的祭社活动发展为平时成员间互相教育,这就使它成为一种与佛教完全无关的由百姓自愿结成的民间互助团体。对这种社邑的论述,是那波此文的核心。他利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社条、社状,社历、社文、社司转帖等大量文书和文献资料说明这类社所从事的主要活动是丧葬互助、社人远行与回归的慰劳,以及提高成员品德修养,加强成员间的友谊,并在祭社时杀生宴乐等。总之,这类私社虽是从佛教社团派生出来的,但从立社宗旨到活动内容都与佛教无关,甚至加入这种私社的僧人,其身份也不是佛教信徒,而是作为互助团体的一员。这种带有近世风尚的私社在中、晚唐五代时期流行于整个中国,到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三种社邑兼具第一、二种社的特点,既从事祭社、互助活动,又从事奉佛活动,但它仍是由佛教信徒组成的组织。

1932年,那波利贞先生又发表了《关于按照佛教信仰组织起来的中晚唐五代时期的社邑》(载《史林》国原卷猿源~~1932~~年苑至~~1932~~国

月)。这篇文章的重点是研究前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三种社邑中的第一种,他利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社条和在社邑从事设斋活动时念诵的社斋文,以及社邑的修窟、造窟、素画等功德文,进一步论证原来南北朝的佛教社团在中、晚唐时期仍然大量存在,不过其名称已由义邑、邑会等改为社邑、邑社,其首领由邑师、邑主、邑长、邑维那等改为社僧、社长、社官、社老、虞候,其成员名称由邑义、法义、邑人、邑子改称社人、社子、社户等等。名称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团体的实质未变。

那波先生还进一步对这种佛教社团与寺院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指出这类社邑通常是从属于某一寺院,接受寺院的指导和经济援助,同时它们又是寺院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劳动力的来源之一。他还依据敦煌文献中的有关材料推算出在一所寺院控制下的社人达二、三百人之多。那波先生指出这类以佛教信仰为纽带的社邑的活动包括:帮助寺院举行正、五、九月的三次大斋会;支援寺院的俗讲;帮助寺院正、二、十月的燃灯供佛活动。同时,他们自己还从事修窟、造窟、印沙佛等佛教活动。

那波利贞的这两篇著名论文对中国古代社邑乃至整个唐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在这两篇长文中,那波先生刊布了大量的敦煌文献,仅有关社邑的文书即达**近**种之多,其中包括社条、社状牒、社历、社文、社司转帖等,其内容涉及到了目前我们所知的有关社邑的各类文书。这就使海内外学者得以对这类“杂文书”及其价值开始有所了解。

其次,那波先生并没有局限于对某一篇文书的个案研究,而是力图利用一类文书来考察这一历史现象的发展趋势和变化规律。他利用这种方法取得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直至二十世纪**80**年代初,它仍是我们进一步工作的起点。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对三种不同类

型社邑的划分,在今天看来仍为不刊之论,他对佛教社团与寺院关系的论述对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也有借鉴意义。

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那波先生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首先是从文献学角度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工作做得不够。在其引用的社邑文书中,在释文、定性、定年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作者虽然搜集了较多的有关社邑的文书,但仍有一批重要的社文书(特别是保存在英藏敦煌文献中的)没有接触到,就是已接触到的文书,也未能进行分类整理,这使他的研究受到了限制。比如那波先生认为是社邑通知社人支持寺院俗讲的《春秋座局席社司转帖》,其实是通知社人参加一项与佛教无关的活动。作者由于对这类文书缺乏过细的整理和研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其次,那波先生虽在文献与文书的互证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对文献资料的发掘还很不够,这就使他的文章推论较多,其中不免偏颇甚至错误,比如他认为作为互助团体的社邑源于佛教社团,实际上,私社早在汉代即已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至唐代达到其兴盛阶段,它比佛教结社的出现要早得多。又比如佛教结社的名称自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的变化,那波先生虽指出了这种现象,但也未能利用文献材料对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它所反映出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考察。

最后,作者虽对佛教社团与寺院的关系有所论述,却未能对这种关系的实质进行分析。

继那波利贞之后,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于1957年发表了《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中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在这部书中,他用一节对自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的佛教结社作了考察。谢和耐先生指出:从五世纪末到唐初,在中国北方流行的佛教结社称为“义邑”、“邑会”等,自七世纪中叶,出现了被称为社的佛教团体,到了隋代,“邑”和“社”已成为同义语。中国式的民间团

体——从事春秋二社的祭祀活动的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佛教的“社”。“义邑”、“邑会”等佛教结社和敦煌文献中记载的“社”、“社邑”，尽管在组织、活动内容上都有区别，但它们都从事佛教活动。他认为那波利贞把敦煌的社区分为与佛教无关的民间互助团体和只从事佛教活动的宗教团体没有意义，因为敦煌所有社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都从事互助和崇佛两方面的活动。

谢和耐还对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与敦煌社邑作了比较。指出这些宗教结社都是以结义的方式来维系成员。他们常常是在出家人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且都有自己的佛教法师，这就是南北朝佛教结社中的邑师和敦煌社邑中的僧尼。这些社内的僧人不但为社内成员说法，还为社带来了圣性，且使社的佛教活动得到了加强。但这两个时期的社邑也有区别。即南北朝时期的佛社成员在从事佛教活动时，出资多少取决于个人信仰程度和财产的多寡，其组织也较松散；敦煌社邑成员出资多少则是由社条规定的，违者受罚，这时的布施已不是自发的了。而且敦煌社邑在许多方面具有中国传统的以从事春秋二社祭祀为主要活动的社的特点，他们在从事斋会、行像、转经、燃灯等佛教活动的同时也从事丧葬互助、远行、回归的慰劳等活动。这些佛教结社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他们提供的经济援助，为一些地区的僧人提供了生存条件。

谢和耐先生对社邑的研究在一些方面比那波利贞有所前进，如他的社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佛教结社的观点就极富启发性，为弄清楚从“邑”、“社”有别到“邑”、“社”不分的历史现象提供了线索，但由于他不同意那波利贞关于存在三种类型社邑的正确观点，使得他有关唐五代时期社邑的整体论述显得过于笼统而不够准确，他把敦煌社邑中的僧尼都看作是社邑的佛教法师也与事实不符。

1979年，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发表了《敦煌出土“社”文书研究》（载《东方学报》京都 33）。这是继那波利贞之后日本学者的又一篇

有关社邑文书的重要论文。竺沙雅章先生依据照片对那波利贞利用较少的英藏敦煌文献中的社邑文书进行了全面清理,并利用那波利贞刊布的藏于巴黎的社文书,对社文书中的社司转帖和社条分别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在对文书的形态、性质、作用的探讨,以及文字的释录、年代的考证等方面都比那波利贞前进了一大步。对那波利贞注意不多的作为文样、习字或原件抄件、草稿等社文书的性质、用途也作了论述,并与实用文书作了比较。在此基础上,他对社邑的活动与组织情况重新作了探讨。指出社邑的互助活动以丧葬互助最为重要,并对丧葬互助的具体过程进行了考察。关于社邑的首领,他纠正了那波利贞的一些错误,补充了一些名目。他还考察了社邑成员的身份,并指出社邑虽为互助组织,但由于活动较多,也成为社邑成员一项不轻的负担,致使一些贫穷社人因此而退社。

总之,竺沙雅章先生在文书整理以及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如丧葬互助、社邑成员的负担等都比以往的研究者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他没有把社文书放在古代社邑发展史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关于社邑的分类又持与谢和耐相同的观点,故他的研究对社邑的总体把握上没有超过那波利贞。

二十世纪 ~~五~~ 年代以后,对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整理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大量敦煌文献的刊布,人们有可能对社邑文书进行全面搜集,系统整理。所以,这一阶段对社邑文书作文献学的整理成为一项重要工作。

最早开展这项工作的是唐耕耦和陆宏基先生。~~一九五~~ 年,唐耕耦、陆宏基编撰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问世,这是一部带有影印原件和释文的资料集。该书的第五部分是社邑文书,其中收录立社条 ~~五~~ 件,请求入社退社状 ~~五~~ 件,社司牒状及处分 ~~五~~ 件,各种转帖 ~~五~~ 件,纳赠历 ~~五~~ 件,收支帐与凭据 ~~五~~ 件,其它 ~~五~~ 件,共计 ~~五~~ 件。这在当时是国内外对社邑文书的一次最大规模、最细致的整理

工作,其释文比那波利贞、竺沙雅章等的释文更接近文书原貌。他们的工作为学术界利用与研究这类文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令人遗憾的是,该书所收的社文书远非全部,还不足目前我们所知的社文书的二分之一,对已收入的部分,文书情况也未作介绍,多数年代未作考订,在释文方面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对社邑文书的整理工作还远未完成。

与唐耕耦等同时开始搜集、整理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还有日本的土肥义和与石田勇作,笔者也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与宁可师合作从事敦煌社邑文书整理和研究。

我与宁可师合作的整理成果《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已于198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有以下三个特点值得称道。一是齐全,共收集1300件,比唐耕耦等的多一倍以上。这个数字虽比我们现知的社邑文书还差一些,但所遗漏的绝大部分是后公布的,当时已公布的敦煌文献中的社邑文书几乎全部收录了。为了搜集社邑文书,我们不仅一次地研读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一般学者主要是依据目录)。二是释文准确,所有文书的释文都经过反复查核。而且北图、英图和法图的大部分查核过原件。许多图版或缩微胶片、模糊不清的文书或朱笔都得到了尽可能的处理。三是整理与研究结合。在整理敦煌社邑文书过程中,我们陆续发表了有关社邑的系列论文。特别是对社邑文书作了细致的排年工作(主要由笔者完成)。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新考出了一百多件文书的年代。如所周知,确定史料的年代是历史学的基础工作和从事研究的前提。所以,笔者的排年工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社邑文书奠定了基础。

土肥义和和石田勇作的整理成果《敦煌社邑文书集》(《敦煌学》1987年第1期)虽然书上标明的出版时间分别为1985年和1986年,但实际出书应该在公元1989



年以后(参看孟宪实相关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5 页)。这本资料集的主要优点是同时印行了文书的图版(月)和释文(粤),图版相对比较清晰,便于使用者查对。其二是附有英文的导言、凡例、叙录和目录,便于英语世界的学者使用。但此资料集所收集的社邑文书不全,尤其是“社文”,遗漏较多。同时,还收录了一批如《当寺转帖》、《官斋历》等与社邑无关的文书。

在社邑文书的研究方面,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后发表的论文有几十篇。

1980 年,日本学者编纂的《讲座敦煌·圆·敦煌的历史》出版,在由土肥义和先生撰写的第五章第五节中,对敦煌文献与石窟题记、发愿文中有关归义军时期社邑修窟、建窟、造龕、修佛堂、塑像等情况进行了考察。在同年晚些时候出版的《讲座敦煌·猿·敦煌的社会》第三章中,由长泽和俊先生撰写的第三节也谈到了敦煌平民生活与社的关系,但只是依据那波利贞、竺沙雅章(主要是后者)的研究成果对社邑的组织、活动等做了简单的介绍。

郭锋在 1982 年发表的《敦煌的“社”及其活动》(《敦煌学辑刊》第 1 期),是我国学者专门研究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第一篇文章。这篇论文首次向我国学界介绍了敦煌民间结社的情况,其中关于敦煌社邑渊源和唐五代社邑特征的论述比外国学者有所前进。但是,与当时大陆敦煌学处于重新起步的阶段相关,作者在文书的整理方面显得不够细致,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注意不够。

胡同庆《从敦煌结社探讨人的群体性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敦煌研究》1980 年 1 期),试图从敦煌的生存环境这样一个新的角度解释敦煌社邑长期存在的原因;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85 年 1 期),则试图从敦煌家庭变迁的角度解释敦煌私社盛行的原因;但以上两文均忽略了唐五代时期以经

济和生活互助为主要活动的私社在全国其它地区也很盛行的历史背景。

笔者和宁可师在整理敦煌社邑文书的过程中,也联名或分别独自署名发表过二十多篇相关论文,主要涉及以下一些方面。一是考证文书的年代(如郝春文《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一)、(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sup>员怨缘年</sup>源期、缘期等);二是探索敦煌社邑的一些重要活动,如丧葬互助活动,春秋座局席等(如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首都师范大学学报》<sup>员怨缘年</sup>远期;郝春文《敦煌遗书中的“春秋座局席”考》,《北京师范学院学报》<sup>员愿怨年</sup>源期等);三是探讨了中古时期社邑与寺院的关系(如郝春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sup>员怨园年</sup>员期;《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中国史研究》<sup>员怨怨年</sup>圆期等);四是试图解释古代社邑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原因(如宁可《述“社邑”》,《北京师范学院学报》<sup>员愿怨年</sup>员期等)。近年,笔者试图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古时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从冲突到兼容——中古时期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普门学报》第圆期)。

敦煌文献中保存一些关于女人结社的材料,而北朝至隋唐间的石刻资料中也保存了一些相关记载。笔者据之写成《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于<sup>员怨园年</sup>与宁可师联名发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sup>员怨园年</sup>第缘期)。此文主要讨论女人结社流行时代、性质、活动内容及其演变,其中使用的材料引起妇女史研究者的注意,在相关著作中得到引用。黄霞《北图藏敦煌“女人社”规约一件》(《文献》<sup>员怨怨年</sup>源期),对国图收藏的一件女人社社条做了介绍。杨森《晚唐五代两件〈女人社〉文书札记》(《敦煌研究》<sup>员愿怨年</sup>员期),新意不多。林艳枝《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女人结社》(《中国文化月刊》<sup>圆猿期</sup>,<sup>圆园园年</sup>远月),所引用的材料均在此前发表的论文范围之内,对材料解说亦无新的建树。余欣《唐宋敦煌妇女结社研究——以一件

女人社社条文书考释为中心》(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 112 号, 1980 年), 重点对社条中涉及的“走桥”风俗进行了探讨, 别具一格。孟宪实《试论敦煌的妇女结社》(《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 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81-189 页), 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了妇女结社的社会功能。

孟宪实利用社会史方法重新解读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文章近年接连发表了数篇。除上举关于女人结社之文, 尚有:《敦煌社邑的分布》(载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年)、《论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的组织形态》(《敦煌研究》1994 年第 1 期)、《唐宋时期敦煌的官人结社——公私对立说时代的别样行为》(载刘泽华主编《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 第 151-154 页)、《唐宋之际敦煌的民间结社与社会秩序》, (《唐研究》第十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论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的社条》(《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这些论文都能在前人搜集的材料的基础上, 从新的角度对材料加以解说。

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后, 国外学者发表的有关社邑研究论文有: 土肥义和《唐・宋間の“社”の組織形態に関する一考察》(《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眾》, 汲古书院 1988 年), 重新概括描述了唐宋间社邑组织形态的概况。石田勇作《敦煌“社文书”研究序説——轉帖を中心として——》(《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眾》), 是“藏文社邑文书”书英文解说的日文版, 重点对社司转帖做了介绍。高田时雄《藏文社邑文书二三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最值得注意, 该文通过藏文社邑文书提出了敦煌汉族藏化的重要问题。

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学术界在对敦煌社邑文书和中古社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资料整理方面,基本任务已经完成,虽然我们还可以从新公布的敦煌文献中发现新的社邑文书,或者发现一些现存整理本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都只能属于修修补补的工作了。但在研究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比如将敦煌社邑文书与传世文献、石刻资料融会贯通,撰写出贯穿古今的中国古代社邑发展史,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此外,我们还可以用新的方法或从新的视角来对这批文书进行深层次解读。

## 七、关于唐史研究者与敦煌文献研究者“分流”的问题

摇摇员愿年 员月初,我受命给“北京中青年唐史学者联谊会”成员介绍在兰州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会议情况,发言中谈到近年在敦煌文献研究者和唐史研究者之间产生了分流的趋向,指出从长远看,这种趋向对唐史和敦煌学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的这一看法在与会者中引起积极反响,同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现遵柴剑虹先生之嘱,将我极不成熟的想法整理成文,以供关心这一问题的同仁讨论。

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唐史研究者中,多数人是主要利用传世文献研究唐史,也有一些人主要从事唐五代时期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近年,主要从事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的这一部分人,其工作内容和性质日益向文献学的方向发展。他们所整理和研究的虽仍是唐代的文献,但这类成果已往往不被视为唐史的研究成果。而另一部分人则普遍对敦煌文献重视不够,很少有人将其列为必读的史料。这就是我所说的唐史研究者与敦煌文献研究者分流的趋向。

上述分流趋向的出现既是敦煌文献研究深化的结果,又是一定学术背景的产物。在研究敦煌文献的早期,人们所能接触的敦煌文

献很少,无法据之进行专题研究;同时,整理、录校敦煌文献的方法尚在摸索之中,经验尚待积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对文书内容的理解和利用,对文书文字的释录要求并不严格。研究者只需具备某一学科的专门知识,就能对属于该学科范围的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我们的长辈、前辈学者大多是在具有丰厚的唐史学养以后再来阅读、整理、利用、研究敦煌文献。对于他们而言,敦煌文献不过是研究唐五代历史应该阅读的史料,并非专门研究对象。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虽然参与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人不少,但却没有专门的敦煌文献研究者。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整理、录校敦煌文献的方法日趋严密、成熟,学术界对释录敦煌文献文字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此时,整理、录校敦煌文献的学者不仅要掌握某一学科的专门知识,还应当对敦煌的历史、敦煌俗字及河西方言等整理敦煌文献所需的专门知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否则,就难免在文字释录方面留下遗憾。另一方面,“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是在本科、研究生阶段即开始对某一个点进行研究,并以一点为基础直接进入专题研究领域,而后就长期从事专题研究。就敦煌文献的研究而言,随着各国收藏品的陆续公布,也具备了对其进行专题研究的可能性。于是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唐史研究者中,出现了一些从研究生时代起就专门从事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学者。

上述现象的出现有其积极的一面。主要是有利于快出人才,快出成果。从“文革”结束算起,仅用了十多年时间,一批中青年学者很快成长起来。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在某一专题、某一领域取得显著成就。这批中青年学者的出现,改变了敦煌学界和唐史学界学术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则不断将敦煌学和唐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但分流的局限也很明显。“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与其长辈、前辈相比,学术面都比较窄,缺乏宏观学术眼光,其成果虽都有一定深度,但厚重不足。主要从事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唐史的学养远不如其长辈和前辈,也不及专攻唐史的同辈。他们虽然能够熟练地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和录校,但由于与文献相关时代的知识不足,在将敦煌文献放到唐五代甚至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时,时感力不从心。不能充分挖掘这些经过整理的史料所蕴涵的学术信息。这迫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向文献学的方向发展。主要从事唐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由于长期局限于一个专题或领域之内,对于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整个唐代甚至中古时期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因而对有助于全面了解、理解唐五代社会的敦煌文献兴趣不大。一般只关心敦煌文献中有无自己所从事的课题的相关资料,而对将敦煌文献作为史料来进行通读则缺乏内在动力和热情。

敦煌文献已发现将近一百年了,我们对它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总体上看,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说:“已经解决的问题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之间的比例,尚不能尽如人意。在数量上后者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前者。因此,全世界的同行们万不能高枕无忧,稍存懈怠之心”<sup>①</sup>。因为敦煌文献绝大部分是唐五代时期的史料,所以,如果没有中青年唐史研究者的积极参与,光靠少数敦煌文献研究者,会有大量史料得不到充分利用,会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这当然不利于敦煌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中青年唐史研究者不积极研读、利用包括大量唐五代时期原始资料的敦煌文献,也不利于唐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所以,为了敦煌学和唐史研究的健康发展,中青年唐史研究者和敦煌文献研究者应共同努力,相互靠拢,扭转刚刚出现不久的分流

① 季羨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序》,《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年,第 14—15 页。

趋向。

对于中青年唐史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增强预流意识。早在五十多年前,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就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半个多世纪以来,陈寅恪先生的这段名言激励着许多学者取用敦煌文献“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sup>①</sup>。由于敦煌文献分散在各国,且长期没有刊布,所以我们的前辈、长辈预流的最大困扰是见不到敦煌文献。现在的条件完全不同了。一方面是经过整理的敦煌文献录校本越来越多,直接阅读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和图版也已比较容易,因而,中青年学者预流的主要障碍已不是客观条件,而是主观因素了。我想,中青年唐史研究者起码应将与历史有关的敦煌文献录校本列为必读史料,及时吸收其中的成果。当然,最好是能有计划地像读《全唐文》那样将敦煌文献通读一遍。一般地阅读、利用敦煌文献和专门整理、录校敦煌文献有所不同。如前所述,现在要对某一类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和录校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知识,即该类文献所属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整理敦煌文献所必需的专门知识。但如果是一般地阅读敦煌文献,就不一定非要具备后一方面的知识。因为一般地阅读史料只要能了解其大意即可,并不要求读者读懂每一个字。实际上,即使我们在阅读最基本的史料如《资治通鉴》时,也很难做到读懂全书的每一个字。但如果我们要使用某一条材料,那当然要尽量把每一个字都弄懂。阅读、利用敦煌文献也是如此。所以,历史研究者不仅应该阅读敦煌文献录校本,也可以直接阅读敦

<sup>①</sup>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1946年。



煌文献原卷、缩微胶卷和图版。遇到可利用的敦煌文献又对自己录校的文字没有把握时,可以请敦煌文献研究者帮忙。由于研究者利用的文献必与自己致力的专题有关,故对所用文献的背景知识十分熟悉,因而往往能够看到一些敦煌文献研究者看不到的东西。

对于中青年敦煌文献研究者来说,首先要加快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录校工作,为史学工作者提供更多的经过整理的敦煌文献录校本,力争早日出版全部录校本,为史学工作者阅读、利用敦煌文献提供更好的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运用敦煌文献学方法整理敦煌文献的局限,有意识地从一些唐史研究,包括用敦煌文献解决唐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不仅可生动、形象地向唐史研究者展示敦煌文献的价值,对作者自身的学术发展也大有好处。因为敦煌文献研究者如果不将中古时期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作为自己的学术支撑点,就只能被迫从事一些敦煌文献学方面的工作。只有将敦煌文献放到中古时期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才有可能将敦煌文献中蕴涵的全部信息因子激活,充分发挥它的功用。

最后,应该指出,以上所说的分流只是一种学术趋向,并不是在每个中青年唐史研究者和敦煌文献研究者身上都存在这种趋向。在当今的中青年学者中,注意利用敦煌文献的唐史研究者和注意研究唐史的敦煌文献研究者都不能说没有,只是为数不多。

## 八、填补中国书法史空白,开拓 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

**摇摇**由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选释、李新先生编次的《中国唐宋硬笔书法——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写卷》(以下简称《敦煌硬笔书法》)一书于**员怨**年**缘**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为五节,即一、书法论著中的缺失,二、敦煌古代硬笔书法使人大开眼界,三、敦煌古代硬笔书法的书写工具,四、敦煌古代汉字硬笔书法的特点,五、敦煌古代硬笔书法的历史意义。在这一部分,作者一方面对敦煌古代硬笔写本的文字品种、数量与流行情况做了介绍,并对硬笔书法的书写工具进行了考察,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对敦煌古代汉字硬笔书法的特点进行了探索,还论述了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及其意义。第二部分是图版及说明,作者共选释图片五十四幅,除前两幅一为新疆画中的竹笔照片,一为西夏竹笔照片外,其余均为敦煌硬笔书法实物照片。计古粟特文一幅、梵文一幅、吐蕃文一幅、于阗文一幅、回鹘文一幅、汉文四十七幅。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向读者展示了硬笔书法的面貌。

《敦煌硬笔书法》一书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开辟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

近年,海内外学者对敦煌遗书的研究日新月异,新作迭出。但这些成果大多集中敦煌遗书的内容方面,对写本的材料和形式如纸张、书法等方面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在这样的情况下,《敦煌硬笔书法》一书的出版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国内外学者有关这一课题的第一部著作。

就敦煌硬笔书法的研究而言,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先生。早在 1950 年,藤枝晃先生就敏锐地发现斯 285 号《妙法莲华经观音显圣图》的图画是用硬笔绘制的,上面的文字也是用硬笔仿描毛笔而成。1951 年,藤枝晃先生将此卷按原有尺寸放大刊登在《墨美》第 15 号,将自己的发现向学术界作了介绍。但此时他还没有涉及到在笔画上一笔到位、无需描笔的硬笔书法。此后,藤枝晃先生继续致力于古文书的形式和材料的研究,并于 1954 年出版了《汉字的文化史》(此书已由翟德芳、孙晓林译为中文,知识出版社 1984 年出版)。此书研究书写文字的工具和材料,探索文字和书法的发展变化。在这部著作的第十一章中,藤枝晃先生专设“敦煌的‘硬笔’书”一节,正确地指出敦煌的硬笔写本的出现与吐蕃的占领有关,他认为硬笔写本在敦煌遗书要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达六成甚至七成,并呼吁进一步开展对硬笔写本的研究。从藤枝晃先生在此书中的有关叙述来看,他所谓的硬笔写本似仍指硬笔仿描毛笔字的写本。但在该书所附的硬笔写本图版中,已包括未经描笔,一笔到位的硬笔书法。在此前后,还有学者在论述敦煌写本的书法或敦煌所用的硬笔时也曾涉及到敦煌硬笔书法,介绍过一些硬笔书法写本。但他们对硬笔书法的认识都没有超过藤枝晃。也就是说,在《敦煌硬笔书法》一书出版之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对这种在笔画造型上一笔到位,未经描笔的硬笔书法做过专门探讨。因此,这部书的出版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敦煌硬笔书法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开辟了敦煌硬笔书法研究的新领域。李正宇先生留意敦煌硬笔书法已有数

年,在吴苑年就曾在《唐宋时代敦煌的制笔和用笔》(《丝路论坛》吴苑年 四期)一文中论及敦煌硬笔书法。吴苑年 源月,他又在“敦煌民俗学会”上作过关于敦煌硬笔书法的发言。所以,《敦煌硬笔书法》一书应该说是作者数年间不断探索、思考的结果。

其次,《敦煌硬笔书法》一书填补了中国书法史的空白。

以往出版的中国书法史,均为毛笔书法史,没有硬笔书法的内容。在这类著作中,虽大都提及契刻文字或甲骨文,但只是把它们看成毛笔书法的祖先。书法界在介绍我国现代硬笔书法的历史渊源时,往往只追溯到清代。认为硬笔书法是随着西方钢笔的传入才应运而生的新体。《敦煌硬笔书法》一书以大量实物证明硬笔书法在我国源远流长,它始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器物上的铭文及简册刻文与点漆书等。至战国时代才出现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软笔。软笔书法虽为后起,但发展迅速,逐渐取得优势,成为我国书法史的主流。而汉字硬笔书法自秦汉以来时断时续,至唐代在敦煌及其它被吐蕃管辖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地区又一度重振,于五代后趋萧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钢笔、铅笔等硬笔的输入,硬笔书法再度勃兴,在日常应用中取得优势。所以,《敦煌硬笔书法》一书填补了我国硬笔书法发展史的空白,为以后撰写更加完备的中国书法史奠定了基础。

第三,《敦煌硬笔书法》一书从理论上总结了古代汉字硬笔书法的特点。作者通过对比毛笔楷书和硬笔楷书在笔画造型上的差别,将硬笔书法的笔画造型特点概括为:曲直唯线,点不成桃,肩、勾不顿,撇不成刀,捺不出脚,锋芒昭昭。

作者认为:“曲直唯线”是指硬笔书法的直、横、曲、折,都是不同形状的线;不像毛笔楷书的直、横、曲、折,都具有一定面性宽度造型。“点不成桃”指硬笔书法的点,只是不同方位和不同曲折的短线;不像毛笔楷书的点,作桃形、水珠形、三角形或方棱形之类。“肩、勾不

顿”指硬笔书法在屈折过肩处和勾挑底基处一滑而过,不用施压顿笔;不像毛笔楷书过肩和勾挑时需要顿笔。“撇不成刀”指硬笔书法的撇,只是一条斜线;不像毛笔楷书的撇作柳叶刀形。“捺不出脚”指硬笔书法的捺,仅作斜线或未作折线;不像毛笔楷书的捺作人脚之形。“锋芒昭昭”指硬笔书法笔画的头(起笔)尾(结笔),有明显地出锋,不像毛笔楷书常有藏锋(回锋和收锋)。这些认识不仅是对古代汉字硬笔书法的概括和总结,对于进一步研究我国现代硬笔书法的特点和规律,也具有借鉴意义。

《敦煌硬笔书法》一书的出版表明,敦煌遗书是仍需大力发掘的文化宝藏。

敦煌硬笔书法写本的存在,对敦煌遗书的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但多数学者只注意到这类写本的内容,未能从书体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李正宇先生独具慧眼,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这批敦煌学界众所周知的材料,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这个现象对人们的启发也许比出版一部著作的意义更大。它告诉我们敦煌遗书的文化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并启发我们对其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只要我们肯不断地培养、提高自己的学术眼光,增强创新意识,就有可能在这批旧有材料的基础上对前人有所突破。不仅现有的研究领域和课题会不断发展、深入,还会不断开辟出新领域、新课题。笔者期待着今后有更多的启发新思路,开辟新领域的敦煌学著作问世。

《敦煌硬笔书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清赵翼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如作者既将用刀刻划出的甲骨文作为远古硬笔书法的集大成之作,但对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石刻铭文却未论及,这部分材料无论从存在时间、数量、质量上说,都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这部分材料属于硬笔书法,那么汉字硬笔书法自秦汉以来就不是时断时续,而应是延绵不绝了。又如用硬笔仿描毛笔字的写本,虽与一笔到位,未经描笔的硬笔写本不同,

但就书写工具而言。似亦应属于硬笔书法。虽然藤枝晃先生对这类写本数量估计有待证实,但其在敦煌遗书中占有一定比例应无问题,作为一部全面介绍、探索敦煌硬笔书法著作,似应包括对这类写本的考察。此外,个别图版的命名,解说也不够准确,图版的印刷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只是笔者个人的浅见,权作引玉之砖,供作者和其他同行参考。

(原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员怨~~年第 圆期)

## 九、《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读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博物馆共同编纂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一书(共二册)已于 1990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影印刊布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全部 1600 号敦煌吐鲁番文献,并附收 160 号上海博物馆所藏传世唐宋写经。编者还从那些用纸特大、字迹较密、朱墨杂陈、彩绘佛画、钤有朱墨印章的遗书中挑出 120 幅制成彩版,作为插页置于各册之首,其原件全貌黑白版仍予保留。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近年逐渐有所披露。有的已被刊布(如上博 1989 年《索铁子牒》),有的曾公开展出,有的曾见于著录,但绝大多数未曾刊布;虽有部分学者有幸到该馆查阅、抄录部分文书,但多数研究者因各方面条件限制无法看到。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全部影印出版,使研究者可于斗室之内,饱览上海博物馆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全貌,这对学术界来说,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盛事。

《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与 1980 年以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大型文献图集《英藏敦煌文献》一样,所收全部影印图版,均系专为编纂该书而直接据原件拍摄并电子分色上版的,故图版上的文字、图像大多清晰可辨。其印刷效果可与《英藏敦煌文献》

媲美,远优于《敦煌宝藏》。影印图版之外,该书编者还编制了四种附录附于书后。一为叙录。“按全书编排顺序对所收文献的外貌和内容作简要说明,包括编号、题名、著译者、文种、装式、残况、首末行、卷长、卷高、纸数、纸长、字心高、天地高、每纸行数、每行字数、纸色、纸质、墨色、字体、栏框、题记、批校、印章、序跋藏印、断代等项。如系见于《大正藏》的佛教著作,注出其在《大正藏》中的相应卷、号、页、栏、行;其余酌情注出相应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必要时据已有的或编纂过程中新取得的研究成果略述内容价值。”二为年表。“摘出所收文献中有确切年代的原题记,按公元纪年排列”。三为分类目录。将所收全部文献按目前通行的做法即佛、道、世俗的顺序分类编排。四为索引。“摘出黑白图版、彩色图版、叙录、年表、分类目录中的遗书题名、抄经人名、藏经寺名等,按四角号码顺序排列,注出其在本书各部分的位置。”这四种附录,特别是其中的“叙录”,为读者了解书中所收文献的物质形态、收藏情况、内容价值等提供了方便。

从内容来看,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以佛经居多。在愿园号中,各类佛经占源个号,佛教图像占愿个号。另上博源(源)号有粤月两纸,粤的正面是《受戒忏悔文》等,编者将其归入佛经“念诵部”,月是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及供养文,亦属佛经与佛教图像部;上博源(源)《礼无量寿佛求生彼国文》,也被编者归入佛经“念诵部”,上博源(源)是书信与佛经被裱在了一起;上博源(源)是佛经与世俗文书等混杂为一册。世俗文书和儒家典籍仅有五个号,其中上博源(源)分为粤月两件。加上与佛经混杂在一起和佛经背面的世俗文书,也超不过源件。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佛经与佛画的价值,谢稚柳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已作了阐发。世俗文书,件数虽不多,但价值亦不容低估。如上博源(源)之源(源)《清泰四年曹元深祭神文》就是曹氏归义军时期的重要文献。此件尚未见治归义军史者引用,兹录全文如下:



**员** 维大唐清泰四年岁次丁酉八月辛巳朔十九日己亥,孤子  
**圆** 归义军行军司马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  
**猿** 上柱国谁(漁)郡曹元深等,敢昭告于后土地神祇、五方帝、  
**源** 五岳四渎、山川百灵、廿四气、七十二候、四时八节、太岁  
 将军、  
**缘** 十二时神、墓左墓右、守塚大夫、丘承(丞)墓伯、四封都尉、  
 魂门  
**远** 停(亭)长、地下府君、阡陌、游击、三丘五墓、家亲丈人。  
 今既  
**苑** 吉晨(辰)良日,奉设微诚,五彩信弊(幣),金银宝玉,清酒肥  
**愿** 羊,鹿脯鲜果,三屠上味。惟愿诸神,留恩降福,率领  
**怨** 所部,次第就座,领纳微献,赐以嘉福。主人再拜。行酒  
 上香。  
**罔** 奉请东方苍龙甲乙墓左之神,奉请南方朱雀  
**叕** 丙丁墓前之神,奉请西方白虎庚辛墓右之神,  
**罔** 奉请北方玄武壬癸墓后之神,奉请中央黄帝  
**隹** 后土戊己墓内之神,奉请乾坤震巽离兑坎艮八卦神君,  
**源** 元曹、墓曲、墓录、墓鬼、殃祸、墓耗(耗)之神,童子、宝藏、  
 金印、  
**缘** 金柜、玉信、黄泉都尉、蒿里丈人,一切诸神等各依率所部,  
**远** 降临就位,依次而坐,听师具陈。主人再拜,行酒上香。  
**苑** 重启诸神百官等,今既日好时良,宿值天仓,主人尊父  
**愿** 大王灵柩,去乙未年二月十日,于此沙州莫高乡阳开之里,  
**怨** 依案阴阳典礼,安厝宅兆。修荣(营)坟墓,至今月十九  
 日毕  
**罔** 功葬了。当时良师巽(选)择,并皆众吉,上顺天文,下依  
 地理,

**圆** 四神当位，八将依行，倾（顷）亩足数，阡陌无差，骐（麒）麟（麟）凤凰，章

**圆** 光、玉堂，各在本穴；功曹、传送，皆乘利道；金柜、玉堂，安图

**圆** 不失；明堂炳烛，百神定职。加以合会天仓，百福所集，万善

**圆** 来臻。又恐营造之日，掘凿筑治，惊动地神，发泄上气，工匠

**圆** 不谨，触犯幽祇。或侵阴阳，九坎八煞，非意相妨。或罗天纲，或

**圆** 犯魁罡，或惊土府，或越辛（胜）光，或逆岁时，横忤怨祥。今日谢

**圆** 过，百殃消亡，死者得安，生者吉祥。苍龙扶左，白虎扶右，朱

**圆** 雀尊前，玄武御后，宝藏金柜，四方日益，〔百〕官崇利，公侯卿

**圆** 相，世禄不绝，所向休泰，永保亢吉。尚飨！主人再拜，行酒上

**猿** 香。主人某乙等谨复重启，所献微礼，蒙降福祐，愿镇谢

**猿** 已后，亡者魂神，安宁幽室，生者兴崇，子孙昌盛，长保嘉庆，

**猿** 内外贞吉，福善日臻，祸殃休息。殷勤奉谢，庶士（事）如法，薄礼虽轻，

**猿** 微意实重。既蒙慈泽，领纳单（丹）诚，上下诸神，尽情幸乐。皆为醉

**猿** 饱，三爵既固，福崇嘉庆。今日直（执）符直（值）使，前后游击，邪魅驱逐万

**猿** 里，阡陌、将军、亭长、都尉，卫护幽宅，永保贞吉，丘墓安静，子孙

**猿** 富贵吉昌。既昭周流，宣祭已毕，时多味歇，请收余祚。尚飨！

**猿** 便酌酒与主人寿福及散洒四方。又取酒祝曰：今蒙福祐，愿亡灵幽室

**猿** 永无灾难。饮酒讫，再拜。又重请三王之礼，悉以周遍。镇谢之福，收藏已讫。

**猿** 合座饱满，上下喜欢。时延日暮，不敢稽留，坐者既疲，立者复

**源** 劳，酒冷无味，肉冷无气，愿神严驾，各还本位。在左还左，在右还

**源** 右，上官还天，下官还地，垂恩纳祐，勿令故气邪精，横相忤扰，所

**源** 游恶气，远驱万里。子孙安吉，永无后难，上下再拜，送神上路。

**源** 谨以终始再拜。

此件保存在一本长达 **员** 页的册子中。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相当庞杂，达 **源** 多种，但以佛经和与佛教有关的文字为主。此件混在其中，恐非原件，当系此册页主人的抄件。

此件为研究曹氏归义军的历史提供了新材料。首先，它为确定曹议金的卒年提供了新的证据。关于曹议金的卒年，曾在很长时间存在争议，歧说达六、七种。后经友人荣新江教授考证，确定在后唐清泰二年（**怨**）二月十日<sup>①</sup>，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而本件中有“主人尊父大王灵柩，去乙未年二月十日，于此沙州莫高乡阳开之里，依案阴阳典礼，安厝宅兆”。这里的“尊父大王”即是曹议金，当无疑问。清泰四年岁次“丁酉”，上推两年之“乙未”正好是清泰二年，证明荣新江确定的年月是正确的。但也有一点小问题。此件云曹议金是在

① 参看荣新江《敦煌卷子札记四则》，《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员** 年。

二月十日被安厝宅兆。依据当时的凶礼,像曹议金这样的身份从初终(死亡)到卜宅兆要经过复、设床、奠、沐浴、袞、含、赴阙、小敛、大敛、成服等一系列礼仪,一般需要好几天时间。这样,曹议金似乎应死于二日十日之前。这就和荣新江考证的结果发生了矛盾。荣新江确定曹议金死亡日期的证据是斯~~1852~~<sup>1851</sup>《归义军节度使牒》,这是一份批准洪润乡百姓张留子女胜莲出家的文件,内云“今因父王忌日,广会斋筵,既愿出家,任从剝削者,故牒。清泰五年二月拾日”。这里的“父王”,显然亦指曹议金。既然曹议金的忌日是在二月十日,他自然是死于二月十日,该件是归义军正式牒文,而且十日之“十”字是大写,不可能写错。另,斯~~1852~~<sup>1851</sup>《建隆二年二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宾头卢颇罗堕上座疏》中,亦记其父忌辰在二月十日(此条材料系荣新江提供——笔者)。这说明曹议金死于二月十日的证据是充分的。既然曹议金的死亡日期是确定的,此件所记曹议金被安厝宅兆的日期就有问题。由于此件是抄件,难免抄漏或抄错。很可能是抄写者在二月“十”与“日”之间漏写了一个数字,即曹议金被安厝宅兆的日期在二月十日以后的某日。

其次,此件记载了曹议金的入葬日期,并为探寻曹议金墓地提供了线索。文中载明曹议金葬于清泰四年八月十九日。又云安厝宅兆的地点在沙州莫高乡阳开里。一般说来,“宅兆”应指墓地,曹议金的灵柩是停放在墓地等待坟墓修成后安葬。如是,曹议金的坟墓应在莫高乡阳开里。其坟墓自清泰二年二月至清泰四年八月共修建了两年又六个月,规模一定不小。按照常规,曹氏家族的其他成员死后也应葬在议金墓旁。这就为考古工作者探寻曹氏家族的墓群提供了大致的方位。

再次,此件还可引发人们对曹元德、曹元深的执政情况作进一步考察。按一般说法,曹议金死后,由其子曹元德继任归义军节度使,直到天福四年曹元德死后,才由其弟曹元深执掌归义军政权。如此,

清泰四年八月间曹元德正在任上,理应由他主持其父葬礼,领衔祭神。但此件文书中领衔祭神的主人却是曹元深。在封建时代,祭祀为邦国大事,不容僭越,而曹元深竟敢擅代其兄。《于阗国行程录》记载,大约在天福四年冬,后晋使臣张匡邺等到达沙州时,出外迎接的也是“刺史曹元深”。荣新江教授认为这是曹元深代重病不起的元德去迎接天使<sup>①</sup>。如果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否可以说早在清泰四年时,以归义军行军司马身份代其兄祭神的曹元深已实际掌握了归义军政权呢?元德、元深交接间的一些材料是否可以据此重做解释呢?

最后,此件还为研究敦煌的丧葬祭祀习俗与曹氏家族的宗教信仰提供了新材料。依据当时的丧葬礼仪,具有曹议金这样品秩的地方官在下葬时仅有“祭后土”一项礼仪,祝文十分简略。而曹元深的祭神文所奉请的神虽说以后土为首,但其下列有二十多种名目。其中一些名目是道教尊奉的神灵,如“太岁将军”、“童子”、“八卦神君”等。还有一些名目虽古已有之,但在道教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如“五方帝”,虽是古代神话中的五位天帝,但在道经中也被附会为太上大道君的侍卫;“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古代神话中是四方之神,在道经中也早已成为老子的护卫神;对“五岳”的祭祀,虽早已被载入儒家的祀典,同时也受到道教的崇奉等等。还有一些名目暂时未能考出其渊源,但从其名称看,很可能与道教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和中央黄帝一起在祭文中都是曹议金的护墓神,表明它们在本件中并非源于古代神话,而是源于道教。联系文中出现的侍卫天尊的童子等名目,似乎暗示曹议金业已成仙。所以,这篇祭神文所祭的神虽以儒家礼仪规定的后土为首,却

① 参看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员源园年。其修订稿载《敦煌学》第 员源期。

深深地受到了道教的影响,透露出曹氏家族在尊儒崇佛的同时,也信奉道教。由此看来,我们对归义军时期道教的传播和发展情况,有重新认识的必要<sup>①</sup>。

《曹元深祭神文》之外,还有已被唐耕耦先生刊布的上博  (愿) 粤《索铁子牒》,朱雷先生已对此牒作了出色的研究<sup>②</sup>。被编者拟题为《造莫高窟记》的上博  (源) 猿号,经马德兄考证是《沙州刺史李庭光莫高灵岩佛窟之碑并序》的一部分,其首部恰好与斯  猿号的尾部相接<sup>③</sup>。此外如上博  猿《请纸牒》、上博  猿(愿) 月《渠人转帖》、上博  源(源) 猿之  猿《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等,也都是十分重要的世俗文书。被编者归入佛经“念诵部”的上博  猿(猿) 愿《礼无量寿佛求生彼国文》、上博  源(源) 猿之  猿《上皇劝善断肉文》、上博  源(源) 猿之  猿《劝善文》、上博  源(源) 猿之  猿《发愿文》和被归入“俗文学类”的上博  源(源) 猿之  猿《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等,对研究佛教与社会的关系,也具有重要价值。儒家经典则有上博  圆(圆) 猿《论语郑玄注》。

《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对全书所收的文献都进行了定名工作。从全书的定名可以看出,编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参考了许多敦煌学界的研究成果。虽然如此,书中部分文献的定名仍存在问题,此试举例例:

援上博员(卷三)《礼无量寿佛求生彼国文》。此件原有标题，定名没有问题。但《礼无量寿佛求生彼国文》到第猿行就结束了。以后九行为《白衣弟子祀马部司马丰祖写〈十方佛名〉一卷题记》。

① 余欣在《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 2009 年）第三章对此文之性质和文中所列诸神作了新的探索，可参看（此注为作者新注）。

② 参看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朱雷《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③ 参看马德《三件莫高窟洞窟营造文书述略》，《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

此卷是抄件,据题记系抄于大统十七年五月六日。抄写者先抄《礼佛文》,后抄写经题记。编者虽在叙录中指出卷末有《发愿文》(应为写经题记——笔者) 窟行 (应为九行),但在《发愿文》(应为写经题记——笔者) 图版下仍标以《礼无量寿佛求生彼国文》。这不仅会给人以全卷为一件文书的印象,也不符合全书的定名体例,故应分标二题。

圆媛上博 源(猿媛) 号,编者拟题为“造莫高窟记”,如上所述,此件已经马德考出是《沙州刺史李庭光莫高灵岩佛窟之碑并序》抄本的一部分。从此件的叙录来看,所以造成该件定名的错误,是因编者对在莫高灵岩造窟一所与兴造莫高窟两个概念未加区分。我们知道,在《造莫高窟记》标题下撰写的文字应是记述莫高窟的兴建过程,而在莫高窟造窟一所按当时习惯一般题为《莫高窟修功德记》或《造窟一所功德记》。如编者叙录中提到的伯 猿媛(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和伯 圆媛背《敦煌社人平诘子一十人勤于宕泉建窟一所功德记》等。而本件内有“与公等敬造一窟”,即使在未考出它是与斯 员媛相接的情况下,也只能名为《莫高窟造窟一所功德记》,不能定名为《造莫高窟记》。因为编者不了解上述情况,不仅定名出现了失误,在叙录中还把此件和保存在伯 猿媛及莫高窟 员媛北壁的《莫高窟记》列为同类。如所周知,《莫高窟记》记述的自前秦至唐咸通六年间,人们在莫高灵岩不断开凿石窟的概况,它与人们在此为开凿某个洞窟而撰写的功德记判然有别。后者一般只记述造窟缘由,施主的身份、姓名、美好品德,对佛教的信仰,窟内画塑的内容及造窟所要达到的目的等,并不涉及整个莫高窟的兴建过程。这两类文字虽均与兴建莫高窟有关,但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猿媛上博 源(猿媛) 之 猿媛号,编者拟题为“每月十斋”。此件原题为“每月十斋日”,其内容也是记述每月设斋的日期及所获功德。如“一日童子下,此日斋者不堕铁树地狱;八日太子下,此日斋者不

堕铁犁地狱”等等。此件所以发生定名错误,是因编者将原题中每月十斋日的“日”字误释成了“曰”。在敦煌遗书中,“日”、“曰”二字往往区别不大,判定其到底是哪一个字要根据上下文义或参照其它同类文献。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与本件同类的文书有好几件。如斯 **图卷** 中有“大乘四斋日,六斋日,十斋日”,斯 **图卷** 中有“地藏菩萨十斋日”等,均系原题。足证此件亦应依原题,定名为“每月十斋日”。

**源** 上博 **源源图卷** 粤《受戒忏悔文》。此件前后均缺,中题《受戒忏悔文》。从其内容来看,实为两部分,标题之前为俗家弟子“受八戒忏悔文”(前缺),标题之后为“沙弥十戒”(后缺),文书中的标题应指标题以前的部分。上博 **源源图卷** 中之“沙弥十戒”,编者单立了标题,依此体例,此件之《沙弥十戒》亦应单立标题。

**缘** 上博 **源源图卷** 粤之 **猿** 编者拟题为“天福八年敦煌乡文书”。此件为一件粘于正面文书纸背的文书残书,下部与后部均缺,仅存二残行,其文如下:

**员** 天福八年二月廿日,敦煌乡百姓 **摇摇摇摇摇摇**

**圆** 欠阙正帛,遂于龙勒乡百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从此件所存内容来看,它并非敦煌乡文书,而是敦煌乡百姓某向龙勒乡百姓某贷绢的私契。此节录两件敦煌遗书中保存完整的贷绢契首部,以资对照,伯 **图卷** 背《辛巳年四月廿日敦煌乡百姓郝猎丹贷绢契》:“辛巳年四月廿日,敦煌乡百姓郝猎丹家中欠少正帛,遂于张丑奴面上太(贷)生绢一疋,长叁仗(丈)捌尺,福(幅)阔贰尺(下略)。”又伯 **猿图卷** 背《壬寅年二月十五日莫高乡百姓龙钵略贷生绢契》:“壬寅年贰月十五日,莫高乡百姓龙钵略欠阙正帛,遂于押衙王万端面上贷生绢一疋,长三丈六,福(幅)阔壹尺八寸(下略)”。用上引二例与此件残存文字比较,足可证明本件不像抄件,系实用文书,虽保存的内容不多,但有明确纪年。山本达郎、池田温二先生合编之



《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三) 契约篇》和唐耕耦、陆宏基合编之《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二) 均未及收录。

上博 ~~国图藏~~ ~~缘起~~ 号, 该件正面为“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卷首背面有“有头有尾上中”六字, 编者定名为“杂写”。但从这几个字的笔迹看。似非随手所写, 很可能是勘经记录。

此外还有几处经尾或经背有数码等符号, 均被编者定名为“杂写”。从这些符号来看, 似均属有意而为, 而非随手所写, 其涵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定名之外, 在其它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参考敦煌学界成果方面, 间有疏漏。如上博 ~~国图藏~~ ~~缘起~~ 《观世音菩萨像》的叙录中所述曹元忠的职务与称号的迁转情况, 依据的是姜亮夫先生之《敦煌学论文集·瓜沙曹氏年表补正》, 其中一些说法已为近年的研究所否定。再如上博 ~~国图藏~~ ~~缘起~~ 《佛说佛名经卷第六》叙录云曹议金执掌归义军政权在后梁贞明五年 ~~(955)~~, 卒于后晋天福三年 ~~(958)~~, 这两个年代均是敦煌学界早已不用的过时说法。附录中的分类目录也存在问题。在类目编排上, 将文书归为一类, 既缺乏依据, 也不实用。因上博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文书数量有限, 矛盾尚不突出, 待编俄藏、法藏敦煌遗书的分类目录时, 文书一类必因数量众多, 内容庞杂而失去分类意义。在内容归类方面, 也存在着随意性。如《劝善文》、《发愿文》、《受戒文》被归入佛经“念诵部”, 《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被归入“俗文学”类, 其实这些都是与在家佛教信徒有关的文字, 性质相同。

对敦煌吐鲁番文献进行定名、分类、归类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极其艰苦的工作。一些文献的定名过程常常就是研究的过程, 即使集敦煌学各个学科专家的集体智慧, 有的文献的性质、名称一时仍无法解决。参加《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一书编纂工作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和上海博物馆的研究人员, 他们在编辑领域和

古物鉴赏方面都是行家,但到底不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专门研究者,其工作的难度和艰苦是可想而知的。经过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该书在定名、分类等方面达到目前的水平,足以令人钦佩,但如果从编辑角度看,集编者、编辑二身于一任,虽有减少环节的好处,却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它实际上减少一道审查手续,这对减少错误,避免失误无疑是不利的。其次,编辑由其自身工作性质决定,很难成为每个学科的专家。即以敦煌吐鲁番文献而言,光了解各学科的研究动态,就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本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与编者这方面准备不足有关。

按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规划,《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是该社大型资料丛书《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一部分。这套丛书的预期目标是出版敦煌吐鲁番地区出现的各种文字资料和艺术资料。目前,《俄藏敦煌文献》正在陆续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和国内外其它收藏单位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也将陆续出版。而俄藏、法藏敦煌文献的数量更加庞大,内容更为复杂,研究文献也更丰富。因此,如能适当吸收一些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者参加编纂工作,对于避免失误、减少错误、加快速度、提高质量都将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殷切地希望上海古籍出版社能以更好的质量,更快的速度早日完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

(原载《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 4 期)

## 十、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杂处愿—员处愿)

**摇摇**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编著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以下简称“荣目”),作为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四,于 员处愿年苑月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这本目录收录的范围是 杂处愿—员处苑号中之非佛教文献部分。从内容来讲,它是翟林奈(德林奈)目录和刘铭恕目录继续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即 杂处愿—员处苑号中之佛教文献部分,由方广铝博士负责编目,现正在进行中。

“荣目”分前言、目录正文和索引三个部分,卷首有吴芳思博士(英国云林社)所作的序和作者自序。吴芳思在序言中介绍了斯坦因(杂处愿)收集品编目工作进展缓慢的原因,及 杂处愿号以后的敦煌写本的修复过程;并指出“荣目”是自 员处愿年以来,首次出版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作者自序介绍了编目工作的缘起和过程,以及目录著录的内容。“前言”介绍了 杂处愿—员处苑号敦煌写本的来源及其价值。指出这批写本主要源于翟林奈编目时剩余的残卷,揭自其它写卷、绢纸绘画和经帙的残片及少量混入的其它地区出土文书。目录正文按馆藏编号顺序排列,一号之内若有不同

内容则分别标题,依次著录。每号文书除拟定标题外,还有记述文书外观、内容、专有名词、题记、朱笔、印鉴、杂写、年代及与其它写本的关联等情况的提要。凡能找到有关该号写本的研究文献和图版,亦予著录。目录正文后附有分类索引和关联写本的编号索引。

“荣目”虽在内容上是翟林奈目录的继续,但其编排形式却没有沿袭翟林奈目录按类编排的方式,而采取了按馆藏编号顺序编排的方式。这两种编排方式反映了学术界对敦煌文献编目工作的探索。从目录学角度看,只有编制分类目录,才有可能将敦煌文献纳入总的图书分类体系中。但敦煌文献与图书馆收藏的一般图书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首先,从内容来看,敦煌文献并不全是典籍,还有大量文书。这些文书我们往往不能在古今图书分类的类目中为其找到恰当的位置。其次,相当数量写本的性质有待探明,对这些写本的归类过程往往就是一个长时期的研究过程。由于上述原因,各图书馆、博物馆等收藏单位在入藏敦煌写本时,大多未能像收藏图书那样按分类次序收藏,而是分别给予编号,按编号顺序收藏。这在当时是出于不得已,但即使到了今天,只要上述两方面问题未能完全解决,实际上就无法完成对敦煌文献的分类和归类工作,因而也就很难编出令人满意的分类目录。从已出版的几种敦煌写本分类目录来看,都存在这样一些问题。首先,因为现在通行的各种总括性图书分类法都不能适应敦煌文献内容的需要,所以编者只能根据敦煌文献的实际情况拟定独立的分类体系,这样的分类体系当然不能与通行的图书分类衔接。其次,这些分类目录在类目的设置和内容的归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sup>①</sup>。由于敦煌写本的内容极为丰富,前所未见者与性质不明者均为数不少。所以,不管编目者的学识多么广博,都很难在一定时间内编制出完善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分类体系,至于将编者

<sup>①</sup> 参看白化文、杨宝玉《敦煌学目录初探》,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

面对的每件敦煌文献都准确地归入自己设计的分类体系中就更难了。所以,分类目录在这方面存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人们仅靠阅读分类目录并不能获得有关某一类写本的全部信息。最后,由于各主要收藏单位的敦煌文献都是按编号顺序存放的,其缩微胶卷和大型影印图集也多按馆藏编号顺序编排。由此决定学者们在查阅敦煌文献时只能按馆藏编号顺序查找,在记录、引用敦煌文献时所注出处也多用馆藏编号而较少使用分类编号。在这样的情况下,分类目录往往不能直接利用。如人们在阅读英国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时,如要参考翟林奈目录,需先查阅该目录之馆藏号与分类号对照表,而后才能找到自己要参考的条目。

与分类目录相比,按馆藏编号顺序编制的目录在目前有明显的优点。其一,目录的编排顺序与多数图书馆、博物馆的收藏顺序一致,与多数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大型影印图集的编排顺序一致,查阅十分方便。其二,对文献内容的著录比较灵活。因没有类目的限制,一纸之上如包括不同性质的内容,完全可以分别标题,依次著录。而分类目录如果这样做,就会破坏自己的分类体系。

“荣目”收录的敦煌汉文写本多为残片,没有头尾,如果编制分类目录,所遇到的困难会更大,也就更难令人满意。所以,作者采用的按馆藏编号顺序排列的方式,实际上是在总结了敦煌文献编目史基础上做出的明智选择。

当然,我们无意否定敦煌写本分类目录的价值。实际上,包括翟林奈目录在内的已出版的几种分类目录在类目的设置和写本的归类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就,并为以后编制更完善的分类目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敦煌学的发展,随着学术界对敦煌文献认识的逐步深入,一部既能纳入总的图书分类体系,又符合敦煌文献实际的分类目录终将会出现。但即使在有了这样的分类目录的时候,按馆藏编号顺序编制的目录也不会失去它的使用价值。

这类目录仍然会是阅读敦煌文献不可缺少的工具。因为馆藏编号作为各主要收藏单位的收藏次序和已公布的缩微胶卷、多数大型影印图集的编排顺序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了。

“荣目”的出版,为学术界了解敦煌写本中的非佛教文献提供了极为方便的工具。此前,由于这批文献没有公布,人们只能从黄永武博士主编的《敦煌宝藏》看到其中的部分图版,有时也能从走访过英伦的学者的论著中见到其中个别文书的录文或图版。至于目录,也只有黄永武刊布过敦煌写本的简目,其中主要是佛典。所以,敦煌学界虽然早已得知敦煌并非斯坦因所获敦煌写本的全部,但因没有关于这部分写本的详细目录,也就无法全面了解其具体内容。可谓“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藉未由也”<sup>①</sup>。现在,“荣目”填补上了这一空白。同时,这部分文献的图版也被编入《英藏敦煌文献》第9卷,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前述敦煌文献的特殊性所决定,编著敦煌写本目录与编著一般目录著作有所不同。因为对敦煌写本进行定性、定年、定名的过程常常就是一个艰苦的研究过程。所以,一部优秀敦煌写本目录常常同时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荣目”就是一部这样的目录著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者在编目过程中考出了一批文书的名称。为失去标题的写本拟名,是编著敦煌写本目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往往决定着一部目录的质量。如前所述,“荣目”所收多为没有头尾的残片,不少残片仅存几个字,其拟名任务的繁重和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已断裂为十八片的《列子·杨朱篇》,较大的残片

①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载《敦煌劫余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1944年。

仅存**怨**行、**苑**行，小的残片仅存**源**个字。这十八片均无首尾，号码多不相连，作者不仅考出它们原均为同一写本，还查出了其确切名称，并列出了各片的排列次序，比定出这些残片与**杂苑苑**亦为同一写本。又如**杂苑苑**四边均残，存小字**员**行，大字**猿**行，共**愿**个字，亦被作者考出是《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的一部分，与**杂苑苑****杂苑苑****杂苑苑****杂苑苑**等为同一写本，而**杂苑苑**残片恰好是**杂苑苑**第**员**—**猿**行中间所佚失的小纸块。类似这样无头无尾的残片，被作者考出名称的例子，在目录中不胜枚举。十分清楚，这样的拟名工作实质上是作者创造性劳动的结晶。

当然，作者在拟名过程中也十分注意参考有关研究成果。这不仅包括已刊的研究成果，如“自序”中所言，作者还吸收了《英藏敦煌文献》参编者的正确意见，甚至一些正在印行中的著作的有关成果也被作者设法采纳了。通过作者的上述努力，使这部目录著作在标名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大部分失去原题或没有标题的文书都被拟定了正确的或比较稳妥的名称。

其二，考出了一批文书的年代。如所周知，确定文书的年代，是对敦煌写本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而“荣目”所收文书多数没有或已失纪年，不便使用。作者在编目过程中在确定文书年代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荣目”考出了近二十件文书的绝对年代，近三十件文书的相对年代。这些工作不仅为读者利用这批文书提供了方便，还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应该指出，对文书年代的考证不是一部敦煌文献目录必须完成的工作，而是需要经过学术界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荣目”所收文书在定年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待完成。笔者在研讨“荣目”的过程中，对其中部分文书的年代进行了考证，现将考证结果附录于此，供作者和读者参考、批评。

**员**援由**杂苑苑**和**杂苑苑**拼接而成的《丁巳年二月十一日董再

德出便麦与人名目》，其中之便麦人“王保住、张骨儿”见于由 **敦煌研究** 拼接而成的《丁未年四月十二日归义军米羊司就常乐官税掣家羊数名目》，该件之“丁未”，“荣目”已考出是公元 **敦煌研究** 年，则《董再德出便麦与人名目》之“丁巳”只能是距 **敦煌研究** 年较近的 **敦煌研究** 年（显德四年）。据“荣目”提示，与《丁巳年 **敦煌研究** 二月十一日董再德出便麦与人名目》原为同一文书不同部分的残片还有 **敦煌研究** 这几号文书的年代当均在 **敦煌研究** 年或其前后。“张骨儿”又见于 **敦煌研究**《某年便麦历》，据此，该件之年代当在十世纪中叶至后叶。

**敦煌研究**《某年便麦历》中之“安住子、张义信”见于 **敦煌研究** 背《同光三年 **敦煌研究** 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安住子”还见于 **敦煌研究** 背《长兴二年 **敦煌研究** 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则《某年便麦历》之年代当在十世纪上半叶。而 **敦煌研究**《甲辰年至丁未年 **敦煌研究** 李闾梨出便黄麻及麦名目》中亦有“安住子”，可与上述考证互相印证。

**敦煌研究**《归义军时期王道员等户地子籍》中之“王进员”见于 **敦煌研究** 背《辛酉年十一月廿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该件之“辛酉”，笔者已考出是公元 **敦煌研究** 年<sup>①</sup>；“田义信”见于 **敦煌研究**《壬申七月廿九日社人口晟新妇身故转帖》，该件之年代笔者已考出在公元 **敦煌研究** 年<sup>②</sup>，则《归义军时期地子籍》应在十世纪后半叶。又，上引《辛酉年 **敦煌研究** 十一月廿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中之“画住奴”见于 **敦煌研究**《便物历》。

**敦煌研究**《部落转帖》中之“张富住、张丑儿”见于 **敦煌研究** 背《乙亥年 **敦煌研究** 九月廿九日平康乡官斋历》；“李衍鸡”见于 **敦煌研究** 背

① 参看拙作《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三），《社科纵横》**敦煌研究** 年第 **敦煌研究** 期，**敦煌研究**。

② 参看拙作《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敦煌研究** 年第 **敦煌研究** 期，**敦煌研究**。



《甲戌年(忽源 五月廿九日平康乡官斋籍》;“安万端”见于上引 杂援源 背《辛酉年(忽员 十一月廿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据以上材料,《部落转帖》当在十世纪后半叶。“李衍鸡”又见于 杂援源 背原与《归义军酒破历》。该件中之“李憨儿”亦见于上引《甲戌年(忽源 五月廿九日平康乡官斋籍》;“张定奴”见于 马援源 背《甲申年二月廿日渠人转帖》,这个“甲申”已被确定为公元 忽源 年<sup>①</sup>。则《归义军酒破历》亦当在十世纪后半叶。杂援源 背原与《归义军酒破历》中之“王留住”见于 杂援源 背《番役名簿》,《番役名簿》中亦有上引 杂援源 背《某寺便麦历》和 马援源 背《甲戌年(忽源 十月十五日平康乡官斋籍》中出现过的“索住儿”;且其中之“唐粉子”见于 杂援源 背《丁卯年二月八日张憨儿母亡转帖》,该件之“丁卯”已被陈国灿先生考定为公元 忽源 年<sup>②</sup>。则 杂援源 背《番役名簿》之年代当在十世纪中至后半叶。另,上列“张丑儿”还见于 杂援源 背《麦麸破历》。

缘杂援源 背《配付人名簿》中之“安丑子”见于 杂援源 背《壬申年十二月廿二日常年建福转帖抄》和 马援源 背《壬申年十二月廿二日常年建福转帖抄》,这两件文书的年代均在 忽源 年<sup>③</sup>;“李安定”见于 马援源 背《社户名簿》,该件之年代已考出在十世纪中叶<sup>④</sup>;“张骨子”见于 马援源 背《社人贺保新身故转帖》,该件之年代亦在十世纪中叶<sup>⑤</sup>。据以上材料,《配付人名簿》当在十世纪中叶至后半叶。

此外,杂援源 背《某年八月十六日社司转帖》,笔者亦已考出其年代在十世纪后半叶<sup>⑥</sup>。

① 参看拙作《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三),《社科纵横》员源 年第 缘期,愿页。

② 陈国灿《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敦煌学辑刊》员源 年第 员期,愿页。

③ 参看拙作《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员源 年第 缘期,愿页。

④ 同上注,愿至 愿页。

⑤ 参看拙作《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员源 年第 源期,猿页。

⑥ 参看拙作《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员源 年第 缘期,愿页。

其三,考出了一批文书之间的联系。其中一些残片被考出与其它残文书原为同一文书。如前述 **杂号四苑**等《列子·杨朱篇》残片和 **杂号一苑**《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残片均属这种情况。有些文书被考出了同组文书。如 **杂号三苑**《辛酉至癸亥三年间灵修寺诸色斛斗入破历计会》被作者考出与 **杂号四苑**中《庚申至癸亥年灵修寺招提司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稿》、《辛酉年诸渠厨田及散施入历》为同组文书。这三件文书不仅字体相同。且均提到“汜判官厨田”、“史家厨田”。还有不少文书被考出了同类文书。如 **杂号一苑**《某年归义军算会群牧马驼羊见行籍》,作者指出该件与 **杂号四苑**《戊辰年十月十八日就东园算会小印子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属于同类 **杂号三苑**中之《丙申年八月归义军驼官马善昌请判凭状及判》,亦被指出与 **杂号四苑**《癸巳年驼官马善昌状附判》同类。更多的是被列出了相关文书。如上引 **杂号三苑**《某年归义军算会群牧马驼羊见行籍》标题下被列出的相关文书有 **杂号四苑** **杂号一苑** **杂号二苑** **杂号三苑** **杂号四苑** **杂号五苑** **杂号六苑** **杂号七苑** **杂号八苑** **杂号九苑** **杂号十苑** **杂号十一苑** **杂号十二苑** **杂号十三苑** **杂号十四苑** **杂号十五苑** **杂号十六苑** **杂号十七苑** **杂号十八苑** **杂号十九苑** **杂号二十苑** **杂号二十一苑** **杂号二十二苑** **杂号二十三苑** **杂号二十四苑** **杂号二十五苑** **杂号二十六苑** **杂号二十七苑** **杂号二十八苑** **杂号二十九苑** **杂号三十苑** **杂号三十一苑** **杂号三十二苑** **杂号三十三苑** **杂号三十四苑** **杂号三十五苑** **杂号三十六苑** **杂号三十七苑** **杂号三十八苑** **杂号三十九苑** **杂号四十苑** **杂号四十一苑** **杂号四十二苑** **杂号四十三苑** **杂号四十四苑** **杂号四十五苑** **杂号四十六苑** **杂号四十七苑** **杂号四十八苑** **杂号四十九苑** **杂号五十苑** **杂号五十一苑** **杂号五十二苑** **杂号五十三苑** **杂号五十四苑** **杂号五十五苑** **杂号五十六苑** **杂号五十七苑** **杂号五十八苑** **杂号五十九苑** **杂号六十苑** **杂号六十一苑** **杂号六十二苑** **杂号六十三苑** **杂号六十四苑** **杂号六十五苑** **杂号六十六苑** **杂号六十七苑** **杂号六十八苑** **杂号六十九苑** **杂号七十苑** **杂号七十一苑** **杂号七十二苑** **杂号七十三苑** **杂号七十四苑** **杂号七十五苑** **杂号七十六苑** **杂号七十七苑** **杂号七十八苑** **杂号七十九苑** **杂号八十苑** **杂号八十一苑** **杂号八十二苑** **杂号八十三苑** **杂号八十四苑** **杂号八十五苑** **杂号八十六苑** **杂号八十七苑** **杂号八十八苑** **杂号八十九苑** **杂号九十苑** **杂号九十一苑** **杂号九十二苑** **杂号九十三苑** **杂号九十四苑** **杂号九十五苑** **杂号九十六苑** **杂号九十七苑** **杂号九十八苑** **杂号九十九苑** **杂号一百苑** **杂号一百零一苑** **杂号一百零二苑** **杂号一百零三苑** **杂号一百零四苑** **杂号一百零五苑** **杂号一百零六苑** **杂号一百零七苑** **杂号一百零八苑** **杂号一百零九苑** **杂号一百一十苑** **杂号一百一十一苑** **杂号一百一十二苑** **杂号一百一十三苑** **杂号一百一十四苑** **杂号一百一十五苑** **杂号一百一十六苑** **杂号一百一十七苑** **杂号一百一十八苑** **杂号一百一十九苑** **杂号一百二十苑** **杂号一百二十一苑** **杂号一百二十二苑** **杂号一百二十三苑** **杂号一百二十四苑** **杂号一百二十五苑** **杂号一百二十六苑** **杂号一百二十七苑** **杂号一百二十八苑** **杂号一百二十九苑** **杂号一百三十苑** **杂号一百三十一苑** **杂号一百三十二苑** **杂号一百三十三苑** **杂号一百三十四苑** **杂号一百三十五苑** **杂号一百三十六苑** **杂号一百三十七苑** **杂号一百三十八苑** **杂号一百三十九苑** **杂号一百四十苑** **杂号一百四十一苑** **杂号一百四十二苑** **杂号一百四十三苑** **杂号一百四十四苑** **杂号一百四十五苑** **杂号一百四十六苑** **杂号一百四十七苑** **杂号一百四十八苑** **杂号一百四十九苑** **杂号一百五十苑** **杂号一百五十一苑** **杂号一百五十二苑** **杂号一百五十三苑** **杂号一百五十四苑** **杂号一百五十五苑** **杂号一百五十六苑** **杂号一百五十七苑** **杂号一百五十八苑** **杂号一百五十九苑** **杂号一百六十苑** **杂号一百六十一苑** **杂号一百六十二苑** **杂号一百六十三苑** **杂号一百六十四苑** **杂号一百六十五苑** **杂号一百六十六苑** **杂号一百六十七苑** **杂号一百六十八苑** **杂号一百六十九苑** **杂号一百七十苑** **杂号一百七十一苑** **杂号一百七十二苑** **杂号一百七十三苑** **杂号一百七十四苑** **杂号一百七十五苑** **杂号一百七十六苑** **杂号一百七十七苑** **杂号一百七十八苑** **杂号一百七十九苑** **杂号一百八十苑** **杂号一百八十一苑** **杂号一百八十二苑** **杂号一百八十三苑** **杂号一百八十四苑** **杂号一百八十五苑** **杂号一百八十六苑** **杂号一百八十七苑** **杂号一百八十八苑** **杂号一百八十九苑** **杂号一百九十苑** **杂号一百九十一苑** **杂号一百九十二苑** **杂号一百九十三苑** **杂号一百九十四苑** **杂号一百九十五苑** **杂号一百九十六苑** **杂号一百九十七苑** **杂号一百九十八苑** **杂号一百九十九苑** **杂号二百苑** **杂号二百零一苑** **杂号二百零二苑** **杂号二百零三苑** **杂号二百零四苑** **杂号二百零五苑** **杂号二百零六苑** **杂号二百零七苑** **杂号二百零八苑** **杂号二百零九苑** **杂号二百一十苑** **杂号二百一十一苑** **杂号二百一十二苑** **杂号二百一十三苑** **杂号二百一十四苑** **杂号二百一十五苑** **杂号二百一十六苑** **杂号二百一十七苑** **杂号二百一十八苑** **杂号二百一十九苑** **杂号二百二十苑** **杂号二百二十一苑** **杂号二百二十二苑** **杂号二百二十三苑** **杂号二百二十四苑** **杂号二百二十五苑** **杂号二百二十六苑** **杂号二百二十七苑** **杂号二百二十八苑** **杂号二百二十九苑** **杂号二百三十苑** **杂号二百三十一苑** **杂号二百三十二苑** **杂号二百三十三苑** **杂号二百三十四苑** **杂号二百三十五苑** **杂号二百三十六苑** **杂号二百三十七苑** **杂号二百三十八苑** **杂号二百三十九苑** **杂号二百四十苑** **杂号二百四十一苑** **杂号二百四十二苑** **杂号二百四十三苑** **杂号二百四十四苑** **杂号二百四十五苑** **杂号二百四十六苑** **杂号二百四十七苑** **杂号二百四十八苑** **杂号二百四十九苑** **杂号二百五十苑** **杂号二百五十一苑** **杂号二百五十二苑** **杂号二百五十三苑** **杂号二百五十四苑** **杂号二百五十五苑** **杂号二百五十六苑** **杂号二百五十七苑** **杂号二百五十八苑** **杂号二百五十九苑** **杂号二百六十苑** **杂号二百六十一苑** **杂号二百六十二苑** **杂号二百六十三苑** **杂号二百六十四苑** **杂号二百六十五苑** **杂号二百六十六苑** **杂号二百六十七苑** **杂号二百六十八苑** **杂号二百六十九苑** **杂号二百七十苑** **杂号二百七十一苑** **杂号二百七十二苑** **杂号二百七十三苑** **杂号二百七十四苑** **杂号二百七十五苑** **杂号二百七十六苑** **杂号二百七十七苑** **杂号二百七十八苑** **杂号二百七十九苑** **杂号二百八十苑** **杂号二百八十一苑** **杂号二百八十二苑** **杂号二百八十三苑** **杂号二百八十四苑** **杂号二百八十五苑** **杂号二百八十六苑** **杂号二百八十七苑** **杂号二百八十八苑** **杂号二百八十九苑** **杂号二百九十苑** **杂号二百九十一苑** **杂号二百九十二苑** **杂号二百九十三苑** **杂号二百九十四苑** **杂号二百九十五苑** **杂号二百九十六苑** **杂号二百九十七苑** **杂号二百九十八苑** **杂号二百九十九苑** **杂号三百苑** **杂号三百零一苑** **杂号三百零二苑** **杂号三百零三苑** **杂号三百零四苑** **杂号三百零五苑** **杂号三百零六苑** **杂号三百零七苑** **杂号三百零八苑** **杂号三百零九苑** **杂号三百一十苑** **杂号三百一十一苑** **杂号三百一十二苑** **杂号三百一十三苑** **杂号三百一十四苑** **杂号三百一十五苑** **杂号三百一十六苑** **杂号三百一十七苑** **杂号三百一十八苑** **杂号三百一十九苑** **杂号三百二十苑** **杂号三百二十一苑** **杂号三百二十二苑** **杂号三百二十三苑** **杂号三百二十四苑</**

其四,详细著录了文书的有关情况和内容。“荣目”在每件写本的标题下都记述了该件的残缺情况,所存行数;若是文书则概述其事由或内容。在不少写本的标题下记载了该号文书的来源。若一号由两件以上残片组成,则详记各片之间的联系。如**杂录残卷一**之《唐瀚海军典抄牒状文事目历》标题下注云:“本号揭自一个经帙,粤为佛典残片,月是帙边残纸,隕有题名曰‘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第四帙十卷,古、若’。悦一匀为本文书。”以下分记**悦一匀**各片所存行数、内容

等。上述情况为读者全面了解、正确认识和使用文书提供了可靠的背景材料。其中有些情况,若非查阅过原卷,无由得知,益显珍贵。此外,作者还尽量向读者提示每件写本中的学术信息。如文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寺名、朱笔、印鉴、押记等多能注出,以供读者参考。

其五,向读者提供了大量中外研究信息。作者在编目和以往的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研究资料。这些资料都被详细地著录在有关该号写本的标题下。如 ~~敦煌掇瑣~~ 号,作者著录的中外研究文献八种。“荣目”中著录的研究文献,有些在国内不易检索到。这些学术信息极大地节省了读者的翻检之功,使他们得以迅速地抵达学术前沿,并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荣目”所以能够取得上述成就,固然与作者在编目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分不开,更是作者学术积累的结晶。作者长期致力于敦煌写本的研究,朝夕于斯,对敦煌写本的具体情况和有关学术信息均十分熟悉,故能在编目过程中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见他人所未见,识他人所不识。

当然,任何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都难免存在不足。“荣目”所收写本多非完帙,且在编目时大部分未公开刊布,学术界对这批写本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在这样的条件下,“荣目”就更难做到尽善尽美。作者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和补充之处。

其一,在内容的收录方面有漏收现象。如前所述,“荣目”收录的并不是 ~~敦煌掇瑣~~—~~敦煌掇瑣~~ 号全部文献,而只是其中的非佛教部分。正像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佛教与世俗文书在敦煌写本中有时很难区分。这当然为作者确定收录范围带来不少困难。但我们对作者提出这样的要求似乎并不过分,即能够确定为非佛教文献的应全部收入;对于兼有佛教和世俗两类性质的文书应确定统一的标准,同类文书要收就全部收入,否则就一件也不收。但“荣目”未能做到这一点。如佛教徒在举行各种斋会时念诵的斋文,就是具有佛教文献和世俗

文书双重性质的写本。从“荣目”实际收录的内容来看,是确定收入这类文书,但却未能将这类文书全部收入。仅笔者所知漏收的这类文书即有 ~~员媛~~《亡斋文》、《僧患文》、~~员媛~~《设斋回向文抄》、~~员媛~~背《患差文》、~~员媛~~《亡僧文》、~~员媛~~背《愿文》、~~员媛~~《愿文》。另,“设供疏”也是作者确定要收入的文献,但 ~~员媛~~背之《设供疏》亦未能收入。此外,~~员媛~~背《失名道经》、~~员媛~~《失名道经》、~~员媛~~《道经卷题》、~~员媛~~《失名道经》、~~员媛~~《道书》、~~员媛~~《癸亥年八月十四日祭文》(“荣目”~~员媛~~号之内容似应属 ~~员媛~~、~~员媛~~《人名(唐再再)》、~~员媛~~《杂写(马僧正)》、~~员媛~~《人名(谈樵)》、~~员媛~~《残文书》等亦均属非佛教文献,也未能收入。

其二,在文书的定名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方面比较大的问题是把几件斋文定名为“施舍疏”或“疏”。在敦煌文献中,“施舍疏”又名“施入疏”,是施主在向寺院施入物品时使用的文书。这类文书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很多。兹录 ~~员媛~~背中的一件:

~~员媛~~布壹丈摇施入修造

~~员媛~~右弟子所施意者,己身染患,圣

~~猿媛~~力加持,似得减损。今投道场,请

~~源媛~~为念诵。

~~缘媛~~辰年正月卅日女弟子王氏疏。

如上所引,这类文献在最后一般要写明“某某疏”,当时人也将这类文献称为“疏”。如上引《施舍疏》后即有荣照所书“已前壹拾柒道疏”。斋文是当时在佛教徒举行的各种斋会上宣读的文字,其实例和有关情况可参看拙作《敦煌写本斋文及其样式的分类与定名》<sup>①</sup>。要之,“施舍疏”和斋文在敦煌写本中是性质、作用完全不同

①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员媛~~年第 ~~猿~~期, ~~猿~~至 ~~猿~~页。

的文献。但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两类文献的区别,在被标名为“施舍疏”的文献中,既有与上引《施舍疏》性质相同者,也有斋文。如 **杂图还苑**《为故僧正和尚设斋舍施回向疏》、**杂图元园**《景福年间**愿园—愿猿**施舍回向疏》,都是真正的“施舍疏”。而 **杂图元园**《某人为亡女六七追念设斋施舍疏》,就不是“施舍疏”,而是《亡女文》。其它如 **杂图元恩**《某人为亡考初七追福设斋施舍疏》,实为《亡考文》,**杂图愿园**《月《为亡父母兄弟姊妹施舍疏等文样》,实为《亡斋文》。另 **杂图恩恩**《某人为亡妣亡考设斋追福疏》、**杂图还苑**《为郎君七七追念设斋追福疏》、**杂图元园**《追福疏》等,也都不是“疏”,而是《亡斋文》。

文书标题值得商榷的还有 **杂图还苑**《社斋文》,从其内容看,并非社斋文。标题下又注云:“有子目‘亡夫’。”《社斋文》是一篇斋文的名称,它不能像由多篇斋文组成的写本可以有子目。反过来,有子目的写本就一定不只一篇斋文,不能仅以一篇斋文的标题《社斋文》作为这个写本的标题。**杂图还苑**《祭宅文》,从此件残存内容看,更像是《祭文》。**杂图元恩**《发愿文》,从其内容看,实为《患文》。

文书定名方面的另一问题是对有的同类文书标名不统一。如 **杂图还苑**标题为《患文等文样》,**杂图恩恩**标题为《亡孩子文等文样》;而 **杂图元园**背和 **杂图元恩**的标题则为《愿文文范》,“文样”和“文范”似乎完全可以统一为一个名称。类似不统一的现象在其它斋文的标名上也可看到。同类文书标名的规范和统一,对按馆藏编号顺序编排的目录来说,可以提高其分类索引的参考价值,同时又能为将来编制分类目录创造条件。

其三,在对文书内容的著录方面,也存在不足。每件文书标题下著录的内容虽多数能够遵循体例,但也偶有疏漏,如 **杂图还苑**即漏注了行数。至于对各写本纸质和书法的描述,则只见于少数写本,随意性较强,似无一定规范。实际上由于多数读者无缘得窥原卷,对纸张情况的描述还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此外,在每个标题下著录的

内容之次序,也间有不一致之处。

上述不足不过是笔者的一些很不成熟的想法,不一定正确。而且,即使存在一些不足,“荣目”也仍然是一部治敦煌学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和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敦煌学专著。

荣新江教授是1985年10月至1986年10月应英国图书馆之邀,为该馆收藏的敦煌文献进行编目,最后编成了“荣目”。英国图书馆的这种作法对于加快该馆敦煌文献的编目速度,提高编目工作的质量,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提倡。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就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学术著作在哪里出版都是一样的。但对大陆学者来说,由于书价的差异和流通渠道的不畅等因素,实际上很难得到在港澳地区出版的学术著作。所以,“荣目”虽然已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但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解决大陆学术界的需求,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我们希望大陆能有出版社早日担负起推出“荣目”大陆版的重任,使这部对敦煌学界、历史学界都具有重要价值的目录著作能在大陆广为流传。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 十一、《敦煌学大辞典》述评

由全国二十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名敦煌学研究者耗时十几年编纂而成的《敦煌学大辞典》，终于在 1990 年 12 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项工作是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与上海辞书出版社联合发起，组成编纂敦煌学大辞典的委员会，由季羨林先生任主编，唐长孺、段文杰、宁可、沙知、严庆龙诸先生任副主编。

这部辞典共收敦煌艺术、敦煌遗书与敦煌学研究等方面六十余个门类的词条六千九百二十五条，收有彩色图版一百二十三幅，随文插图六百二十六幅。另有附录十个。其编排方式为分类编排，但将“敦煌”、“莫高窟”、“敦煌遗书”、“敦煌学”等二十几个通贯性条目置于卷首，以便读者了解敦煌学的一般情况。书末附有词目笔画索引及汉语拼音索引。

《敦煌学大辞典》各主要类别的排列次序为：石窟考古、各时代艺术·代表窟、彩塑、本生故事画·因缘故事画·说法图、经变画、佛教史迹画·瑞像图·菩萨画像、飞天画像·神道画像、供养人画像及其他、建筑画、生产生活画·山水画、图案、服饰、壁画技法、石窟保护、藏经洞遗画、音乐·舞蹈、书法·印章、地理、历史人物、政治·法

律·军事·经济、书仪·社邑·民俗·写经题记、民族·吐蕃藏文·回鹘文·于阗语·粟特语·西夏文·梵文、语言·文学、版本·教育·体育、算学·天文历法·医学·占卜、寺院、佛教典籍、道教、摩尼教、景教典籍、四部书、公私收藏·编号、著作·刊物、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展览、近现代人物。在各个类目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排列,但未列小类标题。

十个附录分别为:西汉敦煌郡示意图、唐代前期瓜沙二州示意图、曹氏归义军时期瓜沙二州示意图、唐代瓜沙二州驿站示意图、唐代前期沙州西部示意图、归义军时期沙州西部示意图、唐宋时期敦煌城绿洲诸乡位置及渠系示意图、莫高窟石窟编号对照表、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敦煌学纪年。此外,在词目笔画索引和汉语拼音索引之后,还附有莫高窟石窟位置图。

通观《敦煌学大辞典》,我以为这部辞书有以下特点值得一提。

### 员援这是一个创举

如所周知,敦煌石窟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是人类文化史上罕有的宝贵遗产。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珍视,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其进行了研究和阐发,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敦煌学。如今,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学术界、知识界迫切需要一部有关敦煌学的专科辞典,以便人们了解、掌握有关敦煌学的基本知识及其研究状况。

另一方面,自 员愿年 至今,经过国内外数代学者的研究,敦煌的各个领域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编纂一部具有一定水平的敦煌学大辞典的客观条件也已经成熟了。

但由于这是一项前人还没有做过的工作,没有先行者的经验可供借鉴,词条的拟定、类目的设置、词条与类目的编排等均属初创,其困难和难度可想而知。参与《敦煌学大辞典》编纂的一百多位敦煌学研究者在完全无所因循的情况下,知难而进,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



力,集中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浓缩为二百万字,六千多个条目,终于以辞书的形式将一门已有近百年研究史的学科的全面情况反映了出来,填补了辞书编纂领域的一项空白。

《敦煌学大辞典》的首创性在词条的拟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词条的拟定是将一门学科以辞书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关键步骤。这项工作耗费了辞书组织者和编纂者的大量心血,许多词条、词头的确定均属首创。词条的增加和词头名称的修改几乎贯穿了整个辞典编纂的全过程。

### 圆爰具有很高的学术性

首先,《敦煌学大辞典》组织者遴选撰稿人的原则是由各方面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相关领域的词条。所以,辞典中的许多词条都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高度浓缩。如有关敦煌契约的词条撰写者为沙知先生。沙先生整理、研究敦煌契约已有二十多年,著有《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和多篇相关论文,《敦煌学大辞典》中有关敦煌契约的词条凝聚着沙先生多年整理、研究敦煌契约的心血,这些词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可以代表国际学术界有关这一课题研究的最高水平。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有关敦煌佛教典籍词条的主要撰稿人为方广铝博士,方博士整理、研究敦煌佛教典籍也已有二十年,取得的成就为世所公认;再如,有关敦煌天文历法词条的撰写者为邓文宽研究员,邓先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整理和研究敦煌天文历法文献,是国内外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就最大的学者;再如有关敦煌书仪词条的撰写者为赵和平教授,赵教授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即从事整理、研究敦煌书仪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又如,有关国外敦煌学著作、刊物词条的主要撰稿人为荣新江教授,荣教授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游历了与敦煌学有关的主要国家,对国际敦煌学的状态最为熟悉;由这样一些学者所撰写的词条,当然会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敦煌学大辞典》的学术性还表现在,由于它的编纂工作推动了敦煌学研究的深入,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是由撰写词条的需要引起的。如李正宇研究员对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与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等课题研究的开展,均与撰写《敦煌学大辞典》相关词条有关,李先生有关上述课题的研究都取得世所公认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也在《敦煌学大辞典》中得到了反映。又如对斋文、愿文、出唱等问题的研究,也都是由撰写词条的需要引发的。类似例子还有一些,恕不备举。

最后,《敦煌学大辞典》的学术性还表现在它反映了近百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这一学科的成果。由于敦煌学具有多科性的特点,其研究领域异常广泛,而且有些领域国外的研究还占有一定优势,所以,尽管《敦煌学大辞典》的组织者在安排撰稿人方面已作了最大努力,仍会存在部分词条撰写者个人的研究水平在某一方面尚未达到某一领域的最高水平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辞典的组织者要求撰稿人充分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反映到词条中。统观《敦煌学大辞典》所收的词条,可以说大部分词条达到了这一标准。

### 援内容全面

上已述及,敦煌学是一个多科性的学科。每一个敦煌学研究者都无法精通敦煌学所涉及的所有学科;甚至全面了解各个学科的研究状况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敦煌学大辞典》集中了全国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专家的集体智慧,将敦煌学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和研究状况都以词条的形式反映了出来。从前列《敦煌学大辞典》主要类别目录,已可略知《敦煌学大辞典》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领域和所有主要方面。对于个别不适宜以词条方式反映的方面,编纂者又特设十种附录反映之,使其内容更加全面。

《敦煌学大辞典》的全面性还表现在它总结了近百年来国内外

研究敦煌学成果。这种总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前所述,将国内外有关成果溶入词条之中,二是辞典专设了著作·刊物和近现代类别,附录中还有敦煌学纪年,从而将近百年来国内外有关敦煌学的著作和刊物、从事过敦煌学研究的主要人物,以及敦煌学研究史等都具体、全面地反映了出来。

可以断言,没有任何一个敦煌学研究者具有《敦煌学大辞典》这样全面的知识。所以,《敦煌学大辞典》不仅是学术界了解敦煌学的重要途径,也是所有敦煌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

**源**既可当工具书查,也可当入门书读。

《敦煌学大辞典》作为一部辞书,可以当作工具书来查,自然不能成为它的特点。其特点在于还可当作入门书来读。敦煌学由其学科特点决定,学习和掌握其学科内容与研究状况是初学者最为头疼的问题。而如不解决这一问题,又无法登敦煌学之堂奥。在《敦煌学大辞典》出版之前,没有一种敦煌学著作可以解决初学者所遇到的这个难题。若干年来,数代敦煌学研究者为解决这个问题不知耗费了多少宝贵精力。现在有了《敦煌学大辞典》,初学者只要细心研读它,就可对敦煌学的内容和研究状况有一个初步的概括的了解。而这部辞书的分类编排方式更是有利于初学者按步就班地学习和掌握敦煌学的内容,所以,《敦煌学大辞典》是初学者最佳的入门书。

当然,由于《敦煌学大辞典》的编纂者所从事的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现在看来,至少有这样一些问题可供修订时参考。

**源**词条分布不够均衡。近百年来,敦煌学的研究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与敦煌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相比,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而《敦煌学大辞典》编纂者只能依据现有的研究状况拟定条目,研究充分的领域和方面词条就多一些,研究不足的领域和方面词条就少一些。所以,《敦煌学大辞典》虽然可以说全面反映了国

内外敦煌学的研究状况,但却还不能说全面反映了敦煌文化遗产的内涵。随着敦煌学研究的进展,必然会有许多词条可以补充进来。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至少宗教部分和少数民族语言部分显得有些薄弱。

**编排**尚待改进。敦煌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而编纂有关敦煌学的专科辞典又属初次,所以,采用何种编排方式是编纂者颇感踌躇的问题。目前采用的分类编排的方式虽有便于读者的一面,却给编者带来了很多麻烦。由于敦煌学的内容十分复杂,不少内容具有多重属性,一些内容的归属目前尚不能确定,对这些内容的分类和归类是一项极为艰苦细致的工作。编纂者虽然在这一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有少量词条的编排现在看来不够严密,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

**收录**新成果的吸收不够完备。虽然《敦煌学大辞典》的资料截止日期基本上为**1980年 5月**,但有些词条实际写于八十年代,以后未及改写。而敦煌学又是一门发展很快的学科,现在看来,个别词条已显得不够完备,甚至可以重写了。

(原载《中国佛学》第三卷第一期,**1989年**)

## 十二、评《唐末五代变革期の政治と經濟》<sup>①</sup>

此书是继作者之《均田制の研究》、《中国古代の身份制》、《中国古代の家と集落》后出版的第四部论文集,其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前编主要讨论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唐后期五代动乱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政治形态的演变,后编则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唐宋之际敦煌地区社会变迁、赋税变化等经济问题。最后附有作者关于九品中正制的论文。书中的论文发表时间不一,有的曾被译成中文,如前编中之“藩鎮親衛軍の權力構造”(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3至185页)和后编中之“敦煌社会の変質”(部分译文载《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第183至185页)。作者在结集时将这些论文编辑成章节形式,并补充了一些内容 and 研究信息。

前编题为“唐代后期の政治過程と政治形態”,分为五章和两篇附录。其中附录一“中国における封建国家の形態”是作者在“国家權力の諸阶段——历史学研究会1994年度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不具有实证研究的性质,而是在综合当时日本学界的相关研

---

<sup>①</sup> 堀敏一著,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11月,第183至185页。

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认识。这些基本认识的要点是：在社会形态方面，唐宋之间是“农奴制”到“封建制”的转变时期；在政治结构方面，唐宋之际是中古贵族政治崩溃和近代君主独裁制度的确立时期；在经济结构方面是自耕农大量破产和佃户制成为基本“生产关系”的时期。如所周知，近年备受中日学者关注的“唐宋变革论”为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前驱者内藤湖南所创立，其基本观点是唐宋时期在政治上处于从贵族政治时代向君主独裁政治时代转变的时期，这种看法得到了很多日本学者的支持，并用具体的研究不断地丰富和充实这一理论，使这一理论逐渐扩充为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解释体系。直到今天，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仍被日本学界权威人士视为定论。当然，对唐宋变革的解释在日本学界也并非只此一派，我们看到，以上介绍的堀敏一先生对“唐宋变革论”的概括就已经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不完全一样，已经从单纯的政治结构角度的观察扩充到包括对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等方面的观察。

应该说明，中国学界对唐宋变革的性质也有自己的诠释体系。限于篇幅，笔者不拟在这篇书评中对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做正面评价，个人对唐宋变革的认识也准备另作专文。这里只想指出，堀敏一先生以后的很多研究成果包括此书所收的多篇论文，都是上述他所概括的对“唐宋变革”的基本认识的具体化和展开。通过具体的研究来进一步论证和深化“唐宋变革论”，是这本论文集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思路。

第一章“藩鎮内地列置の由來について”，系作者 1945 年结集时所撰新稿，介绍了在安史之乱中藩镇设置的概况，以及河北三镇等半独立性藩镇形成的背景和经过，以作为阅读以下各章的知识背景。

第二章“藩鎮親衛軍の權力構造——唐から五代へ——”发表

于**吴昊**年,作者试图通过考察藩镇兵力的核心——亲卫军来探究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以及唐末战乱的背景和五代时期藩镇的变化。在此文发表之前,日本学者已经分别对唐代和五代的亲卫军做过探讨。作者指出牙军起初是节度使对抗唐王朝的精锐与核心力量,随后与骄宠他们的节度使发生矛盾,并使节度使地位不稳,这是河北藩镇不能完全摆脱唐王朝的原因。作者继而考察了牙军以外的藩镇亲卫军,即节度使的个人私兵——家兵和节度使身边的亲事兵的有关情况。接着,作者将唐代和五代贯通,指出与总和藩帅对立的唐代牙军不同,五代的牙军与作为藩帅的各王朝的始祖们有密切的关系,在创建王朝时,他们是集权力量的核心,这时的牙兵实际已经具有藩帅的私兵的性质。在他们眼里,主人的地位重于天子。作者认为五代的这种“武人政治”现象表明唐代的身份制度已经崩溃,是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过渡期间的政治形态。作者认为,宋朝初年的统治核心由新兴的地主和富商阶层组成,而唐后期的藩镇已开始和“土豪”、富商阶层“结托”,一些商贾通过贿赂藩镇谋取官职,这些都促进了新兴地主和富商阶层的发展。而宋朝的禁军和文官制度都是在借鉴五代时期藩帅的亲军与幕僚的基础上建立的。时至今日,作者对藩镇亲卫军及其演变过程的考察和分析仍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对五代“武人政治”现象的分析,似有推阐过度的嫌疑;对宋朝统治核心成份的论断,也有概念化的倾向。

第三章“黄巢の叛乱”发表于**吴昊**年。这篇长文对黄巢“叛乱”的背景和经过做了详细的考察,对黄巢集团的性质和“叛乱”的意义也做了分析,认为黄巢集团是均田制崩溃以后新兴的地主和富商的代表,他们所领导的“叛乱”起到了促使旧贵族政治衰落和催生新的权力世界诞生的作用。

即使抛开“唐宋变革论”不谈,把黄巢起义定性为叛乱的理由也显得不够充分。作者对黄巢集团核心成员成份的考察无疑是正确

的,问题在于作者忽略了参加黄巢起义的主体成员的成份,忽略了黄巢起义军的主张和对唐王朝所采取的措施,而只有综合考虑以上各方面的因素,才有可能对黄巢起义的性质和意义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判断。

第四章“朱全忠政權の性格”发表于 1955 年,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朱全忠政权特质的探讨,进而分析黄巢起义后的历史走向。作者仍然是从考察朱全忠及其集团核心成员的身份入手,指出早期朱全忠政权的核心成员的成份是以出身农民军者为主体,而后期有不少藩镇的降将参加到朱全忠政权中来。后梁建立前后,虽然诛杀了一大批唐朝当权的旧贵族,但其政权的核心仍是由唐朝的没落贵族和新兴的“知识阶级”混合组成,作者据此认为朱全忠时代是新旧两种势力交替的过渡时代,这种过渡特征还表现在后梁沿袭了唐朝的藩镇体制,并没有完成重构中央集权制度的任务。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直至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作者对朱全忠政权特质的考察,观察角度是得当的,论据是充分的,因而对朱全忠政权特质和时代特征的把握也是准确的。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我以为作者对朱全忠政权特质的考察,可能就事论事更好一些。作者当然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试图将对朱全忠政权特质的考察纳入到“唐宋变革论”的解释框架之中。所以,作者的“过渡时代”实际指的是从贵族政治到君主独裁政治的过渡。如果把作者对朱全忠政权特质的具体考察和这样大的一个命题联系在一起,其观察角度就显得狭小了。因为要深刻把握唐末五代战乱的特质和地位,必须和其它朝代末期的战乱如秦末的战乱、汉末的战乱甚至元末的战乱和明末的战乱等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对新王朝核心成员成份的比较。其实,在上述王朝末年的战乱中建立的新王朝中,由所谓“新旧两种势力”,即前朝的没落贵族和新兴的“知识阶级”组成新王朝的统治核心的现象绝不仅仅限于后梁



政权。

第五章“第二次大戦後の唐代藩鎮研究”是作者在结集时委托高瀬奈津子所撰,简要介绍了二次大战以后至 1945 年中日学者关于唐代藩镇研究的情况,并附有相关研究论文目录。

附录二“唐末諸反乱の性格——中国における貴族政治の没落について——”,发表于 1956 年,也是试图通过对“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黄巢起义等事件过程的考察,说明贵族制度的衰落和新兴地主、富商阶层的兴起。

后编题为“唐・宋間の敦煌・吐鲁番における經濟關係”,分为四章。

第一章“唐宋間消費借貸文書私見——契約書の書式と簡易なる契約——”,发表于 1956 年,主要考察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的形式,将其分为正式的契约文书、附在正式契约文书尾部的简略化契约文书和便物历等三种形式。

第二章“唐代における田土の賃貸借と抵当・質入れとの關係——租佃契約から典地契約にいたるまでの諸形態——”,发表于 1956 年。关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租佃契约的研究,成果颇多。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将这些契约分为两类,一类具有典租性质,就其经济关系而言,是租田人利用租价(高利贷)剥削田主;另一类是田主剥削租田人,属于“真正的封建租佃契约”。作者认为应该存在第三类租佃契约(上述两类的中间状态),即自耕农之间的土地互佃,还有自耕农在自有土地之外佃种他人的小块土地,以作为生活的补充。虽然作者未能提出足够的证据,但这个看法却是符合逻辑的推论。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将有助于租佃契约和租佃关系认识的深化。作者还从租佃契约中有关对义务和违约处罚的规定角度,将租佃契约分为单方面约束或处罚田主、约束或处罚田主与租田人双方和单方面约束或处罚

租田人等三种情况。又根据交付租价的先后将租佃契约分为提前支付租价（租田人地位高）、分割租价（田主与租田人地位对等）和收获后支付租价（田主地位高）等三种情况。作者的这种区分虽然无助于认识租佃契约的经济实质，但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租佃契约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作者还考察了典租性质的租佃契约和借贷的关系，揭示出不少借债人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将土地典租出去，有的人甚至是以典租土地为前提方能举债。作者还对一些租佃契约的具体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纠正了一些对文书内容的错误解释，也修正了作者自己以前关于租佃契约研究的看法，体现了勇于自我批判的严谨学风。

第三章“敦煌社会の变质——主に歸義軍時代の民衆社会を中心として——”发表于1954年，试图利用敦煌文献考察敦煌社会的变迁，并把敦煌社会的变迁当作唐宋社会的变革组成部分。作者利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户籍文书说明唐前期敦煌的社会是以政府控制下的均田农民（自耕农）为主体，这些农民在政府的基层行政机构“里”的严密控制之下，官府向他们征收租庸调和杂徭，与农田相关的水利设施的兴修亦由官府组织。唐中叶以后，户籍记载的死亡和逃走的人口增多，表明均田制和与之相关的租庸调制已难以维持。接着，作者利用敦煌文献中的契约文书探讨了均田制破坏以后，农民的贫富分化加剧。部分农民因缺乏种子和粮食而举债，又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而典租或出卖土地变为赤贫，沦为雇佣劳动者；另一部分富裕农民则通过购买土地成为大土地所有者。从观点上说，作者的上述工作至少对中国学界来说谈不上是什么创见，但结合出土户籍和契约来论证这样一个过程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工作。问题比较大的是作者关于敦煌民众自治组织的论述。作者认为，随着均田制的瓦解，为民众自治组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从事春秋二社祭祀与经济互助等活动的社邑，就是唐后期五代敦煌地区按地域组成的民众自治

组织。近年的研究表明,唐后期五代宋初在敦煌地区广泛流行的从事互助、祭祀与佛事等活动的社邑(私社),是由某一地域内部居民自愿结成的民间团体,并非由某一行政区内的全体居民组成;虽然某些私社兼具教化功能,但从整体上看不具备地方自治组织的特征。作者所引用的伯三三七九“显德五年二月社录事都头阴保山牒”是有关官社的记载,这件文书所反映出的该组织所具有的团保防盗职能和与官府的关系,都不能用来说明私社的特征<sup>①</sup>。

第四章“中唐以后敦煌地域における税制度”发表于**贞观**年,主要讨论归义军时期赋税的名目,并对其主要名目官布、地子和柴草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考察。作者最早注意这个问题是在**国**世纪八十年代,其成果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近年,刘进宝、雷绍锋相继对归义军时期的赋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较而言,作者的新作虽然资料比较完备,但新意不多。

从以上简要的介绍可以看出,堀敏一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特色。

第一,作者注重理论模式对具体研究的指导作用。我们看到,自**贞观**年以来,堀敏一先生的研究都是自觉地在“唐宋变革论”的指导下进行,所关注的问题也都是与这种理论模式相关的重大问题。即使是小问题,也是从“唐宋变革论”这个大处着眼的。当然,注重理论模式的指导在具体研究中也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在史料解释方面,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让史料服从于逻辑;在问题的选择方面,可能会出现忽略一些重要现象和问题等等。以上简要的介绍表明,在堀敏一先生的研究中,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虽然如此,理论模式仍然是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长时段的复杂历史现象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思想武器。如果没有理论模式的指

<sup>①</sup> 参看拙稿《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商榷,《中国史研究》**国**年**明**期。

导,我们的研究就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面对复杂的问题和长时段问题时就会显得束手无策。特别对中青年学者来说,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注意确立自己认识中国历史的理论模式,是提高唐史研究水平的当务之急。

第二,堀敏一先生的研究在论证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其一是擅长通过具体事例引出一一般性的认识,如以上介绍的作者关于藩镇牙军的研究、关于敦煌社会变迁的研究,都是通过精心选择的典型性史料导出一般性认识,这种论证方法避免了大量罗列史料使文章臃肿难读的弊端,给人以简单明快的感觉。其二是尽可能地保持理论模式的指导和实证研究的平衡。在理论模式的指导下,具体事件、过程的研究都采用实证的方法,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现逻辑优先的趋向。采用这种方法,即使出现对事件性质和意义解释的误差,对事件本身的考察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上所述,我们虽然对堀敏一先生关于黄巢起义的性质和意义的论断不能完全认同,但并不影响他关于黄巢起义背景、过程和年代的具体考察自身的价值。

第三,作者的研究视野是广阔的。首先是观察时限较长,将整个中古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次是研究的领域比较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最后是研究的地域比较广阔,如他对中日的关系的研究,是把整个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结构来进行考察的。由于注重理论模式的指导,又具有广阔的视野,使他的研究在整体上和宏观上有一种磅礴的气势,可以看到我们在狭小的范围内难以看到的历史现象和问题,发掘出史料所蕴涵的深层次内涵。

相比较而言,我们从堀敏一先生的研究方法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唐史研究无疑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从整体上看,选题有边缘化倾向,研究有具体化趋向;考察的时限

多以唐五代为界,上不及南北朝,下未及宋代;研究的领域多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某一专门领域,缺乏整体和宏观的研究。对以往关注不多的边缘性课题进行研究和对某一专题进行深入研究都是必要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要提高唐史研究的水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开阔视野。首先是延长观察时限,即使研究唐代某一方面,至少应该上溯到南北朝,下延到宋代,这样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唐代的地位和特点。其次是拓宽研究领域,打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学科领域的界限。很多问题,尤其是唐后期五代宋初的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很短的时段,局限于某一领域,往往不易看清问题的原因和实质,必须将其放到更长的时段和更广阔的领域来观察,才能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关于唐宋变革的认识,也同样需要开阔视野。

笔者认为,目前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不能夸大唐宋变革的意义。其理由是:

其一,与唐代前期相比,宋代社会就其本质和核心来说是重构。一是中央集权的重构(中央重新强化对地方的控制),二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重构(君主强化对中央的控制)。虽然宋代君主专制的重新确立和中央集权的重新确立并不是唐前期制度的简单重复,但其实质是相同的。

其二,唐宋时期变化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到元代又逆转了,这种逆转的趋势又为明清所沿袭。这样看来,所谓唐宋变革就整体而言就只是唐宋几百年间的效应,不具备更长时段的特质。如果试图用唐宋变革来说明中国古代整个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从更长时段来看,就显得不恰当了。

其三,宋朝控制的范围有限,南宋时更是半壁江山,这是其变化得以凸显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还要看到当时北部中国的情况,那里不仅和宋代的变化不同步,而是原地踏步或后退了。

考虑到以上几种因素,似乎可以说,不少研究者把唐宋变革的意义夸大了。

所以,要真正看清唐宋变革的实质,也要求我们进一步开阔视野,至少应该把考察时限延长到南北朝至元明,把观察地域扩大到宋中央政府未能控制的地区。

(原载《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5月)

### 十三、评《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下)<sup>①</sup>

此书是作者的论文集,其内容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对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和年代,以及敦煌文献的分类等有关敦煌学的一般性问题的探讨;第二组是对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也是这本论文集的主体部分;第三组包括三篇文章,一是《对黄编〈六百号敦煌无名断片的新标目〉之补正》,二是《吐鲁番出土汉文佛典述略》,三是《日本对敦煌佛教文献之研究》(吴因忠、吴因源)。此外,卷首有编辑说明、作者简介、各篇论文的提要 and 季羨林先生所写的序言。《序言》对作者的学风和论文的水平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提要”则为读者了解各篇主旨提供了便利。

如所周知,保存数万件敦煌文献的藏经洞是在1900年被发现的,由于对这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导致了一门新学问——敦煌学的兴起和发展。但当时人并没有留下为什么要把敦煌文献放进藏经洞,何时放入藏经洞的直接记载,遂使这两个问题成为千古之谜。由于这两个问题对于从总体上把握敦煌文献的性质,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分析藏经洞出土资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长期以来

① 方广锬著,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癸卯年愿月,源原页。

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主要存在两种解说,一是“废弃说”,一是“避难说”。“废弃说”认为藏经洞中保存的文献和其它物品是时人的“神圣废弃物”,此说的首创者为斯坦因;“避难说”则认为藏经洞是为避外敌入侵而仓皇封闭的,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伯希和。作者的《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对“避难说”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如果是“为避难而收藏”,“对于佛教寺庙来说,最珍贵的文献自然是佛教大藏经。”作者的考察证明当时敦煌既有手写本的大藏经,也可能有刻本的大藏经(《开宝藏》),还至少有两部以上金银字大藏经。但将藏经洞中保存的佛教典籍与《开元大藏经》比较,所缺甚多,仅占其全部内容的七分之一左右,很多大部头佛典都是帙残卷缺。另一方面,有的佛典又是复本奇多,还有很多很难被看作珍宝的未入藏佛典、疑伪经和过时的契约等文书。在外敌威胁时,敦煌僧人竟然将完整的大藏经和金银字大藏经弃而不顾,只把上述文献当作宝贝坚壁收藏,确实是令人难以理解。作者认为,藏经洞中的资料只能是在当时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的“废弃物”。其背景是:进入北宋以后,随着对外交通的发达,敦煌经典的来源日益充裕,产生了淘汰残旧经卷的需要。于是在曹氏政权的某一年,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寺院藏书大清点,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与废纸,以及用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统统集中起来,封存在洞窟中。作者还认为,所以要将这些过时的文献等集中封存,与中国人自来敬惜字纸的习俗和佛教徒处理残破经卷的传统等因素有关。应该承认,作者对“避难说”质疑是有力的,对“废弃说”的论证也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深入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思考。1992年,荣新江教授发表《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的原因》(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依据斯坦因的报告考出在藏经洞发现时,汉藏文佛典是分帙整齐地存放的,其它文字材料和绘画



也都是分类包在一起,其中包括完整地包在帙中的经卷,首尾完整的一大批于阗文佛典和菩萨幡画,以及精美的观音像等。荣新江认为,“这些主体内容很难被看作是废弃物”。对于藏经洞中保存的大量佛典残片和丝织品残块,荣新江也做出了新的解说。他指出自唐代以来,敦煌寺院的佛典和供养物的残缺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情况直至宋初仍未改变。比较而言,较小的寺院和不在敦煌县城的寺院,其佛典和幡画的残缺情况就更严重一些。敦煌文献中的藏经目录表明,当时敦煌三界寺的藏经就是残缺不全,真伪混淆。而比丘道真看到三界寺藏经不全,曾发愿搜寻古坏经文,修补头尾。据此,荣新江推断,藏经洞就是十世纪中叶道真搜罗古坏经卷,修补佛典的储藏所,其中既有完整的藏经,也有绢画、法器乃至残经。藏经洞中的废纸、木轴引首、经帙残片及丝带等,是作为修补佛经、经帙、绢画的材料而保存在那里的。所以,藏经洞的主体文献佛典和供养具“不应是废弃物”,“原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至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荣新江推测是因为公元 1008 年于阗佛教王国灭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黑韩王朝对于阗佛教的毁灭性打击,促使三界寺将所得经卷、绢画等神圣物品封存在 5 号窟中。荣新江对“废弃说”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方广钊的论文确实未能对藏经洞保存的大量完整的绢画等做出合理的解说,也确实忽略了中原大城市寺院藏经和地方寺院藏经的区别,也没有考虑地方州县城镇寺院藏经和边远地区,如莫高窟寺院藏经的区别。但将藏经洞当作当年道真搜罗古坏经卷,修补佛典的储藏所也还存在疑问。其一是地方过于狭小。我们知道,藏经洞不过一丈见方,据斯坦因回忆,藏经洞刚发现时,洞内堆满了各种典籍,两个人进去,就没有剩余空间了。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堆放六万多件各种典籍,从中查找一部佛经恐怕都十分困难,要想在其中从事修补佛经工作就更不容易了。其二,方广钊曾经指出有的佛典上沾有鸟粪,如果藏经洞是道真的工作场所,自然不会允

许鸟儿以此为巢。其三,如果假定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是担心黑韩王朝的进攻,收藏的物品又是三界寺的珍贵藏经和资产,那么,如果敌人没有来的话,当事人应该把这些宝物拿出来继续使用,绝没有遗忘的道理。事实是,黑韩王朝最终并没有进攻敦煌,而藏经洞也没有被重新开启。对这样一个结果,荣新江也未能做出合理的解说。可见,虽然双方的观点都有相当的道理,但也还都存在一些疑点。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或许有赖于对敦煌文献的彻底清理,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也许永远不会有最终的答案,但这样一些探索对于进一步认识敦煌文献的性质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也同样存在多种不同看法。《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兼论“敦煌遗书”与“藏经洞遗书”之界定》,首先从方法论角度对以往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类和分析,指出应该排除外部因素,以藏经洞本身作为考察对象来探讨其封闭的时间,即“藏经洞内遗书所反映的年代是其封闭时间的上限,藏经洞外壁画所反映的年代则是其封闭时间的下限”。作者在方法论方面的另一个贡献是明确提出对敦煌遗书和藏经洞遗书加以严格界定。由于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后,一些时代较晚原本不属于藏经洞的文书被混入其中,有的学者不了解这种情况,往往利用这些混入藏经洞中的文书作为判断藏经洞封闭时间的依据,这当然会造成人为的混乱。而作者对敦煌遗书和藏经洞遗书的区分有效地澄清了这种混乱,因为只有藏经洞遗书所反映的年代才对探讨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具有意义。最后,作者利用上述方法将藏经洞封闭的时间推定在曹宗寿统治时期(公元 844 年—849 年)。采用将洞内遗书和洞外壁画结合起来考察的方法来探讨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无疑是正确的方法,但对持“避难说”的学者来说,设法寻找到底是那一种外部势力威胁了敦煌也是必然的选择。在这里,对藏经洞封闭原因的认识决定着探讨封闭时间的方法。

《敦煌汉文遗书分类法(草案)及说明》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对敦煌文献进行分类的正确原则,并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总体的分类结构和具体的分类方案。如所周知,敦煌文献的内容极其庞杂,其中不仅包括比较容易分类和归类的典籍,还包括大量的文书,这些文书我们往往不能在古今图书分类的类目中为其找到恰当的位置。因而在以往的编目实践中,一直存在按馆藏编号顺序编制目录的做法。这种目录具有查阅方便,对文献内容的著录比较灵活的优点。但从目录学的角度看,只有编制分类目录,才有可能将敦煌文献纳入总的图书分类体系中。故而学术界也从未停止编制敦煌文献分类目录的探索。在以往出版的几种敦煌文献分类目录中,对敦煌佛教文献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以后世的分类体系编排中古时期的敦煌佛教文献,这就有意无意地扭曲了敦煌佛教文献自身的编排体系。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古代中国实际流行的分类法”对敦煌文献进行分类的原则,并运用这一原则将敦煌佛教文献分为正藏、别藏、天台教典、毘尼藏、禅藏、宣教通俗文书、疑伪经、敦煌寺院文书等八类。以上原则和分类框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重大突破,不仅对于敦煌文献的分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科学地把握敦煌文献的属性和内涵,挖掘敦煌文献的深层次学术信息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作者对禅藏典籍的归类就是一例。上述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作者曾对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的流传情况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得益于作者长期的编目实践,还得益于作者曾多年在国图善本部工作的经历。当然,鉴于敦煌文献内容的复杂性,即使在正确的分类原则指导之下,我们也应该允许敦煌文献的分类方案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相比较而言,作者的分类方案在世俗文书的分类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大。如作者试图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涵盖所有敦煌世俗文书,在原则上无疑是正确的,符合作者所提出的用古代流行的分类法对敦煌文献进行分类的原则。问题是敦煌文献中

保存了大量的公私文书,这些文书可分为很多类,每类之下又可分为诸多小类。正如作者所说,传统的四部书没有这些内容。按照作者现在的做法,将这些文书均置于史部之下,并单列公牒档册类、私档文书类和社司类。由于“公牒档册类”(二级类目)和“私档文书类”(二级类目)的文书数量极多,内容庞杂,必须设置三级、四级甚至五级类目才能容纳。有些三、四级类目的文书数量较多,超过现在作者所设置的二级类目,这样势必造成编排上的不平衡。似乎只有在与经、史、子、集平行类目中增设公文书类和私文书类,才能解决上述矛盾,也更能体现敦煌文献的特点。在佛教文献的类目设置上,也存在可以商榷之处。如作者的“敦煌寺院文书”类下有“转经文”、“愿文”、“斋文”、“印沙佛文”、“亡考文”、“亡妣文”和“安平文”等三级类目,如果按照当时人的分类法,上列事目实际均属“诸杂斋文”类,不具备单独成为三级类目的资格。

《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查初记》,介绍了该馆所藏一万六千号左右敦煌文献的来源,披露了一批该馆初期收藏和核查的原始资料和长期不为人知的编目的历程,以及四千号残片部分重新发现的经过。直至今日,此文仍是了解国图收藏敦煌文献的经过和现状的必读之文。

《斯坦因敦煌特藏所附数码著录考》,考出在部分敦煌文献背面的特殊数码为斯坦因的助手蒋孝琬书写的苏州码子。《敦煌经帙》则对各国收藏的竹、织、纸、草四种质料的帙皮进行了考察。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接触敦煌文献原件的机会有限,这当然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敦煌文献,而且也很难对敦煌文献的物质形态进行研究。作者长时间接触大量的国内外藏品,为其撰写有关经帙的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依据作者在前述论文中对敦煌佛教文献的分类,对敦煌佛教文献的内容和价值做了概括性的介绍和说

明,虽然其内容与《敦煌汉文遗书分类法(草案)及说明》的相关部分多有重复,但对初学者从整体上把握敦煌佛教文献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敦煌遗书中所存的全国性佛教经录》,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众经别录》、《大唐内典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开元释教录》等全国性佛教经录放到中古时期佛教经录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由于作者对古代大藏经的流传和经录的发展曾做过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些经录的定位也就比较准确,对其价值的分析和阐发也比较深刻而允当。

由于宗密编纂的《禅藏》亡佚已久,学界有人对其是否真实存在提出怀疑,《关于〈禅藏〉与敦煌禅籍的若干问题》依据文献记载考定《禅藏》在历史上确曾存在过,其内容是经过宗密整理加工过的禅与禅宗的资料汇编。作者还指出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与《禅藏》相应的文献,并主张依据这些文献恢复《禅藏》的原貌。但因至今尚未在敦煌禅籍中发现宗密整理加工的痕迹(即宗密在编纂过程中为禅籍所加的《祖传序》或注释),所以,敦煌禅籍是否原来《禅藏》的组成部分,尚待证明。

《敦煌遗书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般若心经译注集成〉前言》、《敦煌遗书中的〈妙法莲华经〉及其相关文献》、《敦煌遗书中的〈维摩诘所说经〉及其注疏》、《关于敦煌遗书〈佛说佛名经〉》和《关于〈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等均属对某一种佛经的分类研究,在这一组论文中,各篇都是首先考察该种经典的翻译与流传的历史,在此基础上介绍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各种形态的该经、注疏与题记的有关情况、内容与价值,并具体指明其中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者。以上各篇所涉及的均为重要佛教典籍,除《般若心经》作者已做过系统整理以外(参看方广锬《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其余各种的分类整理工作均有待进行,作者的概述工作是在普

遍调查世界各国藏品的基础上进行的,这项作为以后的分类整理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作者所披露的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的诸经注疏,对于了解中古时期佛教典籍的流传情况和佛教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点似乎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这一部分文献目前也仍属尚待开发的资料宝库。所以,作者的这一组论文给我们提供了一批新的研究课题和资料线索。

以下几篇属于对敦煌佛教文献的个案研究。传统经录将《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确定为疑伪经,《敦煌遗书〈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简析》依据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该经,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该经是从域外传入的翻译佛典。这篇论文的结论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提示我们:在传统经录中被确定为伪经的典籍,并不一定都是中国人的著述,其中可能夹杂有外国传来的典籍,所以今后我们在研究这类典籍时应该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关于敦煌遗书北新八七六号》,依据北新八七六号所保存的《佛经目录》,考出直到咸通年间敦煌地区仍然依据《大唐内典录》组织本地的经藏,作者从这一个案所得出的结论对于了解当时全国大藏经统一过程的下限具有一定意义。《敦煌遗书〈沙州乞经状〉研究》,以充分的论证说明《乞经状》所依据的目录是《开元录·入藏录》,其时间是在五代时期,它表明当时我国僧人已经依据《开元录·入藏录》点勘、补配寺藏佛典。作者的上述考证和论断对于了解汉文大藏经的形成和统一都具有重要意义。《俄藏〈大乘入藏录〉研究》,考出该件并非敦煌文献,而是出自黑城的西夏文书,这提示我们在利用俄藏敦煌文献时要注意鉴别那些并非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文献。作者还对这件文献的内容和价值进行了研究。

从总体上看,作者的研究是高水平的,所收论文的主要论断和结论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同时,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研究具

有比较大气、比较厚重的特点。这个特点一是表现在开拓性地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二是他的研究是开放性的,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他的开放性还表现在为许多问题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的资料线索。对作者来说,在敦煌佛教文献研究领域,似乎到处都是有待开发的宝藏。那么,作者是如何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我想,至少以下两个因素值得注意。一是作者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比较重视对方法论的探讨和理论的提升,如上述作者对藏经洞封闭年代的探讨、对敦煌汉文文献分类的探讨等,都是从解决方法论入手,这不仅使作者的研究常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使得作者的论断和结论的意义往往会超出他所考察的具体问题。

二是作者肯于在原材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下大功夫,为了搜集、整理研究资料,作者曾在国图工作多年,并多次前往英、法、俄、日等国查阅敦煌文献。他是国内外少数几个在敦煌文献本体上下过大功夫的学者之一,若就接触敦煌文献原件的绝对数量而言,当代学者恐怕是没有人能和他相比。通过这样一些艰苦的过程,才使作者对敦煌文献的整体把握上超过常人,因而常能看到一些未被人们注意的重要问题,解决一些人们无力解决的问题。如作者对几种重要佛教经典的分类概述,虽看似不难,但若没有长时间的广泛调查和资料积累,则无从着手。

就数量而言,佛教典籍在敦煌文献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但研究佛教典籍的中外学者却相对较少,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不是很多,因而,作者的研究成果格外值得珍视。对敦煌佛教典籍的研究之所以会成为相对比较冷僻的领域,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的难度较大,初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往往不知从何处下手。而作者的这一部论文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为进一步研究敦煌佛教文献提供了必要的背景。

所以,对于有志于从事敦煌佛教文献研究的初学者来说,这部论文集应该列为必读之书。

同时,作者还为以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如上所述,由于作者的研究具有开放性,因而他提出了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和新的资料线索,这些新问题和新线索将成为今后敦煌佛教文献研究的指南。我们看到,这部论文集包含了作者的各种类型的研究成果,既有综合性的研究,又有分类的研究,还有个案的研究,这些都为初学者提供了具体的样板。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 圆园园年 员月)



## 十四、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sup>①</sup>、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sup>②</sup>

**摇摇**以上两书均为研究归义军史的论文集,其内容涉及归义军时期的政治、官制、经济、历史地理、民族关系、宗教等方面。

唐大中二年(852),沙州大族张议潮率众起义,在控制了瓜沙二州后上表降唐,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此后直至十一世纪上半叶,张议潮家族和曹议金家族相继控制归义军政权达一百多年。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代中原王朝始终未能有效控制归义军及其外围地区,故当时的官修史籍对归义军政权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关情况记载极为简略,且多讹误。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六万 multiple 件古代文献,大部分是归义军时期的典籍或文书,为研究归义军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和社会各方面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我国学者在最初接触敦煌文献的1903年,王仁俊、蒋斧、曹元忠等就开始了有关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此后,国内外学人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者,代

---

① 郑炳林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源尾第1页。

② 郑炳林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源尾第1页。

不乏人。从整体上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对归义军史的研究主要限于政治史,只有少数学者开始探讨敦煌寺院及其依附人口。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仍是重点和热点,但对经济、民族、社会 and 佛教的研究也有很多创获。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及其年代已大致考出,以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的出版为标志,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告一段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归义军史研究的终结。与敦煌文献中所蕴涵的丰富学术信息相比,归义军史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一些领域和方面尚未涉及,有的领域和方面则尚待深入。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将归义军史的研究作为重点研究方向,本文介绍的两本论文集就是他们十多年来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结集。这些成果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归义军史方面做了很多扎扎实实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其重要建树或特色是研究了一些前人未曾涉猎的新问题,拓展了归义军史的研究领域。

如归义军疆域的演变,以前只是在相关的研究中被笼统地提及,《晚唐五代归义军疆域演变研究》一文对影响归义军疆域变化的地理条件进行了分析,并依据文书的相关记载深入考察了归义军疆域的发展、收缩的历史过程。再如归义军的行政区划,以往学界仅对归义军所辖军镇做过探讨,其它方面亦仅笼统知道归义军下辖州、县二级政区,具体情况所知不多。《晚唐五代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研究》则首次从制度层面对归义军的州、县区划进行了考察,并对归义军所辖的州、县及其变化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考索。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关于晚唐五代敦煌村庄聚落的记载,未能引起学界的注意。《晚唐五代敦煌村庄聚落辑考》对这批材料所记载的村庄聚落名称进行了考证,并依据敦煌的一些村庄聚落以渠道为名的现象,推断敦煌的水渠大部分是村落名称,从而揭示了作为

绿洲组成部分的敦煌村庄聚落与水渠的密切关系。此文还依据一些聚落以姓氏命名的现象,探讨了这些村落与敦煌居民成分的关系。或许是因为资料所限,作者没有考证这些村庄聚落的具体方位。

再如敦煌种植林业的情况,虽然问题重要,但由于材料缺乏,研究者长期未能找到切入点。《唐五代敦煌种植林业研究》一文独辟蹊径,利用敦煌文书中各种入破历中之零星记载,考出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林业主要分布在甘泉水(今党河)灌溉区域各村庄,以私人家庭园囿种植林为主,寺院佛窟附近的僧众种植林为次;当地用材主要依靠这些种植林业提供,种植的树木主要是榆、杨、柳等用材林和桑、杏、李子、梨等经济林。关于敦煌园囿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很多关于园子的记载,但由于材料分散,人们并没有通过这些资料联想到敦煌的园囿经济。《晚唐五代敦煌园囿经济研究》一文则通过广泛搜集零散的相关资料,具体探讨了敦煌园囿种类、分布、种植内容等问题。

又如对敦煌畜牧区的研究,亦鲜有人论及。《唐五代敦煌畜牧区域研究》首次全面考察了敦煌畜牧区的地理分布,考出唐五代敦煌有紫亭镇——甘泉都河上游畜牧区、常乐镇——阿利川牧区和西桐——甘泉水下游湖泽牧区,还探讨了这些牧区的草场的管理机构以及各牧区牧养的牲畜的种类特征。

属于研究新问题的论文还有对敦煌医史的探讨。《唐五代敦煌的医事研究》一文,利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医史资料,探讨了晚唐五代敦煌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和见于记载的医家,以及外来医学对敦煌地区的影响等等。

其二是对前人已做过探讨的一些问题做了新的探讨。

如归义军时期的职官制度,以往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探讨,但仍有不少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这两本论文集中有《敦煌文献中的职官史料与唐五代藩镇官制研究》等一组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而系

统的探讨。《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政权中“十将”及下属诸职考》，考出归义军使府将级军将有十将、副将、左右厢将头等，也有作为荣誉虚衔的散将，构成实散结合的将级官职体系；《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中队职问题辨析》，利用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探讨了归义军军队基层的队的种类，认为可将其分为作战队和作坊队两类；《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认为使头为归义军特有的官职，专门负责与外围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的有关事宜；都头作为归义军节度使的亲信，实际控制着从节度使府到地方州县军镇的权力，《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政权中都头一职考辨》一文对各类都头的职权进行了考证；《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武职军将研究》，在荣新江《唐五代归义军武职军将考》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搜集资料，进而将归义军的武将官职一一查出，并逐一考释其设置、渊源、职责等；《唐五代归义军节院与节院军使略考》，考定节院是归义军节度使论请与迎接旌节的部门，其长官称节院军使，这一机构在归义军管内诸州长期设置，是归义军与中原王朝保持联系的机构；《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唐五代归义军军资库司初探》、《客司与归义军的外交活动》、《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酒行、酒户和酒司》、《唐五代敦煌官府宴设机构考略》等文，则利用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结合唐朝的有关制度，对归义军下辖的诸司机构的设置、职能、官职名称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这一组论文，立意较高，试图通过研究归义军官制来说明藩镇的官制，既从整体说明了归义军官制文献价值，又分别考证了归义军的文武官职的各个序列，贡献很大，在材料方面，也几乎将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资料网罗殆尽。

再如关于唐五代敦煌的手工业，亦有学者做过探讨，《唐五代敦煌手工业研究》则对敦煌工匠的称谓、种类及其管理机构做了详尽的考证，将此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又如关于敦煌水系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仍有研究空间。《唐末五代敦煌都河水系研究》考出都河不是源自甘泉水上的都乡河渠道,而是指今疏勒河及其上游昌马河。

此类论文还有一些,如关于敦煌物价的研究、关于敦煌粟特人的研究、关于归义军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研究、关于归义军佛教的研究等,多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搜集材料,或考察前人未曾注意的角度和层面、或纠正前人的错误、或为前人的说法补充了证据等等,深入和深化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这两本论文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敦煌归义军史”的提法就有问题。归义军政权虽然是以敦煌为治所,但其辖区最盛时包括瓜、沙、甘、肃、凉、伊、西、庭等州,最小时也包括瓜、沙二州,而敦煌不过是沙州的一个县而已。而且,在曹氏归义军史晚期,瓜州成为归义军史的政治中心,许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瓜州。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记载来看,当时人也从未使用过“敦煌归义军”的说法。所以,敦煌归义军的提法首先是于史无据,不符合当时人的语境;其次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用归义军辖区内的一个县的名称作为一个军区级单位限制词可以说是名实不符;最后,这样的提法还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归义军所管辖的区域只有敦煌。

其二,有的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如关于归义军官制研究的一组论文,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其研究多限于对单个的官职做平面的探讨,对官职的渊源、沿革以及任职者着力较多,而对各种官职升降迁转程序、各种官职之间的关系、归义军职官制度的运转等制度层面的问题用力不多。再如对手工业的研究,论者虽然对各类工匠的考证非常细致,但当时工匠身份不同,有个体手工业者、寺院手工业者和官府手工业者之分,作者未能对不同身份的工匠进行具体考察,其论述未免失于笼统。

其三,有多篇论文存在参考和吸收前人相关成果方面不够的问

题。如《唐五代敦煌官府宴设机构考略》，其中对“设”字的解释，前人已经解释清楚，作者并无新见，但仍然重述了前人的看法和材料，稍嫌累赘；《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其中对敦煌地区河渠与水利状况与渠社的一般性叙述，多重复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唐五代敦煌手工业研究》，在讨论博士的时候，亦未能参考《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一文之相关成果。类似例证还有一些，不备举。

其四，有的论文对材料的解释还可以商量，有的论文的观点也值得讨论。前者如《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政权中都头一职考辨》一文，把“都头”分为四类，其中第四类为“乡团社邑中的都头”，其依据是敦煌社邑文书中有许多关于都头的记载。并认为社邑中的都头“基本上只是一种散职头衔，没有什么实际差职的内容”。其实，敦煌社邑之内的都头，并非社邑内部的职务或散职头衔，指的是那些加入社邑的都头。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社邑文书来看，敦煌的很多社邑是各阶层混合结社，在这类社邑中，在书写社人姓名时，普通百姓一般是直书姓名，有官职和特殊身份的社人则是书写姓和官职等。如伯 源 908 号《辛未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所记载的有官职的成员有“邓都衙、邓县令、索押衙、阴押衙、小阴押衙、米押衙、邓兵马使、邓都头”等。显然，这件文书中的都衙、县令、押衙、兵马使、都头等所指的都应该是他们在社邑之外的身份，并非他们在社内所担任的职务或头衔，如果将上引“邓都头”之都头解释为社邑内部的职务或头衔，“邓都衙、邓县令、邓兵马使”等其他具有官职的人的身份就无法解释，难道这些官员的职衔也是社内的职务或散职头衔？社邑中的都头并非社邑内部的职务或头衔的另一证据是，有的都头被推选为社邑的首领——录事，其例证已为该文所指出。按照常理，如果都头本身已是社邑内的职务或头衔，自然也就不会再担任其它的职务、具有其它头衔。所以，社邑中的“张都头”、“李都头”、“宋都头”等，指

的应是社邑成员张都头、李都头、宋都头，并非他们在社邑中的职衔是张都头、李都头、宋都头。后者如《晚唐五代敦煌佛教转向人间化的特点》一文，作者试图说明敦煌佛教已经具有人间佛教的特点，但作者作为例证提出的几个特点却并非敦煌所独有。由于“人间佛教”理论的出现背景与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发展背景完全不同，作者的比附也就显得比较牵强。

其五，有的论文在论证方法上存在问题。如对归义军境内和周边少数民族族属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多数是仅凭姓氏判断族属，由于当时一些姓氏既有胡人，也有汉人，所以，这些成果从方法上说，不仅是属于推测性的，还有误断的可能。

由于这两本论文集涉及的领域很广，限于学力，不能一一置评，所提出的不同看法，也仅为一孔之见，不一定恰当，欢迎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原载《唐研究》第一〇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圆园园年 圆月）

## 十五、评《敦煌本〈甘棠集〉研究》<sup>①</sup>

晚唐宰相刘邺所撰之《甘棠集》，对于研究晚唐的人物和史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惜乎此书佚失于宋代，所幸上一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该书的残本。残本为册页装，存表、状、愿通。敦煌本《甘棠集》虽非完帙，但所存部分仍有重要史料价值，所以，自王重民先生首先发现并确定其性质后，不断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以往虽有学者相继对敦煌本《甘棠集》做过整理和研究，但所遗留的问题尚多。赵和平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特别在敦煌写本书仪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敦煌本〈甘棠集〉研究》，是作者奉献给学术界的又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此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第二部分是《甘棠集》的释文及校注，第三部分为附论。

“导论”主要对《甘棠集》及其作者刘邺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实际是一篇长达数万字的专题论文，创获颇多。

如关于《甘棠集》得名之由来的探讨，前贤未曾措意。作者首先

---

<sup>①</sup> 赵和平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12月，缘起页100页。



考出“甘棠”之名出自《诗经·甘棠》三章,被视作善政的代称。继而又列出《唐摭言》和《唐大诏令集》中之数条证据说明中晚唐的正式公文和一般记述中,人们往往习称陕州为甘棠,故刘邺将代陕、虢观察使高少逸拟制的表状书启合集成为《甘棠集》。作者继而列出数例证明当时藩镇之掌书记(或曰从事、判官)常以府主所在地而名其表状集,至此,《甘棠集》得名之因由,经过作者的举证和剖析,遂成定论。

再如关于《甘棠集》性质的新看法,作者指出其不同于一般的唐人文集,其编纂的目的在为写表状书启等公文时参考之用,并从《甘棠集》中举出多条例证说明其为范本,并非实用文。作者进而举例说明,《甘棠集》之类供掌书记或从事起草文书参考的文集在当时不止一种,在《宋史·艺文志》中就保存了《记室备要》、《管记苑》等十多种。

又如为白敏中辩诬的论证。《资治通鉴考异》依据当时所见各种记载,断定李德裕之追复赠官实得力于刘邺之奏,又举白敏中与右庶子段全纬书(书中有“论请爱加于宠赠”),指其中暗示李德裕追复赠官与敏中有关。并断言:“德裕素有恩于敏中,敏中前作相,既远贬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自此,白敏中在恩人落难之时,落井下石,在恩人被追雪以后,又掠他人之美的说法,流传千载。直至近代,陈寅恪先生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中,始据当时新出之李德裕后人墓志等材料,推断“德裕之归葬,敏中实与有力焉。然则其后与段全纬所言亦不致全掠他人之美”。赵和平教授则从考察李德裕、白敏中、刘三复(刘邺父)三人及其后人的关系入手,进一步为白敏中辩诬。作者首先揭示出刘三复、白敏中都是在李德裕的提携下得以升迁的,且刘、白二人曾为同僚。又据《甘棠集》卷四中之《上白令公充学士状》推测在白敏中任荆南节度使时,刘邺曾以故人子身份入白敏中幕府为从事。并据该状揭出以后刘邺入朝升

迁为左拾遗和翰林学士,都得到了敏中的鼎力推荐。作者还依据《唐摭言》、《三水小牍》等史籍考出敏中与刘邺均居住在长安永宁里,比邻而居。以上论述,层层揭出刘邺与敏中兼有父亲之至友、不遗余力提携的长辈和比邻而居的邻居等多重密切关系,实属非同一般。而刘家与李家的关系除邺父刘三复受知于李德裕,在政治上与其共进退外,刘邺自己则自幼与德裕诸子“同砚席师学”,而李德裕对刘邺是“尤怜之”。以上事实的揭示,为读者正确解读为李德裕追雪案相关材料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作者推测“刘邺《乞赠恤李德裕疏》出现的可能是:大中十三年十二月白敏中人相后不久,李烨(李德裕子——引者)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卒于郴县,消息传至长安,以此为契机,敏中在与段全纬书的同时,鼓动故人子左拾遗刘邺上疏雪德裕。之所以让邺上表,可能出于几种考虑:其一,刘邺与李烨情同手足,《疏》可以写得更具感情;其二,邺官左拾遗,乞雪德裕之类事正是谏官职掌之一;其三,邺有文名,藉此事打动入主,为邺仕进铺平道路;其四,邺上疏,敏中为首辅,其事易行”。这表明白敏中并非知恩不报,落井下石的小人,而是既念故人之情,又讲恩义的君子。以上解说,虽属推断,但结合前揭之背景,可谓合情合理。此说发千载之覆,敏中地下有知,当可瞑目矣。

作者为白敏中辨诬的论述,涉及到对刘邺《乞赠恤李德裕疏》真伪的考辨。据作者介绍,最初是由“温公据所见史料,推定刘邺《乞赠恤李德裕疏》‘或者后人伪作之,非邺本奏也’”。近代以来,陈寅恪先生也认为此疏“为后人伪传伪作之史料”。吴其昱先生亦赞同此说。只有张锡厚先生认为此疏确由刘邺所撰,但曾被“好事者增改”。作者又提出三条理由力证该疏非伪作。其一,疏中关于李烨坐贬蒙州、移授郴州郴县尉等事件的记述均与近代出土的李烨墓志一致,此点后人很难伪造。其二,作者对最受前人怀疑的一句话提出了新的解释。该疏中有“孤骨未归于莹兆”一语,指的是李德裕死于

贬所后未曾归葬。因此疏的时间已被确定在大中十四年(原图 九月,而李德裕早在大中六年(原图 就已归葬洛阳。刘邺作为当时人,又与李家关系特殊,自然不应该不知道李德裕归葬之事,所以,这句话是人们怀疑《乞赠恤李德裕疏》真实性的最重要的证据。为解决这个问题,和平教授大胆提出将“孤骨未归于莹兆”读为“孤骨虽归于莹兆”,至于“虽”被改为“未”的原因,作者认为系后人在传抄传刻过程中臆改或误书所致。其三,作者对疏之尾语“特乞圣明,府垂哀愍,俾还遗骨,兼赐赠官”一句也作出了新的解释。结合上文之“孤骨未归于莹兆”,按一般解释,这里的“俾还遗骨”也只能指李德裕,而作者认为所指为李焘。李焘于大中十四年六月卒于郴县,刘邺上疏是在九月,从时间上说是可以的。问题是“俾还遗骨”后还有“兼赐赠官”,这个赠官当然不应该是赠给李焘。为解决这个矛盾,作者认为应在“俾还遗骨”后补入“其李德裕,请特赐赠官”。据此,作者认为《乞赠恤李德裕疏》之尾语部分有脱漏或后人臆改,遂成后人认此疏为伪作的原因。吴其昱先生怀疑《乞赠恤李德裕疏》为伪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论据就是敦煌本《甘棠集》中未见此疏。对此,张锡厚先生认为现存该集仅为残卷,此疏或者在残缺部分中。作者进一步指出现存《甘棠集》卷 员至卷 猿为刘邺大中八年秋至大中十年于高少逸陕虢幕中作,卷 源则为大中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入翰林充学士后所作,而《乞赠恤李德裕疏》上于大中十四年九月,时刘邺未入翰林,自然不在收录之列。至此,作者将疑伪者的论据一一排除,同时为《乞赠恤李德裕疏》非伪作的说法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论证。

但是,关于《乞赠恤李德裕疏》真伪之辨的学术史,还有些情况似乎值得一提。《资治通鉴》记载此事的正文是:“右拾遗句容刘邺上言:‘李德裕父子为相,有声迹功效,窜逐以来,血属将尽,生涯已空,宜赐哀愍,赠以一官’”。在《考异》中,《资治通鉴》编纂者又提到裴旦《李太尉南行录》中有刘邺关于此事的表,并摘要转录了该表

的文字,其中就有“枯骨未归于茔域,一男又殁于江、湘”。《资治通鉴考异》遂以此句与李德裕已在其子李烨去世前就已归葬洛阳的事实有矛盾为由,断定《李太尉南行录》所载之刘邺表“或者后人伪作之,非邺本奏也”。这里,《资治通鉴考异》定为伪作的是《李太尉南行录》中之《乞赠恤李德裕表》,而上引《资治通鉴》正文之右拾遗句容刘邺上言,其内容与《资治通鉴考异》转录的《乞赠恤李德裕表》有相同处,亦有不同处,似另有所本。《资治通鉴考异》对《李太尉南行录》中之《乞赠恤李德裕表》的断语是或者“非邺本奏”,也就是说,刘邺关于此事的“本奏”是发生过的,或者在当时能够见到的官方档案中记录了刘邺“本奏”的主要内容,《资治通鉴》编纂者依据官方档案的记录撰写了上引刘邺上言。至于陈寅恪先生,其态度较为审慎,只说《乞赠恤李德裕表》“中‘孤骨未归于茔域’之语”“为后人伪传伪作之史料”,并未明言《乞赠恤李德裕表》是否伪作。以后吴其昱先生在此基础上引申,并补充证据,断言《乞赠恤李德裕表》系伪作。要言之,从司马光到吴其昱,所讨论的均为《李太尉南行录》中之《乞赠恤李德裕表》之真伪。但作者所讨论的是《旧唐书·刘邺传》中的刘邺关于请赠恤李德裕的“奏论”,作者名为《乞赠恤李德裕疏》。这样,关于刘邺为李德裕追雪事,就有三种相关记载:一是上引《资治通鉴》中之“右拾遗句容刘邺上言”,二是《李太尉南行录》中之《乞赠恤李德裕表》,三是《旧唐书·刘邺传》中《乞赠恤李德裕疏》。我们现在无法确知这三种记载的史源,但从《资治通鉴考异》对《李太尉南行录》中之《乞赠恤李德裕表》持否定的态度看,《资治通鉴》中之“右拾遗句容刘邺上言”应有自己独立的史源,而且是这三种记述中唯一一种既与事实相符又未遭到人们质疑的记载。《李太尉南行录》中之《乞赠恤李德裕表》,其时代应该早于《旧唐书·刘邺传》,也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史源,但因其中记述有与事实矛盾之处,其整体或矛盾处的真实性曾不断受到怀疑。《旧唐书·刘邺传》中之《乞赠恤

李德裕疏》，如作者所言，与《李太尉南行录》中之《乞赠恤李德裕表》“无重大差别”，有可能来自同一史源。但“俾还遗骨，兼赐赠官”一语，确是《资治通鉴考异》所转录的《李太尉南行录》中之《乞赠恤李德裕表》所无，而这一差别亦应是与事实矛盾的重要差别之一。当然，由于《资治通鉴考异》只是略引，这一重要差别完全有可能是因为省略所致，但也不能排除《旧唐书·刘邕传》中之《乞赠恤李德裕疏》自有其史源。此疏在三种记述中，与事实矛盾处最多，但却从未有人明确提出其为伪作，当然，如果能证明此疏非伪，《李太尉南行录》中之《乞赠恤李德裕表》就更不可能是伪作了。

作者的相关具体论证，虽可自成一说，却也并非无懈可击。如对《乞赠恤李德裕疏》文字的改动，似乎就推阐过深。关于“孤骨未归于莹兆”一句的改动，“未”和“虽”字形相差很多，无法以形近而讹解释，只能说是由后人误改或误书所致。因“孤骨未归于莹兆”下尚有“一男又没于湘江”，从上下文看，“未”与“又”相对似更贴切，有递进之意。如是“虽”与“又”相对，则显得勉强，很难说是全文豁然贯通。关于“俾还遗骨，兼赐赠官”的改动，亦不够圆满。困难在于“兼赐赠官”只有和“俾还遗骨”连在一起才贴切，如果在这两句中间补入“其李德裕”，“兼”字就没有了着落。如果依作者所改，补入“其李德裕，请特赐赠官”，后面的“兼赐赠官”一句就得删除，这样的改动，似乎太大了。

这样看来，刘邕《乞赠恤李德裕表》或《乞赠恤李德裕疏》是否伪作的千年疑案，目前尚难做出确定的判断。比较而言，陈寅恪、张锡厚等先生既承认该表（疏）部分内容真实有据，又指出其中部分内容（与事实有矛盾的记述）为伪传伪作，这样的处理办法，似乎比较妥当。

该书的第二部分对敦煌本《甘棠集》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录校和注释。如所周知，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要比一般的古籍整理困难得

多。这不但因为敦煌文献为手写本,对文字的辨认十分不易,还因为《甘棠集》是孤本,缺乏可资比勘的资料。作者以数年之功,字斟句酌,终于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校本。作者还在查考大量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在校注中勾稽出了书中各件表、状之撰写年月及收件人的履历或所涉及的事件,为使用该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长期从事敦煌文献整理者都知道,对敦煌文献进行文字校勘固然不易,但为其作注更难。作者不畏其难,将《甘棠集》中之表、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既为人们读懂这些表、状提供了相关信息,也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新资料。其中一些较长的注释实际上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学术短文。如该书第 员缘至 员远页《与同院令狐侍御〔书〕》注释①,为考证令狐侍御是否曾举进士和所历官,举示的资料除两《唐书》外,尚有《唐语林》、《北梦琐言》、《册府元龟》、《十国春秋》、《全唐文》、《登科记考》等,足见作者用功之勤。有的注释更是从具体的史实的考证中引出一般的结论。如该书第 愿袁至 愿原页《贺门下令狐相公状》注释①,通过考证令狐相公的加官,推导出唐会昌、大中以后,首辅一般加“宏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次辅带“监修国史”,第三位宰相一般带“集贤殿大学士”衔。

该书附论收论文二篇,其它三种为《刘邳年谱简编》、《状启收件人索引》、《引用及参考书籍目录》。书的最后是伯 源圆敦煌写本《甘棠集》影本。附论中值得注意的是《高少逸陝虢幕府与白敏中邠宁行营幕府的比较研究》一文,该文通过具体考察这两个幕府的文职幕僚的仕途经历,指出中晚唐的进士,如果有为方镇幕府幕僚的经历,大多在政坛上升迁较快,可迅速成为中央政府的高官,直至宰相。这一现象,影响及于北宋以来文人主政之新局面,是中古政治史之大问题。

## 十六、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学界期盼已久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以下简称《国图遗书》)终于要全部出版了。这部大型图录由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纂,国图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任主编,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钊教授任常务副主编,国图善本部张志清主任及李际宁先生任副主编。现在,首批出版的**第1册**已经摆在了人们面前,这应该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更是敦煌学界的一件功德无量的盛事。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列为二十世纪初我国的四大文化发现。敦煌遗书的数量达六万多件,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所涉及的时代从十六国到北宋初,达七百多年;其形态有卷轴装、经折装、粘叶装、缝缀装、梵夹装、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遗书都可以说是四大发现中最重要的发现。

敦煌遗书发现以后,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并由对它的整

理和研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近百年来,敦煌学经历了兴起、发展和兴盛的历程,现在,敦煌学早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敦煌遗书始终是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遗书在发现以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现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 54000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约 25000件)、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收藏敦煌遗书约 55000件)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 54000多件)是收藏敦煌遗书的主要藏家。

敦煌遗书的分散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也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不便,多数研究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很难有机会到世界各地直接阅读敦煌遗书。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看不到原材料是阻碍我国学者真正了解、充分利用敦煌遗书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敦煌遗书具有文物和文献双重价值。如果要知道和研究其文物特性,自然是非亲睹原件不可。但如果只是了解和研究其文献内容,通过阅读原件的缩微胶片或影印图版则可解决绝大部分问题。所以,自敦煌学兴起之时,各国学者就通过拍摄照片和影印图版的方式为读者提供研究资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和中国国图都曾将所藏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制成缩微胶片,到七十年代,法国也将其收藏的敦煌遗书制成缩微胶片,为读者了解和利用敦煌遗书的文献内容提供了方便。1955至1956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黄永武依据上述三家公布的缩微胶片编纂的大型敦煌遗书图录《敦煌宝藏》(以下简称《宝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遗书图版本陆续推出。这些利用新技术印制的敦煌遗书图版不仅印制精良,图版文字的清晰度也比以往的图版和缩微胶片大为提高。依据新的敦煌遗书图版,原来缩微胶片中模糊不清的文字,现在绝大部分都可以辨认出来。自1980年到1998



年,敦煌遗书四大藏家中的三家即《英藏敦煌文献》(员-员源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员玖玖-员玖玖年)、《俄藏敦煌文献》(员-员苑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玖玖-圆园园年)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员-猿源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员玖玖-圆园园年)都已陆续出版。现在,学界翘首以待的《国图遗书》终于出版,编者和出版者承诺,将在 圆园园年全部出齐 员园册。届时,敦煌遗书四大主要藏家收藏品主体部分图版的编纂和出版工作基本完成了。

应该指出,国图对读者利用馆藏资料包括敦煌遗书,一直在尽量提供便利。早在 员玖玖年,国图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就组织编纂了《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为了解、利用研究京师图书馆收藏的佛经提供了指南。员玖玖年,国图的前身北平图书馆又组织编纂了当时馆藏大部分敦煌遗书的总目录《敦煌劫余录》,在四大藏家中,这是最早完成的一部敦煌遗书馆藏目录。英国的馆藏目录出版于 员玖玖年,俄国的馆藏目录出版于 员玖玖至 员玖玖年间,法国的馆藏目录,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完成。在敦煌遗书图版的公布方面,国图也一直持积极态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起,国图方广钊、李际宁、黄霞等对馆藏敦煌遗书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修复部也对需要修复的遗书进行了全面的修复,这些都是为影印出版这批珍贵的资料所做的前期准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联系出版社和准备出版等工作也一直在积极进行。在 员玖玖年至 圆园园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员至 苑册。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出版工作没有坚持下来。以致国图所藏敦煌遗书图版的公布比其他三大藏家慢了一步。

《国图遗书》出版时间虽然晚了一些,但就其编纂和印制质量而言,可谓后来居上。与此前出版的《宝藏》等书相比,《国图遗书》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其一是定名准确。

由于很多敦煌遗书是残篇断简,确定这些文书的性质和名称,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对于敦煌遗书图录的编纂者而言,定名是其主要工作之一,也是衡量其编纂质量的主要尺度。关于国图收藏的敦煌文献的定名,数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做了很多工作。黄永武先生在编纂《宝藏》时,在《敦煌劫余录》基础上新比定出一些文书的名称,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此次《国图遗书》编者经过努力,又解决了一大批文书的命名问题。《国图遗书》在定名方面所做的工作可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是给一些原来未命名的文书确定了名称。如 **月疑册四六**背,《宝藏》定名“西域文五十七行”,《国图遗书》具体确定其为“藏文秽迹金刚类经典或仪轨”;**月疑册四七**背,《宝藏》命名为“吐蕃文两行”,《国图遗书》确定其为“藏文信函稿”,并在《条记目录》附录了该件之拉丁文转写和汉文译文。第二类是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定名。如 **月疑册四六**,《宝藏》定名为《大悲明二赞》,《国图遗书》考定其为《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咒》两件文献。第三类是进一步明确不够确切的定名。如 **月疑册四六**,《宝藏》定名《佛名经》,《国图遗书》定名为《佛名经(十六卷本)》;**月疑册四七**,《宝藏》命名为《涅槃经节钞》,《国图遗书》命名为《大般涅槃经(北本)钞》。以上三例,《宝藏》的定名大致是对的,但因所涉经都有不同版本,故《国图遗书》的定名比《宝藏》更加准确和具体。与以上三例情况类似的例子还有 **月疑册四八**,《宝藏》定名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经名是对的,《国图遗书》考出其与传世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版本不同,卷次、品次均有别,故将其定名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异卷)》。**月疑册四九**,《宝藏》定名为《正法华经卷六》,经名也是正确的,但未注意到其与传世本的区别,《国图遗书》编者指出其与《大正藏》本之区别,定名为《正法

华经(七卷本)卷四》。此外,月曜图卷背是一组斋仪和斋文摘抄,其中有若干子目,《宝藏》仅罗列了其中部分子目。按此件实为一个整体,应确定一个总的名称,如果列子目,就应全部罗列。《国图遗书》将其命名为“某僧佛事手帖”,又在《条记目录》中将该件全部子目列出。这样一种处理办法,既使读者明了此件之性质,又可全面了解其中之具体内容。月曜图卷起,《宝藏》命名为《妙法莲华经》,但此件实为因抄写错误而作废的《妙法莲华经》,《国图遗书》将其命名为《妙法莲华经》(兑废稿),揭示了这件文书的实质。

《国图遗书》在标题的标注方式上也有进步,因不少佛经都是长卷,为了使读者准确了解佛经的内容,《宝藏》一般在标题中标出该经的卷数和品数,这当然是方便读者的做法,但也有缺陷。因大多数佛经都不完整,而佛经的“品”包括的内容仍很多。比如某经的某品有二百行文字,但该经只保存某品的起首二行,其余都残缺了。按照《宝藏》的标注体例,仅存二行的这一品仍要列到标题上,这样,读者就有可能认为该经包括某品的全部内容,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可见,《宝藏》对佛经标题的标注方式有可能误导读者。对这个问题,《国图遗书》现在采用只标经名和卷次,但在《条记目录》中注明该经所保存部分在《大正藏》中的相应位置。这样一种办法,可使读者准确地了解该经所保存的内容。

《国图遗书》在定名方面能够取得以上成绩,一方面是编者多年钻研、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通过编者的努力,使这部图录在定名方面达到了目前所能达到的最好水平,绝大部分原来在定名方面存在问题的文书都被拟定了正确的或比较稳妥的名称。

其二是图版清晰。

图版的清晰度是衡量文献图录质量的主要尺度。

从整体上看,《国图遗书》的图版比《宝藏》提升了一个档次,比

1980年至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也清晰许多。以往图版模糊的地方,现在大多清晰可辨。如月曜图卷《佛名经(十六卷本)卷一三》、月曜图卷《观世音经》、月曜图卷《大道通玄要卷七》、月曜图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五八》、月曜图卷《灌顶章句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月曜图卷《沙弥威仪》、月曜图卷《无量寿宗要经》等诸号,《宝藏》起首部分文字模糊,《国图遗书》文字清晰。月曜图卷《维摩诘所说经卷上》、月曜图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六四》、月曜图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等诸号,《宝藏》尾部文字模糊,《国图遗书》文字清晰。月曜图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宝藏》首尾文字模糊,《国图遗书》文字清晰。月曜图卷《观世音经》、月曜图卷《四分律戒本疏》、月曜图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八六》、月曜图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八》、月曜图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月曜图卷《维摩诘所说经卷中》、月曜图卷《背《患文》等文书,《宝藏》多处文字模糊,《国图遗书》文字清晰。月曜图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四一》、月曜图卷《维摩诘所说经卷中》,原件有水渍,《宝藏》在有水渍处文字不清,《国图遗书》则全部清晰。以上所举共100例,均在第一册中,该册收敦煌遗书残号,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当然,其他各册的情况或许与以上统计有出入,但应不会相差太多。

还有一些图版质量的提高与文书修复有关。如月曜图卷从中间断裂为两片,《宝藏》的图版两片上下未对齐,且两片中间留有裂缝,不便阅读,有的地方甚至无法确定是否缺失文字。《国图遗书》所印图版为经过修复的文书,上下两片已经对齐,中间无丝毫缝隙,恰成完璧。再如月曜图卷《佛名经(十六卷本)卷三》,已断裂为两截,缩微胶片和《宝藏》误将后半截拼接在了前面,造成次序颠倒,《国图遗书》所印图版将这一错误纠正了过来。

其三是补充了一些缩微胶片和《敦煌宝藏》遗漏的图版。

编纂资料图录,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资料的完整性。由于种种原因,国图以前制作的敦煌遗书缩微胶片遗漏不少卷背的内容,《宝藏》是依据缩微胶片影印的,自然无法增补遗漏的内容。此次《国图遗书》补足了一批以往遗漏的内容。如 月 背有三行“账历”、月 背《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两片、月 背“佛说八神咒”一行、月 背有“大目乾莲”一行、月 背有藏文杂写、月 背有“烹罪嫡后嗣”一行、月 背有补纸三块、月 背有“昊口”二字、月 背有“第三十一”一行、月 背有“卅五”一行、月 背有一“夫”字、月 背有“若若”二字、月 背有“佛藏经卷第二”,以上图版均被《宝藏》遗漏。月 背有两片 猿行《佛名经》,其图版也被《宝藏》遗漏。这些被遗漏的图版都被《国图遗书》补上了。另 月 背《维摩诘所说经卷中》,《国图遗书》图版首部比《宝藏》多一小片(二残行),这是国图在修复时将属于该件部分拼接在一起的结果,《国图遗书》的图版反映了这一成果。上举 猿个例证亦均在第一册,占该册所收敦煌遗书总数 猿件的百分之二十一。则《国图遗书》所补《宝藏》遗漏图版的比例,亦不算低。

其四是创建了《条记目录》。

《国图遗书》各册之内容,除目录、图版、图版标题(定名)外,还附有《新旧编号对照表》和《条记目录》。因国图所藏敦煌遗书曾有千字文编号、“新”字号、缩微胶卷编号、“临”字号等各自独立的编号系统,既不便管理,也不便检索。此次《国图遗书》编者将几种编号整合为一体,统一编号,这当然是改变国图藏品编号混乱状况的必然之举。但因千字文编号、“新”字号和缩微胶片编号都曾公布过,学界以往在引用国图收藏的敦煌遗书时也都使用过这些编号,在各册附列《新旧编号对照表》,当然是必要的。

《条记目录》是《国图遗书》编者的创举,此前出版的大型敦煌遗

书图录如《宝藏》、《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都无此项内容<sup>①</sup>。《条记目录》实际著录的内容多达 图元 项,有编号、文献的名称(卷本、卷次)、千字文编号、缩微胶卷编号,遗书的总体数据(包括长度、宽度、纸数、总行数与每行字数)、每纸的数据(包括长度和抄写行数或界栏数)、外观和一件遗书抄写多个文献的情况,文献首部文字与对照本核对的结果、文献尾部文字与对照本核对的结果、录文、说明,首题和尾题,本文献与对照本之区别,本遗书首部可与另一遗书缀接的编号、本遗书尾部可与另一遗书缀接的编号,题记、题名、勘记、印章、杂写、护首与扉页的内容,年代,字体和卷面二次加工的情况,近现代人所加的内容(装裱、题记、印章),揭裱互见、图版本出处及其他(包括研究信息)。上述内容都是有关遗书的重要信息,对读者了解、利用和研究遗书具有重要价值。首先,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遗书图录本的缺憾。如前所述,敦煌遗书具有文物和文献双重价值,清晰的遗书图版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读者了解其文献内容需求,但图版毕竟和原件不同,原件上的很多信息在黑白图版都无法显示,如朱书(包括朱书写本、朱书校改、朱书句读)、刮改、纸色、墨色、纸质、裱补等。《条记目录》在著录文书外观时,注明了文书的装帧形式,首尾存况,护首、轴、轴头、天竿、缥带,经名是书写还是贴签,有无经名号,扉页、扉画,卷面残破情况及位置,有无附加物(虫茧、油污、线绳及其他),有无裱补及其年代,界栏,修整情况等。著录卷面二次加工情况时注明了句读、标点、科分、间隔号、行间加行、行间加字、朱笔、墨涂、倒乙、删除、兑废等。这些内容的著录,向读者传递了诸多黑白图版无法显示的信息。其次,《条记目录》中关于“文献与对照本不同之处”的著录也很重要,编者

① 图元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附有“叙录”一项,其著录内容与《国图遗书》之《条记目录》类似,但该书只有两卷,似不能算大型敦煌遗书图录。

著录此项需要进行大量的文献对勘工作,这种对勘工作使编者解决了一批文书的准确定名问题,也为读者进一步研究该遗书的文献内容提供了线索。关于时代的著录,也很重要。如所周知,多数敦煌遗书没有留下年代(时代),而确定遗书的年代(时代)可大大提高其利用价值。编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著录了每件遗书的年代或大致时代。

当然,编纂《条记目录》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这是方广钊教授和他率领的团队二十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果。

其五,与《宝藏》相比,《国图遗书》编排方式更加科学。

依据缩微胶卷影印的《宝藏》采取的是按类编排的方式,这种编排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读者查找某类文献。但敦煌遗书与一般的古籍不同,往往一件遗书上写有两项以上内容,而这些内容又往往不属于一个类别。由于敦煌遗书具有文物性质,要保持其整体性,我们不可能将其分开,分别归属不同的类别。因不少遗书是正面与背面抄录不同类别的内容,我们也无法将其分开。所以,《宝藏》的所谓按类编排,只能以该件遗书上的主要内容来进行分类和归类,该件遗书上的其他类别的文字也只好附在一起。这样,《宝藏》其实是虽有按类编排之名,并无按类编排之实。《国图遗书》编者现在采用的是按馆藏流水号编排的做法,这也是已经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共同采用的办法。这种编排办法没有分类体系的限制,可以随着遗书的具体内容逐项编排、命题。当然,这种编排方式也留下了读者查找同类文书不便的缺憾,《国图遗书》编者准备将来通过编纂分类目录的方式来弥补这一缺憾。

总之,《国图遗书》定名准确、图版清晰、著录内容齐全、编排方式科学、价格合理,是一部高质量的大型敦煌遗书图录。它的出版,对于推动敦煌学的发展,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都将具有重要意义。